

平心著

人民文豪鲁迅

叙倫



人 民 文 豪 魯 迅

平 心 著



心 聲 閣 印

一 九 四 九 年 六 月

△人民文豪魯迅▽

著 作 人

平

心

出 版 者

心

聲

閣

總 經 售

光 華 出 版 社

社

上海郵箱八〇九號

初 版

一 九 四 一 年 二 月

四 版

一 九 四 九 年 六 月

△版權所有

嚴究翻印▽

目次

重刊獻辭

自序

第一章 戰鬥的現實主義者的魯迅

第一節 引言

第二節 魯迅的戰鬥現實主義的根源

第三節 魯迅的現實主義的主要內容

第二章 啓蒙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的魯迅

第一節 魯迅在中國民主運動史上的地位

第二節 魯迅的啓蒙主義思想

第三節 魯迅的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

第三章 民族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的魯迅

第一節 表現在魯迅思想中的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統一性

一

五

一〇

三二

三七

四六

六三

附 錄 思想家的魯迅

第二節	魯迅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要求爲什麼出發於國民性的解剖與批判	六五
第三節	魯迅所擔負的民族自我批判的任務	六九
第四節	魯迅的反帝思想的發端	七六
第五節	由進化論跨向階級論	八四
第六節	表現在魯迅思想中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一致	一〇七
前 記		一一三
第一節	怎樣研究魯迅思想的發展	一二五
第二節	從清末直到大革命以前的魯迅思想	一三一
第三節	魯迅晚年的思想	一五五

重刊獻辭

魯迅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地位，不能單從文藝方面來估量；他的崇高的文藝成就，並沒有掩蔽他在思想啓蒙與學術勞作上所放射的光輝。假如一個民族的精神生活史常由若干先驅者的思想業績增大它的重量，魯迅無疑是變革中國民族精神的主要先驅者之一。

魯迅在思想業績方面表現的顯著特點，不但在於他經常用文藝形象來表達他的批判、教化與理想，尤其重要的是，他始終是離開了個人的利益與小圈子的好惡，爲人民大眾喊出了不滅的心聲。多難的中國民衆借了他的筆，蘸着他的淚水和憤火，宣洩了自己的悲苦與歡欣，詛咒與頌揚，控訴與希望。經過了辛亥、五四、大革命、土地改革運動四次歷史蛻變，幾乎在每一個階段都表現了他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創見與進步。他的照耀現代中國精神生活的光彩，柔和而且有力，使人樂於親近而不易忘却；這不僅因爲他一身兼爲藝術家與思想藝術家，更其因爲他熟悉受苦大眾的愛憎和要求，而且不斷舉起他的藝術武器，爲人民的真理與正義作戰。

我們出生較晚的少壯鬥士，絕少沾染士大夫的舊習，很幸運地自幼就接觸到世界思潮；我們可以自由挑選思想學術的新兵器，因此不易了解上代的老戰士在精神戰鬥歷程中的艱難。假如讓我們出生在魯迅時代，整個心身背負了古舊的社會積習與精神傳統；要趕上時代的潮頭，不光要跟舊社會苦戰，同時還得跟壓在自己靈魂上肉體上的厚重歷史沉澱物爭鬥；這豈但需要過人的勇氣，還少不了出衆的識力；而這種勇氣與識力又必須富

有持久性與堅韌性，越是經歷磨難，越能爆開照人的火花。讓我們數一數跟魯迅同時代的人物吧，究竟有幾人具備了這些條件，自少壯到老死始終成爲大眾的發光體，從不吝惜他們的心光願力，一切爲了人民，一切獻給人民的呢？根據這樣的結算，我們對於魯迅的崇拜和感激，就不是用文字官語所能表達的了。

這個人好像是專爲打掃人間污穢增添人間美麗而來到這世界。他不止是第一個深刻的民族自我批判者，同時又是社會變革的預言者和新生力量的護持者；他的成就是超於文字語言之上的。

我願爲魯迅作見證：是他，用溫情與智慧哺育了無量青年，是他，驅除了咬痛青年靈魂的苦悶與寂寞。我自己就是會受他的潤澤的一個。直爽地說，我並不震驚於他身上顯露出來的世俗的所謂淵博，中國近代在學術成就上足以和他比肩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他的人，不是沒有，但像他一樣，以忘我的大無畏精神，充當人民代首人與革命大護法，開創一代文化新風氣的不朽作家，在中國還不易找到。使我們忘記不了的，是他始終不以知識與文字爲獵具，爲玩物，而一直是利用它們作爲戰取人民解放的武器。他刻畫黑暗世態和描繪光明風景的筆觸是那樣犀利有力，深深地掘進了舊社會的腐爛靈魂，也照亮了人民大眾首先是廣大青年的心。無數戰士在他的畫筆下看出了舊中國死滅之前的絕望，也看出了新中國必然勝利的希望。用新生的希望抗擊老衰的絕望，這就是中國人民求生的道路。照耀這道路的魯迅，與其說是高懸夜空的孤星，不如說是燃燒在人民中間最大的不滅火炬。這枝火炬跟無數民間的燭火聯結起來：順着新民主的風向越燒越旺；而這正是魯迅越戰越刺的強毅精神的不朽象徵。

魯迅由一個主張「人性解放」的自由主義者進步而爲要求「生存、溫飽、發展」的民主主義者，到了晚

年，更進步而為確信「惟有新興無產者才有將來」的社會主義者，這是中國人民進步與社會轉變的明確反映。一個自由主義者只要有眺望歷史遠景的勇氣和珍視人民利益的熱忱；他遲早會找到歷史最高的真理。聞一多說過：「從前我們在北平罵魯迅，看不起他，說他海派，現在我要向他懺悔，我們罵錯了；魯迅對，我們錯了。」這話不但表現了一個人民戰士追求真理的謙虛美德，同時也指證了歷史的真理具有雄偉無比的說服力量。由於先後接受了這說服力量，魯迅成了人民大眾的辯護士，聞一多成了民主運動的殉道者。

從魯迅、聞一多諸往哲身上，我們看出了中國人民的革命路向，也看出了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解放與民族獨立最後成功的必然性。我們與其消極地說，他們的死是不可補償的鉅大損失，不如積極地說，他們的不死是民族光明的不竭泉源。（類似的話我在本書「初版自序」中已經專為魯迅說過，這裏顯重複一遍，意思是要強調魯迅、聞一多都是同一類型的人物。）說他們不死，並不是一句過分恭維的世俗老調，而實在是有歷史的真實性的。因為他們是永遠屬於人民的作家；當作歷史的創造力量來看，人民幾會死滅過呢？

我從沒有親近過魯迅本人，只不過讀過他許多並不合於「正統」文士所置「溫柔敦厚」的標準的著作。我好像感觸到他的跳動的心臟，至今還依稀檢得出留在他的書裏的淚痕。我從不無條件地崇拜一個人，對於魯迅也是一樣。但我承認，我是承受了他的一部分遺產的。我珍愛這份遺產，正像我珍愛世界許多大思想家大文學家的遺產一樣；因為它除了給我以不滅的智慧而外，還給我以無窮的勇氣。當我蜷居孤島秉燭待旦的長夜，由於四周空氣的窒息與住所典籍的便利；我讀了許多佛經與古書；使我不致凍結前進熱情陷於空虛消沉的，除了抗戰勝利的確信，歐美革命大師與民主先哲的文獻和中外革命史知識而外，就要算魯迅的遺著了。這其間，我斷

續寫了有關魯迅的論文約十數萬字。結集在這裏的，是研究魯迅思想較有系統的專論。一九四一年會由上海長風書店出版，書名是論魯迅的思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全部書版遇毀，不復重刊。現在承蒙長風主人徐履堂先生慨允我將原夢收回重印，感激與喜慰之情交融一片。書名改爲人民文豪魯迅，是用來紀念魯迅逝世十周年的。我願以這書獻給不甘淪落追求光明的青年，跟我一同呼吸人民英雄的氣息。

平心

初版自序

偉人們在死後比生前容易被人了解，也容易被人曲解，那差不多成了歷史通例。一千五百多年前，晉朝猛將劉希樂說過一句名言：「大丈夫蓋棺事方定」；然而對於死去的「大丈夫」了解的有人，曲解的也有人，就可知「蓋棺論定」說未必完全可靠。那理由並不難明白：人對於人的評價，自來就不是單單以被評價者的死來做最後界線的。人當活著的時候，是社會動物，常識早已這樣告訴我們了，但某一個「社會動物」倘在人間留下了巨大影響，他的成敗，功罪，是非，榮辱，卻也並不因為他的死而泯滅了其社會意義；一切這些，照例由歷史結算在他生前所代表的社會階級的流水帳簿上。他將永遠被人們從各自不同的階級地位，時代需要和觀察角度來衡量，來褒貶。若要舉實例來說明，孔子就是值得提起的歷史人物。這個被尊為「萬世師表」和被封為「素王」的「聖之時者」，已經死去二千四百多年了。但關於孔子，不是在各個時代和各個入羣中沒有一個統一的定論麼？且不說最早儒墨道諸家對於孔子的臧否，就拿晚近的中國思想史來看：在清末，提倡政治維新的康長素把孔子捧做教主，而高唱種族革命的章太炎則把孔子譏為「國恩」。（雖則他仍然頌揚孔子在文化史上的功績。）一到五四時代，就一面有吳濠、錢玄同等為代表的反孔狂將高呼「打倒孔家店」，一面有林紆、王敬軒等為代表的衛道大家痛斥「詆毀先聖，蔑棄聖書」的「妄人」。看看最近的文壇和藝壇，關於孔夫子，又有議論紛紜的評價了。在曲阜孔德成先生由「衍聖公」改稱為「大成至聖先師祀奉官」已歷六寒暑的今天，孔子仍然成爲一個問題

中的人物，這就連善於「推進化之理」，「預知後世」（康有為語）的「大成至聖先師」自己也料想不到吧。

論者曰：孔子去今太遠，近人對於他不能得到一個統一的評價，那原是不足怪的。但人們對於去今未遠的先哲，又何嘗容易作出一致的論斷呢？被尊爲中國人民國父的孫中山先生，死去只有十六年，然而把孫先生當作孔孟道統的繼承者有人，把孫先生當作馬克思主義的駁倒者有人，把孫先生當作社會主義運動家的有人，甚至把孫先生當作「東亞新秩序」的首倡者也有人。自然，除他們的論點而外，我們還看到另外一種解說中山先生的主張，那就是認爲這個巨人是中國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偉大導師。關於中山先生的論斷，是如此複雜而紛歧，這在善於研究中國現代歷史的人，是原不必以爲不幸的。

另一個去今更近的先哲魯迅先生，活著時被人迫害了梅蕪了大半生，然而一到他死後，連原先迫害過他梅蕪過他的「正人君子」和「紳士淑女」也化敵爲友，起來尊敬他，頌揚他了；是故意表示他們的大度呢，還是「託詞知己」藉以自衛呢，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我們由此看到了一些特種的「兩面份子」的真實嘴臉，他們用一副面孔去對付活着的死敵，用另一副面孔去對付死去的死敵。他們不僅擅長於面孔變化的藝術，也善於畫取敵人的面孔。他們連同那些以賜死獅子爲榮的男女勇士，用着不同的手法把魯迅化爲誰畫中的可笑人物。長眠在萬國公墓的魯迅不能張口，也不能執筆，當然奈何他們不得。可是，魯迅的武器並沒有帶進墳墓裏去；他遺留下來的那麼思想武庫不在萬國公墓，而屹然聳立在人間。讓我們從這武庫中取出魯迅的武器，和魯迅的敵人激烈戰鬥吧，讓我們的敵人在這鋒利的武器面前繼續發抖吧！

我們不應奢望一切人都起來尊崇魯迅。生活在不同社會圈子內行走在不同歷史道路上的人，對於魯迅各有

各的褒貶，各有各的愛情，那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假如魯迅死後只是被人尊崇，而不遭人反對，只是被人熱愛，而不被人痛恨，試問魯迅的精神何在？試問社會鬥爭的真理何在？

在現代中國文人中，沒有誰像魯迅那樣在羣衆中間享受真誠的崇愛，也沒有誰像魯迅那樣從敵人方面遭到切齒的憎恨。世人對於他的愛情分明，正是他自己對於世人的愛情分明的真實反映。但這愛情斷不是超於是非之外的。凡愛情，一離開真理的尺度，不過是一場糊塗的混沌。倘有人從混沌出發來衡量魯迅，不管其動機如何，根據魯迅的精神，他都應歸入被憎之列。

當魯迅活著的時候，和我們一同行進，一同戰鬥；在血肉相連中，大家甚至忘記了他的崇高和特異。在那時候，人們對於他的思想和藝術，是享受多於研究，欣賞多於學習。但是，突然間，我們失去了這個公衆的導師，我們痛感到，他留下的空位是無法填補的；而他的偉大也就被更多的人和更深的心所記憶，所認識。在苦難中，大家想到了他；在戰鬥中，大家想到了他；在疲困中，大家又想到了他。從他離開我們以後，人們都說，他的死是不可補償的鉅大損失，但爲什麼不積極地說，他的不死是民族光明的偉大泉源？對於這泉源，我們還是滿足於享受和欣賞呢？還是進一步去研究，去學習呢？

展開學習魯迅研究的運動，並且使這一運動不斷深入，這就是我們當前的文化任務之一。我們一定要補償由魯迅的死所造成的鉅大損失，不管花多少代價，費多少年月。

值得欣幸的是，在這四年間，對於魯迅的遺產，正有不少戰士在那裏熱烈發掘和鑽研；雖說在這一方面的收穫還很有限，但只要不斷發掘下去，鑽研下去，任何一點一滴的成績，都有助於中國的歷史變革，那是確然

無疑的。

但魯迅的遺產是屬於中國人民大眾的。潛心於魯迅的思想和藝術的深刻研究，固然異常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根據魯迅的精神來教育大眾，鼓勵大眾。倘有人認為大眾不配和無力接受魯迅的遺產，而要把這份遺產凍結起來，窖藏起來，還自命為得魯迅的薪傳，這樣的人不過是魯迅的叛徒，因為他連魯迅的基本精神都給否定了。

然而，魯迅的基本精神是否定不了的，被否定的，將是一切曲解魯迅反對魯迅的大眾敵人和革命叛徒。

一面是對魯迅嚴肅的學習和研究，一面是對魯迅無恥的曲解和侮蔑，這正是今天中國文化上的重要矛盾現象之一。因此，繼承魯迅事業者的責任就更重大了，他們不僅要學習魯迅，研究魯迅，宣揚魯迅，而且要忠誠地勇敢地保衛魯迅。

保衛魯迅的困難，不在於打擊對於魯迅的曲解和誤解，防止魯迅被人當作化石來利用，因為魯迅的精神和思想本身就具備了抵抗這類橫逆的堅強甲冑。凡「宗旨皆在可否之間，議論止於函胡之地」（章太炎評論孔子語）的歷史偉人，最容易被人尊崇，但也最容易被人利用，最容易被人歌頌，但也最容易被人精躡。魯迅卻不是這一類的偉人，他的思想和主張是如此具體而明澈，使任何妄想利用他來達到自己卑鄙目的的人，都不能不望而却步，這是一切魯迅的衛士應當引為光榮的。但困難的是，魯迅及其事業在生前受到迫害，在死後仍不免於此種命運，因此，倘使魯迅的衛士沒有勇氣抵抗摧殘魯迅精神和魯迅事業的潮流，踏着魯迅的足印：「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還可咀咒的地方擊退了可咀咒的時代」，他就應當自動機械，交給別

的戰鬥者。

保衛魯迅，和保衛中國人民，保衛中國革命，是不可分開的。

然而，保衛者如果不同時是發展者，是不能取得勝利戰果的。倘說，進攻是最好的防禦，則發展就是最好的保衛。魯迅的全部遺產是歷史的產物，這產物也唯有在歷史的變革運動中才能不斷豐富，不斷更新。祇有庸夫俗子對於這偉大文豪，才以尋章摘句為滿足。魯迅一生的思想和藝術都在經常發展中；他死後，發展他的遺產的責任，落在一切前進文化工作者的肩頭。在他的鉅大遺產面前，我們承認自己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然而集合無數無數的涓滴，不就可以成為洪流嗎？倘不凍結魯迅的遺產，而根據歷史運動的真理和經驗去發展它，使它的戰鬥性和真實性發揮在一切方面，使我們的民族生活，革命事業和文化勞作格外豐富起來，結實起來，由魯迅的死所引起的民族損失，不就可以因此逐漸補償嗎？今天，誰都不能否認魯迅是不朽的，然而要使魯迅的不朽性為我們所有，除了繼續發展魯迅外，別無其他便宜辦法。

現在到了我們該對魯迅作全面研究的時候了。我們並不幻想一切都對他有一致認識；魯迅的怨敵和魯迅的衛士，根本就不可能用同一尺度來測量魯迅。然而，在魯迅的衛士中間，對於魯迅作統一步伐的研究，那不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但自然，統一的研究並非用一套刻板公式去加在魯迅頭上，那是斷然研究不出什麼來的。魯迅是公式主義的最大敵人，他的思想和藝術，絕無教條臭味。凡能真正道破客觀真理的思想家與藝術家，都善於最具體地最深刻地表現歷史的動態，魯迅正是此中一個典型。我們所要學習所要發展的，恰恰就是魯迅在思想和藝術各方

面的具體性和深刻性。

從魯迅逝世以來，我對於這個文化巨人的遺作，是日益增大了閱讀興趣。我比過去任何一個時候，都更深切地感覺到，魯迅是每一個青年所不可少的導師。以前爲我匆匆涉獵過的魯迅作品，現在不斷在我面前跳出了許多爲我先前所未發見的真理，它們把我引到了思想的巔峯，把我帶到了歷史的深谷；我不能抑制住自己的興奮，於是動了研究魯迅的念頭。我會把自己對於魯迅的認識寫在幾篇專論中，其中較長的，爲思想家的魯迅（一九三八年作，是紀念魯迅逝世二周年的，那是魯迅座談會討論魯迅思想的結果，我不過是一個論文執筆人，所以署名「魯座」），魯迅的思想遺產，——戰鬥的現實主義者的魯迅，啓蒙主義者與民主主義者的魯迅，民族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的魯迅（以上均發表在一九四〇年，是用以紀念魯迅誕生六十周年的）。後三篇彼此間有聯繫，所以結集成爲一本較有系統的專論魯迅思想的小書，而最早發表的一篇則刊在書後，作爲附錄。現在，我把這書作爲一份小小的祭禮，獻給逝世已經四周年的魯迅先生，同時也用以紀念他的誕生六十周年。我並不以爲他有什麼在天之靈，希望他含笑領受我的禮物；我最大的願望，是對這巨人的思想多少作了一點並不歪曲的解說，以加深學習魯迅，研究魯迅的運動。自然，我還希望這小書能够在保衛魯迅、發展魯迅的鬥爭中盡一點哨崗作用。

魯迅不僅是一個思想家，也是一個藝術家，本專論魯迅思想，而很少涉及他的藝術，那是因爲我對於藝術完全是一個門外漢的緣故。如其時間容許我將來附帶學習藝術，我或許能够對魯迅作一個較爲全面的研究吧。但現在，關於魯迅藝術的研究，只能期待於專家了。

寫到這裏，我的序文已經可以完結了。但一陣夾雜着感想的回憶忽然湧上我的心頭，還想趁此再寫幾句。

記得去年八月三日在一個紀念魯迅六十誕辰的紀念會上，我作了一點關於魯迅的報告，其中有一段論到魯迅與孫中山先生，大意和本書第二章第一節第三段所說的差不多。但不久我就在文陣叢刊中看到「我的朋友」之一（這裏所加的引號，是用以標明這四個字有其歷史來源——例如：章衣萍先生說：「我的朋友胡適之」——，而並不含別意。我要鄭重聲明，我所要提到的「之一」，真是不折不扣的我的朋友）發表了一篇關於魯迅雜想，那篇雜想開頭的一段是：

「魯迅還是魯迅。把魯迅比擬於孫中山大可不必（中略）以是而論列魯迅，未可謂爲知魯迅。

善哉，魯迅之言曰：偉人一做了化石，那就無任而不被歡迎，偉大了。

魯迅先生必然憎恨那些以化石視魯迅的人。」

真是說得毛骨悚然。我立刻就聯想到了我在八月三日的演講了，我當時的確將魯迅先生和孫中山先生一同論列過。「我的朋友」決不會無的放矢，他一定有所指。然而，翻讀許多刊物，都找不到他所要射的「的」，唯一可能或爲他所指的「以化石視魯迅的」第一類嫌疑犯的（尚有第二第三類，不在本文所說的範圍之內），舍我其誰。但我引爲詫異的是，在我的演講中，那裏來的「把魯迅比擬於孫中山」的怪論。想起來，大概是由於「我的朋友」聽到了不負責任的曲解或訛傳，於是根據此類曲解或訛傳判定我「以盤噓日，以柱喻象」（引自「我的朋友」的同一文）吧。在我們周圍，是常有這類好事者的。他們唯恐文化界沒有風浪，慣會摘舉別人的片言隻語，照自己意思曲解，卻要別人負起錯誤的責任來，倘因此激起一點文壇風波，就引爲快意，因爲他

可以「觀門」。(更下流者還會造謠誣毀，亂放冷箭。)但自然，也有人並無惡意，只因爲一時的錯覺(聽錯或看錯)，就把別人的說話或文字訛傳了，而實際上，被訛傳的言論當然同樣要無辜地負起錯誤的責任來。「我的朋友」所聽到的，是好事者的曲解呢，還是好意者的訛傳呢？我不得而知，但總之，他所聽到的，不是真實，而是走了樣的話片。在我引爲小小的遺憾的是，他的那篇雜想可能被某些好事者當作「餘興」來看。而他所下的斷語，也略爲過火了點，因爲即使有人把魯迅和孫中山相比擬(我很同意史達林對路德維希「此公會把史達林和彼得大帝相比」所說的話：「任意把一個人和另一個人比擬，是很危險的。」因此，我不贊成這樣的比擬)，爲什麼就是「以化石視魯迅」呢？把偉人當化石來看的人，是要凝固偉人的一切，是要利用被他僵化的偉人來達到其自私目的，魯迅的確憎惡這樣的人。但如其有人把魯迅和孫中山相比擬，他雖然不對，似乎還不至於被歸入這樣的人物之列吧。我是敬重「我的朋友」者之一，我希望他以後下筆咸否人物論斷是非以前，多經過一番考慮。而實際上，「我的朋友」是評論高手，他的一時的疏忽，真是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而我希望他連這「一失」也給戒免掉，確乎近於苛求了。

然而我的本意卻不在苛求，也不在答辯。只因爲談到魯迅，而觸動了一二點從回憶中跑出來的感想，把它們記錄下來，就算是本書序文的一點「餘興」。好事之徒或許又可從這裏找到一點新的資料吧，但我哪裏管得

了許多！

平心

一九四一，六，一



鲁迅 一九三〇年九月
二十四日摄于上海
晴宇三七

第一章 戰鬥的現實主義者的魯迅

第一節 引言

一切偉人出現在時代的頂巔，適應歷史的需要，作為廣大羣衆的代表而戰鬥，而工作，從整個歷史發展過程看來，完全是一種必然。但是，某一個特殊偉大人物，剛好在某一時代，某一民族出現，以其特有的精神品格和行動影響歷史，在史頁上留下一抹異彩，却又是一種偶然。中國在封建宗法社會沒落過程中，在殖民地化過程中，在向新社會轉變的艱苦途中，必然產生適應民族解放需要的革命智識份子，並且必然從舊社會的游離份子中發積極敢為英蓉正直的特出人物，充任民族民主革命的旗手和參謀；最近二十年來大批智識份子投奔革命前線，就是顯明的實證。然而，在這個歷史蛻變過程中，一個從舊社會和仕宦家庭出身的智識份子，由于特有的遭際和修養，靠着出衆的天才與努力，憑藉文藝工作和思想活動，在許多同代的文人學者倒退、落伍、升官、退隱的濁潮中，始終高舉戰旗，作為中國人民的卓拔精神代表而苦鬥，而吶喊，在現代的中國文藝界中找不到第二個人，這就不能不驚歎魯迅的特異和偉大了。魯迅不幸而出生在中國，使他的天才和工作不能發揮到可能達到的極境；但是，他又幸而生在中國，因為他目擊到和參加了中國特有的民族劇變的巨大場面。

關於魯迅，有着各式各樣的比擬。最通行的一種是把他比作高爾基。此外，還有人把他比做果戈理、蕭伯納、伏爾泰。

「中國的高爾基」，這是對魯迅一種極流行的尊稱。是的，中國只有一個魯迅，正像蘇聯只有一個高爾基一樣。雖然魯迅自己曾經很謙抑地說過他還不能跟高爾基相比，但我們總不能否認在這兩個巨人之間有着許多相似之點。他們都是國際無產階級的偉大文化鬥士和勞苦大眾的親密朋友，他們都是平民的現實主義藝術巨匠，他們都是由舊社會奮鬥出來而成為舊社會的鐵硬反對者，他們都各自領導一個大國的革命文藝運動，他們都全力哺育從事革命文化工作的青年，他們都不是僅僅屬於一個國家而是屬於全世界的文豪。可是，不能在這兩個偉人中開畫一個等號。高爾基跨過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舊俄羅斯，穿越十月革命，筆直的走入勞動大眾主宰的社會主義世界。他很幸福地親自接觸到最多采，最多變的歷史風景，他的大半生的流浪生活使他能夠積貯最豐富最現實的創作題材，前輩（如柯羅連珂、契科夫等）的文藝指導和舊俄的寫實主義藝術傳統使他在創作生涯中獲得了不少便利。因此，高爾基能夠用大部分精力描繪他親歷的俄羅斯巨大轉變的畫卷（他的自敘傳三部曲和巨著薩姆金的一生以及其他小說戲曲等都是俄國社會動亂的真實史畫），他的多產的創作生涯和他所處的特異的社會生活是聯結得不可分開的。但魯迅是生長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中國，這是一個背負着吃人的封建社會僵屍的苦難國度，是一個飽受着異族欺凌和帝國主義踐踏的愁慘國度，同時也是一個醞釀着叛亂、復仇和起義的革命國度。他不斷在頑石般的舊社會殘骸之下掙扎着，搏擊着，不但要擊退周遭吞噬人民大眾的黑暗勢力，而且要掙脫那網住他自身的古老傳統。他的教養環境和生活圈子使他長時期不能找到戰伴，而不能寂寞地作孤軍的困鬥——直到晚年，他才零覺到了步伐一致的戰鬥隊伍——因此，在他前期的作品中浮泛着濃厚的渴望光明的憂鬱色彩。正因為他是處在這樣的一個社會環境中，中國民族的多難和戰鬥喊聲的稀微，使

熱情的他不能支出很多時力從事長篇鉅製的創作，而祇有選擇最善于直接攻擊黑暗和打開民族血路的武器來衝鋒陷陣，這就是爲什麼雜文成了他最主要最精練的寫作體裁的原故。中國急迫的民族革命和苦難的大衆生活在精神上需要魯迅式的白刃戰，正像俄國的壯麗戰鬥場面和漫長革命行列在精神上需要高爾基式的壕塹戰一樣。（自然，魯迅也是主張壕塹戰的，他勸青年「常抗戰而自衛」，就是此種戰術的說明；但魯迅的 *Penetration*（社會雜文）的確是最便於短兵相接的武器；高爾基有時也作白刃戰，他也寫過許多尖銳的社會論文，但他的龐大的藝術製作是大衆進行壕塹戰最好的武器與食糧。）

魯迅和果戈理與蕭伯納，自然也有幾分相像的。果戈理和蕭伯納暴露上層社會的鄙陋和醜惡的筆鋒，在魯迅作品中也時常可以看到。魯迅的機智與諷刺在某種程度內受了這兩位文豪的影響，大約是不成問題的。但魯迅對於他們兩個人的觀感却不相同；對於果戈理，是歎服于他的剝露舊俄羅斯的寫實主義畫筆，而對於蕭伯納，是傾心於他的撕掉紳士假面敢爲正義發言的潑刺精神。從思想上說來，果戈理雖然無情地描繪了愚鈍可笑昏憤無聊的舊俄羅斯的真實面影，雖然對被凌虐的下層民衆（農奴等）流露了醇厚的同情，但他不是堅定站在被壓迫大衆方面對黑暗勢力揮劍的，他沒有勇氣攻擊紳士地主資產階級的社會到底。他晚年焚燬自己的稿件，就是對於先前暴露舊俄的寫作表示懺悔的變態行爲。魯迅對於舊社會是到死不寬容的，他用「一口咬住了不放」的勇烈精神攻擊黑暗勢力，並且始終爲了被壓迫大衆吶喊，這種頑強的戰鬥精神在果戈理的生活與思想中是找不到的。至於蕭伯納，誠然是上層社會無情的暴露者，並且敢于抗議黑暗對光明的進攻，他的全部作品正像魯迅的作品一樣，是最使正人君子紳士淑女頭痛的；但蕭伯納應當認爲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有正義感的作家，他的

工作止於暴露與諷刺；而魯迅應當認爲是被壓迫民族的戰鬥思想家，他的工作愈到後來，愈深入於無產大眾的戰壘。自然，上面的比較不是從藝術的角度出發的。

把魯迅比做伏爾泰（有人譯作福祿特爾）的，乃是斯諾（西行漫記作者）。他以為魯迅高呼反抗，反對寬恕，是跟伏爾泰一樣的。魯迅的阿Q正傳和伏爾泰的幹地德（Cardinal）同樣是富於反對封建愚昧的啓蒙意義的力作。伏爾泰的作品曾經燃起了法國革命，魯迅的思想也是中國革命的引火物（大意如此）。但是，魯迅和伏爾泰其實有極大的差別。伏爾泰雖然反對殘餘的農奴制度和封建專制主義，憎惡貴族僥倖和階級特權，然而他所憧憬的，不過是開明的君主立憲政體，他根本就不敢被壓迫的勞苦大眾，而且他不能堅持自己一貫的戰鬥立場。他早年以無神論者猛攻宗教，一到了晚年，便公然擁護宗教，就是要用資產階級的精神枷鎖來套住沸騰的貧苦大眾的心。魯迅一開始就猛烈襲擊封建社會，他以毫不妥協的戰鬥精神追求人民的徹底解放，他更同情和尊重被侮辱被損害的勞動大眾，後來竟熱心於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他不但沒有絲毫動搖過他護衛真理與正義的反抗精神，而且愈到後來，愈加磨銳他的戰鬥鋒芒，他是不寬容黑暗勢力與愚昧渾流的矯健戰士。他的堅毅人格是和愈老愈衰的伏爾泰完全兩樣的。假如伏爾泰不過是卑怯的自私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則魯迅便是剛強的正直的勞動大眾的精神導師。這種差異不能簡單歸因於兩個人的氣質，而應當歸根於革命時代的不同。

把魯迅和外國的歷史偉人比較，必須首先打破沒出息的民族自卑心。很有人以為魯迅之被尊爲國際文豪，是由于中國文壇太荒涼，不能不把魯迅捧出去與世界文豪並列。這不僅是對於魯迅的輕蔑，而且是對於中國民族的侮辱。在中國光輝的民族解放運動中，產生與世界偉人比肩的傑出人物，決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不論從

藝術、思想、戰績那一方面來說，魯迅在國際間都自有其不朽的地位。一切人種偏見者縱使任意顛倒歷史的是非，然而決不能長久驅斷大眾的愛憎。中國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歷史偉人總有一天深入至世界革命大眾的心。歷史將證明魯迅是屬於世界的。事實上蘇聯人民和世界進步份子不是把魯迅的死當作世界的損失而表示深切的哀悼嗎？只有那些「完美的蒼蠅」毫不羞力地想用自己污臭的薄翼來蔽蔽偉大戰士的不滅靈光。

但是，研究魯迅，不能離開他所生存的民族環境。割斷魯迅思想和世界的聯繫，固然是淺薄而荒唐，一味按照一般的公式對魯迅思想作抽象的評價，也是浮泛而不實的。正像魯迅自己說過的，他是「一個中國人」，他的全部著作與事業不但是以中國民族的革命需要為根源，而且滲透着中國特殊的優秀傳統，呈現着中國特殊的民族風格。魯迅的思想是中國多采多樣的民族自覺運動與民族戰鬥生活的生動寫照，轉過來又推動中國的革命輪索。魯迅接受了中外最豐富最精粹的文化遺產，而又保留了中國民族的進步的特質。正因為這樣，所以他是第一個中國化的世界思想家。

第二節 魯迅的戰鬥現實主義的根源

中國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必然推動無數智識份子參加革命行列，魯迅之成為中國人民的崇高導師，正是客觀的革命要求發展的必然結果。然而一個人的思想和戰績是不能僅僅拿客觀的自然規律來說明的。同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文化革命運動中的人物，為什麼到了後來，有的落荒而逃，有的望風而降，有的潔身而退，有的貪人而肥，獨有魯迅等二三戰士（如李守常等）始終揭着革命的大旗而作戰到死呢？為什麼在千萬文化人中，唯有

魯迅能够長期成爲中國人民的最有權威的思想導師呢？機械論者把他的全部業績一概歸因於客觀環境，是唯心論者把他的一生成就完全歸因於天才一樣不正確的。誠然，魯迅是歷史的產兒，他的思想是現實的反映，然而不能否認，在他的不斷前進的過程中，他的主觀的能動的精神力量對他自己對於時代起了強有力的作用，雖然這種精神力是歸根說來，仍然不外是社會關係的產物。一切能够對現實世界作親切的忠實的觀察的人物，他的思想總多少反映客觀的真理，因此在歐美資產階級上昇時期，我們能够從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隊伍中找到不朽的思想家；同樣，從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出身於舊社會的人物中，也能够找到最進步的思想家。但自然，假如不是處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時期，要從落後的被壓迫民族之中產生最健全的革命思想家是不可能的。魯迅的一生如果沒有接觸到世界革命的巨潮，他仍然可以成爲舊中國一個有智慧有正義的天才文人，但不能成爲無產階級的思想戰士。正因爲他是處在中國革命運動突飛猛進的時期，他的思想浸透着中國和世界億萬羣衆所擁護所支持的革命真理，他纔能够成爲中國和世界革命大眾的燦爛明星。但是，時代的進步並不能減小魯迅的偉大。假如他不能頑強擺脫那網住他的舊社會的因襲力量，不能持久反抗現實的黑暗勢力，不能深刻體察大眾的革命要求，他必然「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助的牆，和時代隔絕了。」（且介亭雜文末編：因章太炎而想起的二三事。）他的天才也必然爲舊社會服役。在中國人民爭自由，爭進步的光榮歷史上，將看不到魯迅這不朽的名字。魯迅之所以不朽，在於他不僅自己動手猛攻舊中國的黑暗牢獄，而且不斷號召人民大眾攻打這坐牢獄；在於他不僅用筆觸用喉舌表達了中國民族的戰鬥，而且傳佈了最下層的大眾的革命戰叫；在於他不僅始終站在時代的第一綫提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要求，而且直接參加在戰鬥中去努力實現這些要求。如果要問，什麼

是使魯迅能够肩負起大衆導師的任務的主觀力量呢？這就是他的不斷把握現實，深入現實和變革現實的求真精神和戰鬥要求，這就是他的始終一貫的戰鬥的現實主義。這種現實主義使魯迅不斷前進，使他的思想包含許多不自覺的辯證法唯物論成分，最後使他走入無產階級革命的陣營。

這舊社會折騰所引起的痛苦可能使人由屈服而變成無恥奴才，可能使人因麻木而變成庸夫俗子，也可能使人由反，而變成堅韌戰士。魯迅是屬於後一類的人物。他從小飽嘗了冷酷兇殘的舊社會的欺凌和迫害，但他絕不從個人的命運出發來找尋自己痛苦的根源。他從有社會意識的那一天起，就深深地敏感到他周圍的人物以至整個的民族國家都生活在冰冷陰暗的深淵中，生活圈子愈擴大，他對人生對社會的觀察愈深刻，愈細密，他把自己所受的痛楚和民族的大業的苦難聯結起來反覆思考分析，終於養成他冷靜觸摩現實，熱烈撫愛大業的優秀習慣。因爲他自身就是被侮辱被損害的一個，對於舊社會的荒淫殘酷與愚昧昏庸看得最熟悉，最透徹，所以他「毫不可惜牠的潰滅。」（二心集序言。）又正因爲他覺察下層大衆的挨苦受罪和誠實可愛，使他對勞苦大衆表示深切的同情，後來「由于事實的教訓，」使他「以爲新興的無產者纔有將來。」（同上。）因爲他的對舊社會的憎惡和對下層大衆的熱愛不斷交織着，就鍊成了一種報復的反抗的和自我犧牲的堅毅性格。他的做學問，做事業，都從辨明是非，分別憎愛這個樞軸出發，所以很自然地會走到革命大衆所應走的道路。但是，他是一個最有自知之明的戰士，他深知舊社會的殘暴可怕，要靠一己的一時熱情衝動去反叛岩石般的舊社會，是有一定吃虧而不得到戰果的，因此他極力把自己的熱情凝縮在冷靜的工作中。（歐陽凡海在文學中已經表示過這樣的意見：大意說，魯迅的熱烈的情感是隱藏在冷靜的觀察中，這是很對的。）他懂得「常抗戰而自衛」的戰

魯。(兩地書。)
深刻體驗現實，沉着迎戰敵人，虛心改造自己，誠篤接待大眾，這些就培植着他的戰鬥的現實主義精神。他的主觀的現實主義精神一經接觸到工農大衆革命的動景，就使他堅定地獻身於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自然，魯迅的現實主義是不斷在向前發展的；他的戰鬥人生觀愈到後來，愈加積極，愈加激烈，就因為他的現實主義的世界觀在不斷高揚，不斷深化。

魯迅的現實主義最觸目的表現在他的文學與藝術製作中。誰也不能否認，魯迅是中國第一個開創現實主義文藝的巨匠，他的創造典型的才能和刻畫世態的筆觸，使他的創作洋溢着從死文學解放出來的奔騰沸湧的活力。恩格斯說：「現實主義並不是僅僅重視細瑣事物的確切描寫，而主要的是在於正確地在典型環境中描寫典型人物。」魯迅正是「在典型環境中描寫典型人物」的現實主義的天才作家。當別人還在破壞舊文學傳統嘗試新文藝創作的時候，他已經開始了現實主義的文學建設，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作品就這樣奠定了中國新文學的初基。他的投槍似的文筆一開始就使舊社會各色各樣的鬼魅驚心膽戰，因為牠擊中了腐爛的舊社會的瘡疤和要害。他的現實主義的文學遺產在中國以至在世界將是永遠不朽的，永遠光芒萬狀的。

但魯迅的現實主義決不僅僅表現在文學和藝術製作上。在這個巨人的全部生涯中，都熾燃着熊熊的現實主義火光。文學和藝術製作只不過是他的現實主義表現的一種形式。他曾自白了他寫小說的動機與任務：

「例如說到『爲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啓蒙主義』，以爲必須是『爲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爲『閒書』，而且將『爲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閒』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兩地

北調集：我怎樣做起小說來。）

他對於「病態社會」觀察得最透澈，他不能沈默。他要「療救」病態的社會，在他早年的生活環境中，唯有揮動他那枝靈動而犀利的筆。假如他不是自始注視和觸摩複雜的殘酷的現實，他或許沒有任何寫作，即有文章，也不過是平庸乾枯的東西而已。因此，並不是因爲他先有文藝生活，然後纔有現實主義的精神，而是先有現實主義的精神，然後纔有鋒稜驚人的文藝成就。假如把魯迅的文藝比作療救疾病的溫泉，那麼，他的博大淵深的現實主義精神就是熔巖岩石的地熱（Subterranean heat）。岩石般的現實世界在他的現實主義熱力灼燒之下，都融解成爲岩漿，他那滲入現實的地殼罅痕的情感、思考、想像和理解，就沸騰成爲溫泉。文藝是魯迅現實主義的表現形式之一種，正如溫泉只是地熱的表現形式之一種一樣。

魯迅現實主義的批判性和戰鬥性一開始和封建專制主義的獄門相碰擊，就爆出了奇麗的革命火花。正如啓蒙時代的歐洲市民革命運動，是從爭取人性解放和人權保障開始一樣，魯迅的初期的寫作活動也是從「人」的發見和「人」的保衛出發的。在論及中國文學革命運動時，他曾指出初期革命文學的特徵說：「最初，文學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們以爲只要掃蕩了舊的成法，剩下來的便是原來的人，好的社會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們的壓迫和陷害。」（且介亭雜文：草鞋腳小引。）魯迅就是最早提倡人性解放的文學革命者。

抽象的人性解放論本來是一切啓蒙時代的文藝思想所依附的社會觀。在中國，這種要求人性解放的文學運動，反映着反封建和反帝的民族解放戰鬥的物與。在封建黑暗勢力和外來侵略勢力的籠罩之下，人民蠕動在死水般的愚昧精神生活中，他們背負着「舊的成法」，不能自由思想，自由活動。生活上是封建統治者和帝國主

義的牛馬，精神上是少數寄生蟲和異族侵略者的奴隸。當無產階級還未自覺地躍上革命戰場的時候，農民祇是顛撲在絕望的叛亂與慘醉的失敗中，不能有大作爲；先天不足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力量堅決領導反封建、反帝的革命運動，在文化思想上反而時常傾向於對舊勢力的妥協。在這時候，就只有進步的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起來用科學思想對抗封建守舊勢力的愚民統治。他們要在思想上動搖那古舊傳統的萬里長城，不能不開展一個反守舊主義的理性運動。這表現在魯迅的文字中，就是堅決反對「脫履塵埃，倘恍古國」（墳：《摩羅詩力說》）的幻夢，要求建立「舉一切僞飾陋習，悉與滄蕩」的「人國」（墳：《文化偏至論》）。誠然，魯迅在當時祇是孤軍獨唱，他的對舊社會的攻擊也不過「如一箭之入於大海」（華蓋集續編），沒有什麼回響，但從他的論文中，不難看到他的早年思想是流動着人本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血液。

第三節 魯迅的現實主義的主要內容

流產的資產階級的維新與革命，沒有搖動頑強的封建奴役制度，更沒有搖動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力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活的死水中，很少有起來「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圍牆」（墳：《論「費解」了「眼」看」），流行着的卑劣習慣，却是「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迷途來，而自以爲正路」（同上），對於麻木的一羣，是一切「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同上。）這種漂浮着愚昧和怯弱的「瞞和騙的大澤」阻礙中國民族進步的大路。爲着要打破那包圍人民大眾的陰冷和黑暗，爲着要衝破逃避現實和隱瞞現實的傳統惡習，魯迅高舉了現實主義的火炬，他大聲叫出來了……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華蓋集續編：紀念劉和珍君。）

正視現實的戰士，是跟一切「逃避現實」，「屠殺現在」，「超時代」的反動勢力勢不並立的。凡是厭惡現世的人們，「都是現世的仇讐，他們一日存在，現世即一日不能得救。」（華蓋集：雜感。）實際上，那些厭惡現世的人雖能妨礙社會的進步，然而決不能阻住歷史的車頭。他們的空想祇是證明了自身不能免於沒落的命運。魯迅斥責了那些「屠殺現在」的復古妖孽，同樣也攻擊了那種超時代的反動空想。

「超時代其實就是逃避，倘自己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又要掛革命的招牌，便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條路的。身在現世怎麼離去？這是和說自己用手摸着耳朵就可以離開地球一樣地欺人的。」

（三閒集：文藝與革命。）

在論及「第三種人」時，魯迅同樣斥責了他們的超現實、超政治的空談，他說：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着，然而並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南腔北調集：論第三種人。）

「屠殺現在」的僵尸，大抵是屬於封建剝削集團和守舊的資產階級，而自命「超然於政治之外」的「第三種人」，大抵是屬於落後的小資產階級。但他們阻滯變革現實的革命運動是一樣的。他們都不願和不能正視現實，都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掩飾黑暗的現實；不過「現在的屠殺者」是以復古主義為逃路，而「第三種人」則是

以自由主義爲逃路罷了。

許多逃避現實的人鄙視現在，他們把自己的「美妙理想」寄托於遙遠的將來，但是他們不知道：「將來是現在的將來，於現在有意義。」（且介亭雜文。）把將來和現在切離開來，那明明是企圖轉移大眾注視現實的目光，和迷戀骸骨的復古份子是一樣有害於社會進步的。魯迅斬釘截鐵地昭告青年說：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罷！想出世的，快出世罷！想上天的，快上天罷！靈魂要離開肉體的，趕快離開罷！現在的地上，應該是執着現在，執着地上的人們居住的。」（華蓋集。）

又說：

「但爲現在抗爭，却也正是爲現在和未來的戰鬥的作者，因爲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且介亭雜文序。）

然而魯迅並非只執着於現在而忽視將來的，他堅決地相信，未來的中國與世界是必定優勝於現在。雖然他最初僅能從進化論着眼，對於「新的社會的起來」，只是熱烈的「希望着」，而「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麼」，（且介亭雜文：答國際文學社問），但他對於未來並不絕望，他總不斷憶想着那未來的新社會的遠景。因此，他痛恨那「屠殺了現在」也「屠殺將來」的傀儡，以慈母似的心懷高呼「救救孩子」，以導師般的熱誠指引和勉勵青年。少數青年的墮落與欺騙並沒有動搖他對青年一代的熱愛與希望。當他自覺地用階級論代替了他過去的進化論時，他把自己對於未來光明世界的希望寄托在新興無產者身上。他所理想的新社會，已經不是抽象的「好的社會」，而是真正能够使人「生存」，使人「溫飽」，使人「發展」的無階級社會了。

在現實世界，分明對立着光明與黑暗兩種勢力，敢於正視現實的人應當清醒認識，歷史是決不會讓光明勢力永遠消退，任黑暗勢力永遠存在的，就因為要求「生存」、「溫飽」和「發展」的人類永遠存在，這存在便是未來光明的火種。魯迅的明確的歷史現實主義使他在大革命風潮中對民族與社會的前途表示了樂觀的豫見：

「我們所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謠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麗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牠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華蓋集續編：「罷談話」。）

在另一處，他論到北京大學，曾說過這樣的話：

「我不是公論家，有上帝一般決算功過的能力。僅據我所感得的說，則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着希望的前途。」（同上書：「我觀北大」。）

他一面深信「黑暗只能附麗於漸就滅亡的事物」，另一面堅信「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着希望的前途」，這裏閃耀了他的不自覺的唯物辯證法思想的光芒。史達林在他所著的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中說過：「對於辯證法最重要的，不是目前似乎堅固的而已經開始衰亡的事物，而是正在產生與發展的事物，即使這事物目前看來，還是不堅固的；因為對於辯證法，祇有正在產生着與發生着的事物纔是不可征服的事物。」那些「目前似乎堅固的而已經開始衰亡的事物」（史太林辭），或者「漸就滅亡的事物」（魯迅語），不管牠

們外表上是如何富麗堂皇，不管牠們對於新生的事物是如何阻礙壓制，但人們在歷史的光照之下，總不難看出牠們決沒有光明的前途，牠們也決不能「因為黑暗而長存。」（魯迅語。）牠們為黑暗所附麗，可是終於不能免於滅亡的命運。為什麼？就因為牠們成了歷史發展的障礙物。當此等黑暗的宿主（Host）一經消滅，黑暗也就完結了。在另一方面，那些「正在產生着與發展着的事物」（史達林語），或者「活的而且生長」（魯迅語）的事物，儘管在目前看來，還是不堅固的，幼稚的，然而在歷史的光照之下，人們總不難看出牠們「有着希望的前途」，看出牠們是「不可征服的」，為什麼？就因為牠們是順應着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而發生，而成長。牠們「不做黑暗的附着物」，所以「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向上的事物與向下的事物這樣在歷史上衝突，在現象上就表現為光明與黑暗的鬥爭。舊中國目前似乎還相當頑強，然而在新中國的生長過程中，它終於要失去「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擁抱着它的濃厚黑暗，到頭總要讓位於光明。舊世界與新世界的將來也必然是這樣。魯迅這樣篤信着「活的正在生長」的力量，鄙棄「漸就滅亡的事物」，所以他對於正在新生的東西總是愛護不遺餘力，而對於朽腐的東西則攻擊不留餘地。當「惡意的批評家」在「嫩苗的地上馳馬」，說着「唉，幼稚得很，中國要天才」的時候，魯迅斥責了他們的狂妄，他說：

「惡意的批評家在嫩苗的地上馳馬，那當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嫩和天才的苗。幼稚對於老成，有如孩子對於老人，決沒有什麼恥辱；作品也一樣，起初幼稚，不算恥辱的。因為倘不遭了戕賊，他就會生長、成熟、老成；獨有老衰和腐敗，倒是無藥可救的事！我以為幼稚的人，或是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說幼稚的話。只為自己要說而說說，出之後，至多到印出之後，自己的事就

完了。對於無論打着什麼旗子的批評，都可以置之不理的！」（填：未有天才之前。）

他對於文藝的態度是如此，對於其他一切問題的看法也是這樣。他的愛護「幼稚」與「嫩苗」的精神使他成爲青年和孩子的良師和保姆，他的痛恨「老衰和腐敗」的思想使他成爲舊社會的叛徒和死敵。

雖然魯迅深信「黑暗及其附着物」遲早要歸於滅亡，但他又明瞭黑暗勢力是決不會自動讓位於光明勢力的，因此暴露黑暗世界的真面目，讓大眾清醒認識敵人營壘的醜惡、虛偽、卑污與脆弱，不但是以增長大眾反抗社會的警覺和勇氣，而且可以指示大眾變革現實的出路與方法。魯迅的尖銳暴露現實的藝術，正是他的戰鬥的現實主義能夠吸引羣衆震駭敵人最有力的因素。他曾自白了他從事文藝運動的旨趣：

「既不是直接對於『文學革命』的熱情，又爲什麼提筆的呢？想起來，大半倒是爲了對於熱情者們的同感。這些戰士，我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也來喊幾聲助助威。首先，就是爲此。自然，在這中間，也不免夾雜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南腔北調集：自

選集自序。）

他要「對於中國的老病狗他幾針」（集外集拾遺），所以對於「黑暗主力」所支配的舊社會要無情地暴露，要「使獸麟皮下露出馬脚」（華蓋集續編），要撕下「紳士的假面具」（同上書），至少要在他們的「莊嚴的高尙的假面具上發牠一炮。」（同上書。）

爲了要「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南腔北調集），魯迅借助了現實主義的文藝武器，他在早年的小說中，描寫了蠕動在灰色塵霧中的城狐社鼠，牛鬼蛇神。但是他不久就感覺到，用小說不易對於周遭的黑暗勢力

立刻予以反響或抗爭，他於是採取了最迅速反應現實和最直接突擊敵人的藝術手段：

「況且現在是多麼迫切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潛心於他的鴻篇鉅製，為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為現在抗爭，却也是為現在和未來的戰鬥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且介亭雜文：序言。）

這是魯迅關於雜文的性質和任務的最好說明，也是他自己要寫雜文的理由的最好詮釋。

在魯迅的雜文中，充滿着最使「正人君子」、「紳士淑女」頭痛的芒刺。他的「論時事不留面子，貶銅幣常取類型」（偽自由書前記）的突擊式的短評，揭穿腐敗社會內部的荒淫無恥，險詐萬端，卑污可笑與庸俗無聊，挖出埋藏在現實泥淖中的各種矛盾之本質，教給大眾以戰鬥的經驗與韜略。不用說，在牠們當中，閃耀着魯迅的諷刺天才。他的諷刺，恰如世界一切最高超的諷刺一樣，本質上不外是客觀醜惡現實的暴露。正像他自己所說的：

「其實，現在的所謂諷刺作品，大抵倒是寫實。非寫實決不能成爲所謂「諷刺」，非寫實的諷刺，即使能有這樣的東西，也不過是造謠和譏議而已。」（且介亭雜文二集。）

魯迅的諷刺，便是逼真的寫實。因為它的筆鋒直刺入一切罪惡的心窩，就顯出了使惡敵寒膽，使戰友快意的驚人力量。淺見者流和卑陋論客看見他的筆下寫出了許多私人的名字，於是以爲他在發洩私憤，歡喜譏罵，說他在「專一攻擊一種對象」（葉公超作：「魯迅」）。他們以爲魯迅是只配得私人恩怨「睚眦必報」的罵人專家。可是，每一個有良心的讀者不難拿魯迅的全部著作來證明，如果這個巨人是「專一攻擊一種對象」，那

麼，這個對象不是別的，正是爲惡毒們所擁抱的腐爛發臭的社會，是專門凌虐大眾個體歷史的荒淫無恥的一羣：

「權柄是在這裏，他所諷刺的社會，社會不變，這諷刺就跟着存在，而你所刺的是他個人，他的諷刺倘存在，你的諷刺就落空了。」

所以要打倒這樣的可惡的諷刺家，只好來改變社會。」（爲自書：從諷刺到幽默。）

那些插科打諢的無恥論客，攻擊魯迅個人，可是，他們常常忘記了自己是寄生在充滿着諷刺材料的腐爛的社會裏。

諷刺和辱罵決不能混爲一談。用莊嚴的弓弦射出的諷刺之箭可以擊中敵人的要害，而用油滑的口吻叫出的辱罵之聲不能淹沒敵人的狂吠。魯迅就是反對用辱罵和恐嚇來進攻敵人的。他以為「辱罵與恐嚇決不是戰鬥」

（南游北調集）：對於敵人「笑罵雖無不可，但必須止於嘲笑，止於熱罵，而且要「喜笑怒罵，皆成文章」，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並無卑劣的行爲，觀者也不以爲污穢，這種是戰鬥的作者的本領。」（同上書。）魯迅正是「喜笑怒罵，皆成文章」的諷刺能手，他的引人發笑的神妙筆致離開了嚴肅的戰鬥是不能解說的。他曾經說過：「油滑是創作的大敵。」（故事新編序言。）這種反對油腔滑調插科打諢的謹嚴風格，不但始終浸潤於他的文字生涯中，也一貫表現在他的人生態度中。這裏順便引一段他青年時代留學東京回憶的斷片：

「我第一次所經歷的是在一個忘了名目的會場上，看見一位頭包白紗布，用無錫腔演講排滿的英勇的

青年，不覺肅然起敬。但聽下去，到得他說「我在這裏罵老太婆，老太婆也一定在那裏罵吳稚暉」，聽者一陣大笑的時候，便感到沒趣，覺得留學生也不外乎嬉皮笑臉。「老太婆」者，指清朝的西太后。吳稚暉在東京開會罵西太后，是眼前的事實無疑，但要說這時西太后也正在北京開會罵吳稚暉，我可不相信。演講固然不妨夾着笑罵，但無聊的打諢，是非徒無益，而且有害的。」（且介亭雜文末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正因為魯迅是最真誠最嚴肅的現實主義者，他的「投槍的一擲」纔能「使敵人受傷或致死」，他的銳利的暴露纔能使鬼魅妖魔無所遁形。

從魯迅的作品中，人們會感覺到，他對黑暗的暴露多於對光明的歌頌，特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是如此。他的對於舊會的憤懣與憎惡，對於民族病態的無情暴露，使他的筆鋒有時透露着濃烈的憂鬱氣氛，甚至有時泛溢着淡淡的哀愁。庸俗的論客用白粉將他化粧成爲虛無主義者，悲觀主義者，以至什麼「內傾的個人主義者。」在他們評論起來，魯迅至多不過是一個憤世嫉俗的狂放文士，於是一代思想革命家被描繪成爲灰色動物的播種牌。但是，魯迅自己數百萬字的遺言就是對於這種謬議和曲解最有力的反駁。不但他的晚年著作充分證明他是一個積極捍衛光明的戰鬥者，而且他的早年著作也足以證明他是懷着光明渴望的前驅者。

魯迅是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攻擊舊社會的，是不惜以最無情的筆鋒來暴露民族病態的。可是，有誰能證明他對於中國的前途是抱着悲觀絕望的態度？有誰能證明他認爲國民性是不可改變的？他不斷目擊着和咒罵着腐敗、破爛、冷酷、兇殘的舊中國在壓迫和蹂躪進步力量，然而就在他痛心於黑暗勢力猖狂橫行的時候，他早已

響空地喊出來了：

「幸而誰也不敢十分決定說：國民性是決不會改變的。在這「不可知」中，雖可有破例——即其情形爲從來所未有——的滅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復生的希望，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點慰藉罷。」

「人類尚未長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長成，但總在那裏發榮滋長。我們如果問問良心，覺得一樣滋長，便什麼都不必憂愁。」（熱風：不滿。）

「生命的路是進步的，總是沿着無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麼都阻止他不得。」（熱風：生命的路。）

上面是他早年對於民族，對於人類的樂觀展望。到了晚年，他的積極的戰鬥的人生觀更加和革命的歷史觀明確結合起來，一掃壓迫羣衆的悲觀氣氛與失敗情緒。

「歷史決不倒退，文壇是無須悲觀的。悲觀的由來，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關心於文壇，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沒落的營壘裏。」（准風月談：「中國文壇的悲觀」。）

「無論如何，將來總歸是我們的。」（一九三二年給章索園信。）

「我確切的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且介亭雜文：答國際文學社問。）

他的永遠向前看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堅定了他對於民族與人類的光明前途的確信，對於新社會必然到來的確信。他始終在用着充滿自信的目光搜索前進，即使在他的泛濫着憂鬱與哀愁的作品中，也不斷表露着對於

「新世紀的曙光」（熱風）的嚮往。（例如野草中的希望是他對於青年的消沈與頹廢的感歎詩，這首散文詩浮現着悲涼憂鬱的痕影，然而也閃爍着熱望新生的豪情。同書中的過客、死火、淡淡的血痕中等篇也是如此。）在這樣灼熱的愛世精神之下，那裏容得了虛無主義或悲觀主義，更那裏容得了什麼「內傾的個人主義」？

歷史證明只有那些「置身事外，不辨是非……或者坐在沒落的營盤裏」的灰色一羣，纔看不到歷史的光明前程，纔會扮演沒落的悲劇中的丑角。此種不辨是非與自甘沒落的頹風固然不能阻住歷史的前進，然而它吹掃正在徬徨中的羣衆，確能散佈若干毒箭，模糊人們對於革命真理的認識，搖動大眾打擊革命敵人的雄心。魯迅的批判現實主義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要向大眾指點現實世界的是是非非，就是要堅決打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混沌主義。當一些「文壇英雄」在那裏混淆是非，罵倒一切的時候，魯迅發出了堅強的抗議：

「增加混亂的，倒是有些悲觀論者，不施考察，不加批評，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論調，將一切作者，詆爲「一丘之貉」。這樣子，擾亂是永遠不會收場的。然而世間却並不都是這樣，一定會有明明白白的非之別。」（准風月談：「中國文壇的悲觀」。）

有了分明的是非，纔會有熱烈的愛憎，「遇見所是和所愛的，就擁抱」，「遇見所非和所憎的，就反撥。」（且介亭雜文再論文人相輕。）這正是一切頭腦清醒者處世接物與知人論事的正確態度。爲正義而戰的猛士，和自命爲公正的和事老是截然不同的，他「只是唱着所是，頌着所愛，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熱烈地主張着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着所非，像熱烈地擁抱着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着所憎——恰如赫爾庫來斯（Heracles）的緊抱了巨人安太烏斯（Anteus）一樣，因爲要折斷他的筋骨。」（同上文。）至於超然於是非之外

的「和事老」與「公正君子」，明明是在淆亂是非，是其非，而非其是。因爲人「不是上帝，那裏能够超然世外，真正公正的批評。人自以爲「公平」的時候，就已經有些醉意了。」（華蓋集：並非閒話。）是的，除了病狂而外，唯有醉漢是超然於是非之外的，然而可惜他的理性已做了酒精的俘虜了。

像黑白一般分明的是非之辨，使魯迅成爲堅持真理的剛強戰鬥者，像水火一般對立的愛憎之分，使魯迅成爲獻身正義的英勇先驅者。他一經辨明了是非，分別了憎愛，就咬緊牙根，爲他所是所愛的戰鬥不息，向他所非所憎的反抗到底。離開了戰鬥，是不足以說明魯迅的現實主義的。

從青年時代起，魯迅就歌頌破壞，號召戰鬥。他讚美「立意在反抗，扎歸在動作」的偉大詩人，他提倡「主張破壞，無稍假借」的革新精神。他覓求「作至誠之聲，致吾人於善美剛健」，「作溫暖之旨，授吾人出於荒寒」的「精神界之戰士」，然而「先覺之聲，乃又不來破中國之蕭條。」（以上引文，見墳：摩羅詩力說。）他於是在寂寞蕭條之中「沈思」復「沈思」。待到他重新以「精神界之戰士」的雄姿躍上戰場時，世界革命的暖流已開始融解中國中古主義的厚重冰層了。從那以後，他的戰鬥要求透過文化革命運動，「便一發而不可收。」（吶喊序。）

中國民衆反抗專制的炸藥，在腐敗的滿清王朝的恐怖高壓之下，也曾爆炸幾次。最末的一次是辛亥革命的。然而頑強的封建守舊勢力與市民階級的妥協傾向膠結起來，真也像黃梅天的濃重潮氣，使埋藏在革命民衆間的炸藥暫時潮濕起來了。「屠殺現在的儂尸」在「熱心復古」，「崇奉國粹」的濁潮中，拚命禁錮民衆的耳目，淤塞革新的洪流。「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實並未爲共和二字所埋沒，只有滿人已經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墳：燈下漫筆。）因此喚醒人民的戰鬥精神，轟毀腐敗的吃人制度，就成爲五四運動的中心任務。魯迅的戰鬥現實主義，正在此時，重新透過文學，烙印大眾的心。他舉起了「投槍」，猛擲那些隱藏在共和招牌背後的僵尸，他號召大眾衝破一切阻住革新道路的障礙物筆直前進：

「自然賦與人們的不調和還很多，人們自己萎縮墮落退步的也還很多，然而生命決不因此回頭。無論什麼黑暗來防範思潮，什麼悲慘來襲擊社會，什麼罪惡來褻瀆人道，人類的渴仰完全的潛力，總是踏了這些鐵痰藜向前進。」（熱風「生命的路」。）

甘爲奴隸的士大夫們斥責一切反抗是「空費氣力」的妄動，他們的哲學是「不爲戎首」，「不爲禍始」，甚至於「不爲福先」（華蓋集：這個與那個），是要大家「雖死也如山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華蓋集續編：一點比喩。）魯迅就要打破那用山羊蹄跡點綴的「天下太平」。任何頑強的反抗精神，任何英勇的戰士氣概，在他都視若瑣寶：即使不能有勝利的闖將，也應該有「失敗的英雄」；即使不能有連決的勝仗，也應該有「韌性的反抗」；即使不能有旌旗蔽空的雄軍，也應該有「單身鏖戰的武人」，即使不能多有致殺身成仁的志士，也應該不乏「敢撫哭叛徒的弔客。」（以上加有黑點的引句，見華蓋集：這個與那個。）因爲絕望的抗爭總勝於卑怯的苟活，戰敗的悲歌總勝於待死的哀哭。

在五四時代，轉戰於寂寞中的魯迅還不能從社會底層中找到他的戰友，唯有在青年中高唱他的戰歌。他鼓舞青年「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熱風：生命的路），勉勵青年「無須反顧，因爲前面還有道路在。」（墳：燈下漫筆。）當歐化的士大夫們在那裏高呼「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時候，魯迅頌讚了那爲主義犧牲

牲的殉道者：

「他們因爲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烟燄。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熱風：激武。）

然而「斯世紀的曙光」只能用集體的革命戰鬥才能爭得的。當魯迅從社會底層尋覓到了浩浩蕩蕩的戰鬥隊伍，也就是尋覓到了「新的戰友」（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之後，他從那偉大的「黑土」裏看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鬥，變革，建設，成功」（南腔北調集：祝中俄文字之交），也看見了中國新社會的明朗遠景。他更清醒地認明了惟有依靠大眾的革命戰鬥，才能迎取光輝的未來。他毫無憐憫地猛攻一切虛偽的「公正」、「中立」與「超然」，剷除反對被壓迫者戰鬥的和平主義的偽裝。他堅定地指出，任何事情不能「擺脫階級的利害」，也不能「離開戰鬥而獨立」。一切有正義感的「馬前卒」，「不但要以熱烈的憎，向「吳巴」者進攻，還得以熱烈的憎，向「死的說教者」抗戰。因爲「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且介亭雜文：七論文人相輕。）

然而，單知道戰鬥還是不夠的，因爲「舊社會的根底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牠什麼。」（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這「更大的力」就是「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的戰鬥」（同上），就是永不安協永寬恕敵人的韌性戰鬥。魯迅從血的教訓中牢記着反革命勢力是從來不安協的。辛亥革命換來了一個「咸與維新」的局面，然而只因爲「先烈的好心，對於鬼域的惡毒」，使反革命的惡毒到處「繁殖起來」。結局是怎樣呢？「中國又一天一天沈入黑暗裏，一直到現在，遺老不必說，連遺少也還是那麼

「多」，「此後的明白青年，爲反抗黑暗計，也就要花費更多更多的氣力和生命。」（填：論費厄澁頓應該緩行。）魯迅的眼光足夠銳利的，他在大革命前夜，不但已經數說了革命對反革命讓步所蒙受的損失，而且預見了革命黨人的機會主義將引到怎樣慘酷的失敗。他明白道破了政治鬥爭和社會革命的普遍真理：指點了革命軍衆免避重大損失的正確道路。他主張用「打落水狗」的澈底戰鬥精神根本消滅進步勢力的敵人，離棄寬恕和妥協。他深知對敵人寬恕，就是對戰友犯罪，因此以爲寬恕是「性漢所發明」的「美德」。（填：雜憶。）在潮死時，還斬釘截鐵地申言對怨敵「一個也不寬恕」。（且介亭雜文末編：死。）他對於舊社會惡勢力的洞若觀火的考察堅定了他反對縱惡的決心：

「……「疾惡太嚴」，「操之過急」，漢的清流和明的東林，却正以這一點傾敗，論者也常常這樣責備他們。殊不知那一面，何嘗不「疾善如仇」呢？人們却不說一句話。假使此後光明和黑暗還不能作澈底的戰鬥，老實人誤將縱惡當作寬容，一味姑息下去，則現在似的混沌狀態，是可以無窮無盡的。」（論費厄澁頓應該緩行。）

正因爲「善」的方面，「老實人」太多，一味「縱惡」，「寬恕」，「姑息」，「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結果老是「新的敵不過舊的」（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老是革新勢力吃虧上當。難道過去血跡斑斑的史頁還不够證明魯迅的警告是值得一切戰士牢記的嗎？從太平天國一直到大革命，每一回革命隊伍的慘敗，除了客觀的原因外，在主觀上總不能否認，革命對反革命的寬容，軟的戰鬥精神的缺乏，造成了連續不斷的血債。

魯迅的現實主義是富於戰鬥性的，同時他的戰鬥思想也是富於現實性的。所謂現實的戰鬥思想，就是清楚地認識戰鬥的客觀條件，正確地估量革命的主觀實力，根據此種認識與估量，跟黑暗勢力堅忍地穩紮穩打地長期作戰，這裏當然容不了各式各樣的浪漫蒂克的烏托邦空想，也容不了一切右傾和「左傾」的機會主義。真正的革命戰士時刻都在為奔赴遠大的革命目的而奮戰，他們永不離開理想的火花。然而得時刻警戒各種美妙空想的誘惑，得像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安泰烏士（Atlas）一樣，「永遠站在地上，靠在生育和撫養他的母親身上，以便取得源源不絕的新力量」（史太林），他們得經常「與人民維持聯繫」（史太林），腳踏實地的向前看，向前進。他們必須不斷地接觸實際的社會戰鬥。一切烏托邦的門不能為他們而開，反之，一切現實主義的路須由他們來開。倘或不然，即使口頭上高歌得如何慷慨激昂，文筆下描畫得如何光輝燦爛，也只能吹起許多帶有紅色的肥皂泡，「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二心集。）

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者在革命進軍時和革命勝利後，往往容易熱狂興奮，但也容易動搖幻滅，頹廢叛變，就因為在他們的頭腦裏，預先按照自己的美麗空想打好了革命的烏托邦圖樣。當實際的情形一和這張華美的圖樣衝突起來，他們便唉聲嘆氣，昏天黑地，跌倒在革命的輪盤下面。這就是魯迅所說的：「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二心集。）為什麼「左翼」容易變成右翼呢？那是因為不明白：

「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的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却是麻煩的事。所以對於革命抱着浪漫詩人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

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革命是清除積穢的麻煩事業，要把幾千年堆積在中國地面上的垃圾廢清，開闢美麗的田園和康莊的大道，雖不但需要集合無數人力，而且需要切實工作者在污穢腐爛的塵垢黃土之上，在雜亂刺足的瓦礫荆棘之中，任勞任怨地工作。他們自然不是苦行修煉的高僧，他們是血肉做成的戰士，當然要求快樂和自由；然而他們並不預先虛懸一個快樂和自由的極境，而是以大衆的快樂自由爲自己的快樂自由，是以大衆的榮辱休戚爲自己的榮辱休戚，是把自己的情感、理想和工作融化在大衆的生活、思想和戰鬥之中。馳驅在大地上的清醒戰士決不至於浪費他的氣力，爲夢裏的樂園而舞蹈，又爲樂園的失滅而哭泣。他們的樂園是用赤血和苦汗從叢莽中開拓出來的，是以跟泥土搏鬥的艱苦工作耕犁出來的。如果在長期的大規模的墾荒掘土的工作中，碰到了惡風淫雨，飛沙走石，毒蛇猛獸，那決不是什麼意外的遭遇；倘若沒有這些遭遇，那纔是天國的奇蹟，人間的怪事。正因爲革命的人間不是神祇的天國，所以革命的兵隊也決不是神前的天使，因此：

「倘說，凡大隊的革命軍，必須一切戰士的意識，都十分正確，分明，這纔是真的革命軍，否則不值一哂。這言論，初看固然是很正當，澈底似的，然而這是不可能的難題，是空洞的高談，是毒害革命的甜藥。」（『心集』：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參加革命隊伍的人不是來自一個階級，受過同一教養，當然不免有着各樣的意識和氣質在革命戰鬥中混流着，衝突着。也正因如此，所以在「行進時，時時有人退伍，也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加成爲純粹精銳的隊伍了。」（『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這裏不妨用

一個比喻來說明。經過城市邊沿流動的河水，總不免夾雜着許多市塵的塵垢污穢，然而只要河身不被堵塞，這些雜亂的渣滓決無礙于河水的奔流；愈向前奔流，也就愈加澄清，愈加活潑。革命隊伍的進軍何嘗不是如此。倘使不用神國天使的尺度來測量革命戰士的長短，就應該從大處着眼，認識革命乃是長期的對敵作戰，尚時也是革命隊伍不斷的自我鬥爭。因為「改革的事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極樂世界」（華蓋集），「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麼「止於至善」，這人間世便同時變成了凝固的東西了。（而已集）。革命隊伍誠然在進軍時會夾雜着許多無用的塵污渣滓，但是清醒的戰士總不能因為腹有蛔蟲而長期絕食，他們必須是始終沈酣於在戰鬥的大歡喜中，「一面克服着，一面進軍着，不會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後行進那樣的傻事的。（南腔北調集）。」正因爲如此，那些「非革命的急進論者」要求「現在的戰士都是意識正確，而且堅於鋼鐵之戰士，不但是烏托邦的空想，也是出於情理之外的苛求。」（二心集：非革命的急進論者。）

魯迅不但用清醒的現實主義來爭取革命，他對於一切事物與問題的看法，也是從現實的歷史發展過程着眼，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到處閃動着辯證法的火花。例如，對於語文，他就是處處從「歷史的現實主義」（借用王任叔的用語）出發。他認爲「人類將來總當有一種共同語言，所以贊成Esperanto」，但他又說：

「至於將來通用的是否 Esperanto，却無從斷定。大約或者便從 Esperanto 改良，更加圓滿；或者別有一種更好的出現，都未可知。但現在既是只有這 Esperanto，便只能先學這 Esperanto，現在不過草創時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獨木小舟；倘使因爲預料將來當有汽船，便不造獨木小舟，或不坐獨木小舟，那便連汽船也不會發明，人類也不能渡水了。」（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通信：渡河與引路。）

對於中國文字他也是如此看法：

「古文已經死掉了，白話文還是改革道上的橋梁，因為人類還在進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獨有萬古不磨的典則。」（華蓋集續編：古書與白話。）

他並不把世界語和白話文看作「萬古不磨」的極境，他以為它們都不過是語文發展過程中必經的階段，正像渡河的「獨木小舟」和「橋梁」。自然，他發表這些意見的時候，還是從進化論的觀點出發。然而忠實於客觀真理的進化論，和唯物辯證法不是有着最親近的血緣嗎？只有庸俗的進化論纔無視事物的內在矛盾以及由此矛盾引起的運動與發展。魯迅早期的進化論思想正孕育着革命的辯證法的個別因素，這就是他能夠跨過啓蒙主義和進化論而走向社會主義和階級論的內在動因。

在看待一切問題的時候，雖然永遠注視遠大的目的，但不虛懸一步達到的極境，而祇是緊緊抓住問題的實質，留心實現目的的步驟，這就是魯迅的一貫的現實主義作風。因此，他對於人物和事情決不按照一個固定不變的圖樣一味苛求，同時也不放鬆對於遠大理想的追求。他憎惡沒有骨氣出賣靈魂的政治「奸商」和「革命小販」，然而不奢望一切戰士都立刻變成完善無瑕的聖賢；他提倡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但並不苛求每一個作家都硬寫革命文學；他主張提高文化的水準，但同時注重通俗文化的普及；他渴望有完美的翻譯，但同時認為應當用「吃蘿蔔果」的精神接受翻譯；……（參看王任叔著：戰鬥與學習）。所有這些，都足以證明他是和公式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反對的，在他的思想中流注着實事求是的現實主義血液。

因為對一切問題和事情抱定認真不苟，實事求是的精神，所以反對一切「只圖說得暢快」的「非革命的革命急進論」，同時也反對不務實際專重標榜的空頭主義，這就鍊成了他的嚴肅工作的特性。他不但善於打擊敵

人，而且勇於解剖自己。（他曾經說過：「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寫在「墳」後面。）他的虛心崇實的精神，使他甘為真理面前的「孺子牛」和革命戰綫的「馬前卒」。因此在創造社論戰的時期，他情願「等待有一個操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槍法的人來狙擊」他。（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在論到介紹科學的文藝理論的時候，他很直白地說：「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傷處的時候，我就忍痛。」（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這種用普羅米修士的火來「煮自己的肉」（同上）的自我犧牲精神，正是從他的熱愛真理，嚴肅工作的卓越特操蒸發出來的。他從來不以導師自命，然而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有誰比魯迅更有資格在默默地充任青年的博大堅忍的導師呢？有誰像他那樣熱誠地給廣大青年施行嚴肅工作的洗禮呢？當一些自命為青年導師的名流學者在那裏向青年招搖撞騙的時候，他勸導青年用「自力更生」的精神作事做人：

「青年又何須找那掛着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闢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麼荆棘塞塗的老路，尋什麼烏烟瘴氣的烏導師！」（熱風。）

當自暴自棄者流在那裏對青年散佈冷氣，阻絕青年進路的時候，他噓出了溫暖青年的煦氣：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熱風：隨感錄四十）

一。）

集合無數黑暗裏的火花，不就蹶過難得的炬火麼？「石在，火種是不滅的」（且介亭雜文），魯迅是第一

個抱着此種自信站在青年當中擊石生火的巨人。

恩格斯在論及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學時，曾經極深刻地說過如下的話：

「只要真切地描寫現實的相互關係，毀壞了在那上面的作偽的幻影，使資產階級的樂觀主義發生動搖，使人們對於現在秩序的永遠支配權發生懷疑，那麼，社會主義的傾向的文學就充分盡了它的使命了。」

（Engels 致 Minna Kautsky 的信。）

魯迅就是最真切表現現實暴露現實的天才作家，他用火炬一般的筆驅除了被偽善者和騙子們罩在現實上面的作偽的幻影，動搖了封建守舊勢力和頑固資產階級的欣然自得的太平天下，使大眾對於現在的社會秩序由懷疑而憎恨，而反抗。但他不止是一個現實主義的和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文藝作家，他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戰鬥現實主義者和革命思想家。因此，他的著作不限於表現和暴露現實，他高舉了指引大眾變革現實的火炬。他批判和反抗籠罩中國民族的腐敗傳統，指示大眾注視那嚴重威脅自己命運的民族病態和社會黑暗，從辨明是非和分別憎愛之中堅決保衛光明戰線，反對黑暗主力；並且永遠向前看，以樂觀的自信沈澗於戰鬥的大歡喜中。他警告和感召廣大的革命羣衆，要他們養成堅忍奮鬥的韌性作戰精神，對敵人決不寬恕，決不姑息；但同時要明戰術，重實力，他反對一切夢游病式的空想主義，要求戰鬥大眾正確估計客觀情勢和主觀力量，並且從大處着眼來整飭革命隊伍，爭取戰鬥勝利。他反對一切機械看取事物籠統解決問題的公式主義，要求願意前進的人們清醒地剖析真實，具體地處理事情。他反對一切不尚實際的空談和自暴自棄的冷氣，要求大眾積極地實

踐，嚴肅地工作。這些就是織結在他的思想中的現實主義經緯，就是他教育中國人民的現實主義課程的主要綱目。自然不用說，他的現實主義是始終烙印着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顯著特徵的。

第二章 啓蒙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的魯迅

第一節 魯迅在中國民主運動史上的地位

一個澈底的思想革命家，必然是堅決的革命思想家；同樣，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也必然是熱烈的革命戰鬥者。魯迅是現代中國號召思想革命和堅持戰鬥現實主義最英明最強毅的先驅人物，他的思想不僅是中國人民要求進步、希望光明的意志的最集中的表現，同時也是中國民主革命運動往前發展和走向深入的最明確的反映。誠然，他的作品很少包含「民主」、「民族解放」、「反封建」、「反帝」一類的字眼，他的一生是思想活動多於革命實踐，但人們沒有理由否認他的思想和工作是澈頭澈尾浸透着革命的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而這種革命的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通過普羅列塔利亞的革命巨潮，終於和科學的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交織在他的身上。在這一章，我們要探討作為革命的啓蒙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的魯迅留給我們的豐富思想遺產，隨後，我們還要把這個巨人當作民族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來研究。

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開始於清末，更新於五四，而壯大於大革命以後；魯迅身歷了多次的革命巨變，始終代表着中國被壓迫民衆，和阻礙人民進步的陳舊社會搏戰。他是舊中國的勇敢反對者和新中國的堅決催生者；是舊民族生活的銳利批判者和新民族風氣的光輝創造者。從民主革命的要求來看，在現代中國魯迅之被歷史選擇為偉大的「精神界戰士」（填：摩羅詩力說），是絕非偶然的。這個巨人不但代表永遠前進的中國位

萬人民掃蕩野蠻的中世紀的「舊成法」，痛擊奴役中華民族的異族壓迫勢力，且指引廣大民衆怎樣去掙脫那桎梏他們的精神與生活的全部枷鎖，怎樣用最小的犧牲去博取偉大的戰鬥勝利。

在現代中國民主革命運動中，產生了若干卓拔的思想戰士和革命戰士。依照「蓋棺論定」的說法，在已故的歷史人物中，有兩個可以稱爲中國民主主義史上最不朽的偉人，一個是三民主義的創始者和執行者孫中山先生，另一個便是思想家兼革命思想家魯迅先生。誠然，這兩個巨人有著各自不同的活動領域，孫中山的戰鬥事業是側重於政治實踐，而魯迅的戰鬥事業是側重於思想運動。就思想發展來說，孫中山先生基本上是一個民族民主革命者，而魯迅在晚年更接受了普羅列塔利亞的社會主義。但是，這些並不妨礙在他們兩人之間，有著相似之點。首先，他們同是現代中國最有遠見和魄力的民族解放運動者和民主主義者；他們畢生爲爭取新中國的建設而奮鬥，爲解放被壓迫民衆而苦戰，在中國的政治啓蒙上和思想啓蒙上都作了最廣大的貢獻。第二，他們都對勞苦大衆表示最深摯的同情，中國億萬農工的解放利益，特別爲他們所尊重，愈到晚年，他們愈是推重勞苦大衆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力量。第三，他們的思想都不斷反映着時代的進展而向前進步，這就是說，他們的思想不是一次完成的，因而也就不停滯於歷史的某一點上。中國革命運動越是向前擴展，越是深入衆衆，他們的戰鬥思想也越是充實而鋒銳。這兩個歷史巨人顯示其彼此相似之點，決不是偶然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洪流要求從各方面（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產生最傑出的代表人物。歷史從政治戰鬥中選擇了孫中山作爲中國前期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從文化戰線上選擇了魯迅作爲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領袖。他們出生在同一個苦難的中國，接觸着相同的被壓迫羣衆，面對着差不多同時代的中國革命要求，親近着同一方面的世界革命潮

流，而且在晚年都和無產階級的戰鬥隊伍保持了密切的聯繫。中國革命的民主性質規定了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根本任務，誰能最堅決、最正確反映和執行這種任務，誰就可以成爲中國最偉大的革命代表人物。孫中山和魯迅恰像出現在同一星座運行在同一軌道的一雙巨星，他們的年齡不同（魯迅比孫中山小十五歲）和活動範圍不同，並不妨礙他們在現代中國以各自的偉大戰績互相輝映。

孫中山對於魯迅的影響究竟有多麼大，我們很難給予精確的估計，但從魯迅推崇孫中山的言論看來，不難得知魯迅是熱烈贊同孫中山的民主革命主張的。在論及孫中山的時候，魯迅對於這個偉大戰士給予了最公允的評價：

「凡是自承爲民國的國民，誰有不記得創造民國的戰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們大多數的國民實在特別沉靜，真是喜怒哀樂不形於色，而況吐露他們的熱力和熱情。因此就更應該紀念了；因此也更可見那時革命有怎樣的艱難，更足以增加這紀念的意義。

記得去年逝世後不很久，甚至於就有幾個論客說些風涼話。是憎惡中華民國呢，是所謂「實備賢者」呢，是賞弄自己的聰明呢，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歷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仍然繼續着進行近於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臨終之際，他說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集外集拾遺：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孫中山的「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的戰鬥精神，正是魯迅歷來歌頌的韧性反抗精神。惟其因爲他禮讚不朽的戰士，也就詛咒那毀謗戰士的蒼蠅式的奴才：

「戰士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噁着，營營地叫着，以爲得意，以爲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於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爲何長不朽的聲音，因爲牠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

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

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去罷，蒼蠅們！雖然生着翅子，還能營營，總不會超過戰士的。你們這些蟲豸們！「戰士和蒼蠅。」（後來，魯迅自白了他的這一篇「戰士與蒼蠅」的題目：

「所謂戰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國元年前後殉國而反受奴才們譏笑糟蹋的先烈；蒼蠅則當然是指奴才們。」（集外集拾遺：這是這聲一個意思。）

奴才對於戰士總是譏笑糟蹋，而戰士對於戰士總是愛惜保衛。沒有奴才，不能反襯戰士的光輝和偉大，沒有後起的戰士，不能顯揚先進的戰士的壯烈和可愛。魯迅對於一切奴才毫不吝嗇他的攻擊火力，而對於一切受奴才譏諷的戰士，則毫不吝惜他的精護能力。他看穿了，一個偉大的戰士在他死後，不僅受着某一類奴才們的譏笑，而且受着另一類奴才們的糟蹋。這些戰士的遭殃，正如他所說，「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官行而亡，於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蓬起，既以自衛，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釣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個得悲哀的。」（且介亭雜文：憶章素園君。）實際上，這種情形古今中外如出一轍。列寧就會說

過：

「在大革命家活著的時候，壓迫階級經常的緝捕他們；對他們的學說極端的憎惡，極端的仇視，和瘋狂似的造謠與中傷。在他們死了之後，便企圖把他們作爲無害的神像，所謂把他們加入聖人之列，略略表彰他們的名字，以「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却開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滅這個學說的革命鋒銳，使它庸俗化。」（國家與革命中譯本。）

馬克思死後在歐美遭到奴才們的如此待遇，孫中山死後，在中國也遭到同樣的命運。魯迅憤慨地寫道：

「預言者，即先覺，每爲故國所不容，也每受同時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時常這樣。他要得人們的恭維讚嘆時，必須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總而言之，第一要難於質證。

如果孔丘、釋迦、耶穌基督還活著，那些教徒難免要恐慌。對於他們的行爲，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樣慨嘆。

所以如果活著，只得迫害他。

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爲化石，人們都稱他爲偉人時，他已經成爲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謂偉大與渺小是指他可給自已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蔷薇。）這裏只提到了孔丘、釋迦、耶穌基督的名字，但這些名字實際不過是孫中山和其他革命戰士們的代名詞。

據說，魯迅在一處演講，就會慨嘆孫中山死後被奴才們當作「偉人的化石」利用。（這是以前聽友人王任叔兄說的。）現在，魯迅自己也作了「偉人的化石」了，那些嘖嘖營營的蒼蠅，那些「謬託知己」的奴才，不正

是以先前對付孫中山的老手法——更卑劣的手法——來對付魯迅嗎！

然而「完美的蒼蠅」決不能用他們的嗡嗡營營來掩住戰士的不滅呼聲。魯迅幼時的「法名」——長庚正象徵了魯迅在中國民主革命巨湖中的強大光輝。他真像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中國的長庚星（這比喻是自吳沫一篇文字中借用的），照耀在荒冷的黑暗的原野，指引廣大的被壓迫民衆奔赴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民主主義戰線。

魯迅出生在腐敗的封建社會中，他身受封建勢力的欺凌與迫害，目擊統治階級的殘酷與怯懦，使他自小對舊社會生出憎惡和仇視的心情，這種心情和他的民族解放要求結合起來，就使他一開始便以主要的鋒芒對封建制度宣戰。

第二節 魯迅的啓蒙主義思想

魯迅在反封建戰鬥中所表現出來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他的思想是側重對於封建精神體系的攻擊。他從青年時代起，就強調國民性的改造問題，重視民族病態的揭發與療救。誠然，他對於國民性與民族病的瞭解，最初是比較抽象的，當時他還不能從階級關係的分析來發掘那造成中國社會衰朽的根本原因；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無疑的，就是他對於舊社會以及支配這個社會的剝削階級與壓迫機構，一開始就表示強烈的反對，他感到「舊社會的腐敗」（且介亭雜文），「憎惡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牠的潰滅」（二心集序），因此他要對舊社會作「反戈一擊」（墳）。他痛恨那些欺凌弱者的壓迫份子與剝削集團，寄同情於被損害和被侮辱的卑微弱小人羣，這種憎惡吃人制度、同情被害羣衆的風格正像一根紅線貫串在他的創作與論著中。明天中的單四嫂子，

祝福中的祥林嫂，藥中的徐兒（夏四奶奶的兒子），狂人日記中的迫害狂，傷逝中的涓生和子君，長明燈中的狂人，離婚中的愛姑，……這些都是他描寫的被迫害者的代表人物；他刻劃他們被舊社會踐踏凌虐的慘劇，教人悲憤，教人酸鼻。就是對於阿Q、孔乙己、陳士成（白光中的主人翁）這一類可笑而又可憐的典型人物，也並不遮掩他的諷刺以外的同情。反之，他對於趙太爺、錢太爺、錢洋鬼子、夏三爺、七大人、慮老爺……這一類的大人老爺，却是表示猛烈的憎惡，因為他們捧着「大小無數的人肉的宴筵」，以「愚妄的狂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墳：燈下漫筆）。這一類的惡蟲從魯迅出生一直到他病死，都不斷蠕動在他的眼前，他最熟悉他們的骨相，也最熟悉那被他們蹂躪推壓的卑微人物的靈魂。他用飽含敵意的筆刻劃吃人的惡蟲，揭露那為他們寄生的腐敗社會的真面目，同時為被凌虐、被欺侮的不幸人羣發出沉痛的不平。這種風格後來更明顯地表現在他的雜文中。正因為他深切地了解隱藏在舊社會胸懷的矛盾、猥劣、腐敗，熟悉吃人與被吃的殘酷現實，而又不甘沉默，於是毫不猶豫地對舊社會猛擲投槍。這首先就不能不擊中封建毒龍的要害。他的反封建的理性主義和民主主義，不是出發於抽象的理論與思索，而是淵源於現實的深刻考驗，特別淵源於他對於人吃人的舊社會的精密觀察。這就說明了為什麼他的全部思想發展過程和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發展過程合拍，更說明了為什麼他的民主主義傾向終於和革命的社會主義匯流為一。

從魯迅的早期作品中，不難看到，他的反封建的火力是集中於攻擊封建的意識形態，在辛亥前夜是如此，在五卅時代更是如此。就是到了晚年，雖然他所攻擊的對象比先前廣大得多，但仍沒有放鬆他對於封建守舊意識體系的攻擊。在一向缺乏民主主義與理性主義傳統的中國，攻擊根深蒂固的封建守舊意識，打破地主紳士階

級榨榨人民的精神統治，正是進步智識份子最必要的而又最自然的戰鬥任務。帝國主義的橫暴闖入，在中國誠然造成了「亙古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然而它並沒有沖去淤積在中國民族生活河道中的封建主義污泥，反之，它用這種淤泥築起了防止中國人民革命與進步的反動堤防。封建統治者不備利用政治和武力削奪人民的自由權利，壓榨人民的血肉，而且利用最野蠻、最猥陋的思想統治，來麻痺人民的活動能力，奴役億萬不識不知的愚衆。這樣來維持他們在殘山廢水之間的荒淫貪饕的獸性生活。他們是極端殘酷橫暴的，同時又是極端卑怯荏弱的。吃人的倫常禮教，守舊的儒教孔道，陳腐的「祖傳」「老例」，這些都被他們利用來作為桎梏人民的精神鐵錐，而且都為帝國主義所支持，所援引。廣大人民沉陷在馴順、愚昧、自欺、懦弱、猥鄙的麻痺狀態中。不能打破這一類的精神鐵錐，人民就不能自覺地起來揮動他們攻擊舊中國的臂膀，就不能在舊中國的廢墟上創建富有生氣的新中國。魯迅正是最堅決號召大眾反抗封建主義精神統治的偉大門士。他在清末，就已注意到喚起人民的自覺（所謂「自覺之聲發：每響於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響。——摩羅詩力說），致力於攻擊愚民統治與奴才傳統，反對「安窮守陋，篤於舊習」（填：文化偏至論）的國民精神狀態。但這種呼聲隨即沉沒於當時的守舊主義的死水中。經過了一個相當時期的孤獨的「沉思」，他終於在五卅時代找到了反封建的文化隊伍。從那時候起，他就沒有停止過反吃人體教和守舊傳統的鬥爭。他猛烈進攻「屠殺現在」的僵屍，衝破「傳統思想的長城」，剝露所謂國粹主義的本相，主張用科學和合理思想的血液注射到中國民族體裏，徹底排除那潛伏在中國文化血脈內的毒菌。他沉痛地慨嘆道：

「老大的國民儘鑽在僵硬的傳統裏，不肯變革，衰朽到毫無精力了，還要自相殘殺。於是外面的生力

軍很容管地進來了。真是「匪今斯今，振古如茲。」（華蓋集：「忽然想到」。）

要推翻這「僵硬的傳統」，須要徹底的變革，這就是「大呼猛進，將蹣跚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墳：「再論雷峯塔的倒塌」。）一切「朽腐的名教」，「僵死的官語」，「侮蔑盡現在」的倫常，「堆在道路上的祖傳，老例」，……都要毫不可惜地掃除掉。

魯迅是第一個指出中國舊社會支配者有意識地用思想麻藥來執行愚民政策的人。他深刻認識了封建統治階級是如何巧妙用他們的意識形態來籠罩被治大眾，而被統治的民衆又如何不自覺地把統治者的意識形態來當作自己的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七十年前已經道破了這一真理）。例如一九二五年他在黃埔軍官學校演講時，就說過：

「平民……每每拿紳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

統治階級就利用了民衆的這種弱點，來從精神上加緊對民衆實行壓迫，以鞏固其野蠻的統治。中國反動剝削者及其走卒們（所謂「閩人」、「上等人」、「正人君子」之類），慣于提倡各種反動的復古思想和守舊精神，但他們自己却並不信守這些，他們祇不過是拿這些作爲欺騙和禁錮民衆的符咒。魯迅揭穿了這種虛偽的鬼把戲：

「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搆出和內心同樣的架子來。要尋虛無黨，在中國實在很不少；和俄國的不同的處所，只在他們這麼想，便這麼說，這麼做，

我們的却雖然這麼想，却是那麼說，在後臺這麼做，到前臺又那麼做……將這種特別人物，另稱為「做戲的虛無黨」或「體面的虛無黨」以示區別罷，雖然這個形容詞和下面的名詞萬萬聯不起來。」（華蓋集續編：馬上下支日記。）

「善於變化，毫無特異」正是中國的「做戲的虛無黨」的卑劣特點之一。他們自覺地用扮戲的醜惡姿態來欺騙羣衆，遮掩自己的卑鄙醜態。但是因爲民衆被麻醉太久了，不容易看穿他們的虛偽，於是被他們所利用的「傳統的權威」壓迫得不見天日。撕破他們的偽裝和假面，打翻那蒙蔽大衆耳目的「傳統的權威」，這正是一切民主主義者最重要的啓蒙任務，魯迅正是最果敢地執行這任務的殊勳者。

魯迅正確估計了封建意識形態對於人民的危害作用，但他深信反動統治者要依靠野蠻的精神統治來維持自己的剝削制度與壓迫權力，是決不可能的，理由是，他們「無法禁止人們的思想。」（續：春末閒談。）這正是一切反動統治者不能補救的遺憾。

「於是我們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這樣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沒有水滸分清，治者與被治者」，二恨其不給治者生一枝細腰蜂那樣的毒針；三恨其不將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著那思想中樞的腦袋而還能動作——服役。三者得一，國人的地位即永久穩固，統御也永久省了氣力，而天下於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單想高高在上，暫時維持國氣，也還得日施手段，夜費心機，實在不勝其委屈勞神之至……」（續：春末閒談。）

正因爲人民大衆不盡是心甘居於奴隸地位的，所以「國人的天下一時總難得太平。」（同上。）魯迅對中國人

民並不絕望；但熱烈地相信憑着人民大衆自己的「猛志」與「實力」，是一定可以衝決統治者所設的天羅地網，顛覆「閹人的天下」的。「無論什麼黑暗來防範思潮」（熱風），自覺的人民大衆「總是踏了這些錢糞藜向前進。」（同上。）大人老爺要想熄滅那燃燒在大衆頭腦中的反叛思想，豈非枉費心機嗎？

但魯迅認爲黑暗的逆流阻力太多，喚起民衆的覺醒和敵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需要進步份子有系統地堅忍地進行艱鉅的改革事業。他說：

「讀史，就愈可以覺悟中國改革之不可緩了。雖是國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華蓋集：這個與那個。）

魯迅所說的國民性的改革，就是在粉碎反動統治者的精神牢獄的戰鬥中，創建民衆自己的意識形態，來代替腐敗社會的「精神文明」，這是一個艱鉅的啓蒙事業。但是依靠中國的固有文化，決不能執行這種事業，因此只有輸入西洋文化的血液，才能療救中國民族的精神敗血病。魯迅在辛亥革命前夜，就曾指陳：「國民精神之發揚，與世界識見之廣博有所屬。」（墳：斷魂詩力說。）在五四時代，他更勇敢地喊出打破舊偶像的口號。他力說：「舊像愈推破，人類便愈進步。」（熱風。）他不但堅決反對一切閉關主義，而且也猛烈攻擊「學了外國本領，保存中國舊習」的中體西用主義。誠然，在當時，他還沒有接觸到國際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與歷史觀，他祇能從西洋資本主義的科學與文明的武庫中取出對抗封建反動精神統治的武器，他說：「驅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總比中國陳舊的好。與其崇拜孔丘、關羽，還不如崇拜達爾文、易卜生；與其犧牲於瘟將軍，五道神，還不如犧牲於Apollon」（熱風：隨感錄五十六。）因爲他認爲「現在的外來思想，無論如

何，總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氣息，互助共存的氣息。（同上書：樂武。）在五四啟蒙運動的初期，用西洋資產階級的文明來對抗封建的古舊文明，在客觀上自有其進步的意義。那時中國勞工階級還沒有在政治和思想上樹立鉅大的領導力量，農民也沒有顯示其自覺的戰鬥力量，厭惡封建文明和嚮往光明的進步智識份子採取西洋的文化武器，來打碎那種糟人民理性的精神鎖鏈，正是必然的事情。然而在中國工人階級由自在階級轉變為自為階級以後，新的科學世界觀與科學歷史觀逐漸代替了歐美資產階級思想文化在中國的地位，舊的精神武器就不適用了。魯迅終於明確看出了，在世界對立着兩種不同的文化體系，一方面是帝國主義的即沒落資產階級的文明，另一方面是社會主義的即新興無產階級的文化；前者支持中國反動的封建文化，麻痺中國人民的覺醒，後者武裝中國人民的頭腦，推進民族解放與民主革命的偉大戰鬥。魯迅選擇了後一種文化體系來加強和刷新中國理性運動——啟蒙運動，雖然同時並不拋棄西洋進步資產階級的文化成果。他不但熱烈地提倡新啟蒙運動，而且辛勤地介紹國際新興的文藝理論與文藝作品。他屢次指出社會科學理論介紹到中國的必要，領導以無產階級為中心以人民為本位的大眾文化運動，幫助進步文化運動者改正了許多認識上和策略上的偏頗與錯誤，哺育了許多新進的文化幹部。凡此都是他的新理性主義在新民主運動中的戰績。但是，他深知中國幾千年的舊社會傳統乃是積滯在歷史河道裏的厚重淤泥，不能清除這淤泥，疏濬人民大眾的自覺的源流，要完成巨大的改革幾乎是不可能的。列寧就曾說過：「習慣的勢力沾染千千萬萬的人，是一種可怕的勢力。」（什麼是人民之友。）魯迅也表示過同樣的意見：

「真實的革命者，自有獨到的見解。例如烏路諾夫（案即列寧——心）先生，他是將「風俗」和「習

慣」都包括在文化之內的，並以爲改革這些很爲困難。我想，但倘不將這些改革（擬爲「但我想，倘不將這些改革」之誤植。——我所根據的是全集版——心），則這革命即等於無成。……」（二心集：習慣與改革。）

這裏自然不可把魯迅的意思從唯心論的觀點加以曲解，他並非說先要改革風俗和習慣，再來發動革命，而是把這些改革作爲整個革命事業不可怠忽的任務。舊的習慣勢力如果在革命後仍然頑強地存在，不能和統治者的崩潰一同崩潰，就證明革命尚未成功，證明反革命還在伺隙反攻。要打破那阻礙歷史川流的封建舊習慣，須要一切民主主義者和啓蒙運動者深入民衆的生活，實踐艱苦的民衆教育工作。魯迅寫道：

「有志於改革者倘不深知民衆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干，僅止於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嘆賞，得些自己滿足。」（同上書。）

一切反封建的理性主義運動，都沒有超越民主革命的任務。魯迅從開始啓蒙工作起，直到接受社會主義策進新理性運動爲止，不曾一時停止過反對舊中國的「精神文明」的戰鬥，這種戰鬥執行得比任何人堅決有力，它給予中國民主革命的影響幾乎是看不見的，然而却是異常深刻廣大的。今天活躍在中國革命最前線和轉戰於文化思想戰場的青年，幾乎沒有不受過魯迅的直接或間接的薰陶。他的輝煌的理性主義和現實主義，跟革命大衆的戰鬥生活熔合爲一，鑄成了新中國的革命風紀。一切頑惡的舊中國寄生蟲和兇殘的中華民族敵人，都不能動搖這崇山般的風紀。

凡是反封建的理性運動和民主運動，總是離開不了人的權利的尊尙的。歐美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都曾在

革命旗幟上大書人權自由等類的字樣，中國的革命運動也有過類似的情形。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理論家和政治煽動家，很少不是在那裏宣揚着抽象的人權論和人道主義，他們往往懸想着一些抽象的人權原則；待到勞動羣衆自覺到現社會的壓迫和剝削和此等原則相衝突，而起來用鬥爭力量要求真實的生活權利和自由權利時，便適受到過去人權論者或他們的後繼者的殘暴迫害。顯然，抽象的人權主義和人道主義本身就包含了和大衆利益不相容的矛盾。魯迅也是堅決揭發人權思想來對抗吃人的封建社會壓迫的，然而他的人權思想大體上不是從抽象的原則出發，而主要是從具體的現實出發的。不錯，他早年接受了尼采的超人思想，紹介過斷川白寸的生命力學說（如習的家徽等），翻譯過阿志巴綏夫的虛無主義作品（如工人救惠略夫等），這些思想、理論與作品和魯迅的現實主義風格本來是衝突的。然而在他尚未接觸到科學社會主義的武庫之前，爲了要從封建專制主義的濃重黑暗中打開一條出路，他祇能屏入這些泥漿，加以蒸餾，聊以慰藉在寂寞和饑渴狀態中跟黑暗搏鬥的戰士。他在輸入這些東西之時，或許沒有覺察到它們的毒害。他所能看到的，是它們在反封建的光照中，自己本相不盡相符的近似美妙的擴大投影。因此，他從尼采那裏強調了反因襲和個性解放的精神，從斷川白寸那裏強調了反權威和「生之歡喜」的思想（斷川白寸的思想不過是叔本華、尼采、卡奔特（G. Carpenter）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的哲學思想在文學理論上的混合表現），而從阿志巴綏夫那裏強調了反社會迫害和主張報復的性格。我們固然不能妄用那與康有爲式的「托古改制」相對的「托洋改制」四字來形容魯迅早期的思想，但魯迅從某些外國思想學說的投影中擷取二三點，和他的現實主義思考鑄合起來，作爲攻擊舊社會的火力，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錯誤的有毒的學說，在某些特殊條件之下，有時也可以通過歷史的折光作用，

作爲一個思想家走向真理之門的意外的誘導力。達爾文因爲讀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而悟到物種的生存競爭（自然，倘使誇大這一點，把馬爾薩斯的人口學說當作達爾文的思想泉源，那就是戴非子所說的「非愚即誣」了），便是思想史上有名的佳話。在現代世界文學史上，我們看見高爾基也曾受過尼采的影響（日本文藝批評家昇曙夢曾經有過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見他的高爾基的思想爲人和業精），然而這並不妨礙他成爲一個革命的現實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魯迅在早年部分的接受了尼采他們的影響，是和達爾文受到馬爾薩斯的影響相似的，尤其和高爾基受過尼采的影響相像。假如他不是依靠中國反封建的民主主義和理性主義火光，不是憑藉自己的批判的現實主義眼力，來輸入尼采等的學說與思想，他就會變成尼采等的奴隸，而決不能作爲中國偉大的啓蒙導師。當中國革命運動的向前發展尖銳暴露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勞苦大眾利益相抵觸之時，魯迅就毅然決然拋棄了尼采他們的影響，而虛心地學習運用科學社會主義的新武器，並且很巧妙地運用牠們來打擊「黑暗的主力」，這就是魯迅的可貴的蛻變，而這蛻變正反映着中國革命現實的血肉。

第三節 魯迅的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

魯迅從鮮血淋漓的現實中看清了舊社會和它的支配者的殘虐和卑劣，因此，他要否定過去的一切因襲與傳統，這不僅是指前面所說的封建精神統治和反動意識形態，而是包括全部的封建專制統治。但他的否定封建統治，並非出以抽象的說教，而是從活生生的現實剝露中解除反動權威的盔甲，使一切吃人的僵屍赤裸裸地站在大眾面前受嚴酷的拷問。他往往只是用筆和舌對吃人者提出公斷狀，而讓他的讀者與聽衆自己去審判他們，但

他決不吝惜他對惡勢力的刑罰與攻擊火力。狂人日記是他第一次控訴舊社會的吃人罪狀的文書。他暴露了中國四千年來的歷史，不過是吃人與被吃的歷史，而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國人享用的肉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宴筵的廚房。」（墳：燈下漫筆。）在野蠻的吃人制度之下，「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喫，但也可以喫別人。一級一級的制服着，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同上。）這就使舊中國充滿了暴虐、貪婪、自私、欺騙、愚昧和麻木狀態，這些膿血淋漓的「精神文明」歷來就被反動統治者用仁義道德的錦繡包裹着。他們把民衆壓在「精神文明」的古舊長城底下，爲的是要維持他們的吃人特權。推翻吃人的「精神文明」，掃蕩人面豺狼的吃人特權，爭取真實的人的權利，不正是中國人民實行的唯一道路嗎？魯迅把他的解放人民的希望寄托在全國青年身上，因此他大聲疾呼：

「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墳：春末閒談。）

顯然，他所要毀壞的，乃是建築在骷髏上的舊中國，而決不是如虛無主義者眼睛裏的整個中華民族。「所謂中國者，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這句話，除了用來攻擊那烹人肉的舊中國，抗議吃人的舊制度而外，難道還有別的意義嗎？假如魯迅所要掃蕩的，是他的「虛無主義」毀壞狂發作時所見到的整個中國，那末，他又爲什麼要噙着熱淚來鞭策中國前進呢？爲什麼又要痛斥那些失掉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的軟弱蟲呢？

列寧在論及孫中山時，曾經說過：「孫逸仙綱領的字裏行間，充滿着奮鬥的真正的民主主義……他絲毫沒

有不開政治甚至絲毫輕視政治自由的態度。」（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這句話也可以用來評價魯迅。（只要把「綱領」兩字改爲「作品」。）他的啓蒙主義和理性主義並不妨礙他在作爲思想革命家時，同時作爲革命思想家，反之，它們是與現實的政治鬥爭血肉相連的。魯迅不但自己絕不輕視政治，而且最憎惡那些自命清高不屑過問政治的超然派。他不但是民主政治的激烈主張者，而且到了晚年，成了一個卓越的科學社會主義者和革命國際主義者。在采薇那篇速寫小說裏，魯迅諷刺過那些輕視政治的超然派與中間派，你看他寫得如何辛辣：

「他們不配我來寫，」他說：「都是渾蛋。」跑到養老堂裏來，倒也罷了，可又不肯超然；跑到陽山裏來，倒也罷了，可是還要作詩；做詩倒也罷了，可是還要發感慨，不肯安分守己，爲「藝術而藝術。」你瞧這樣的詩，可是有永久性的：

「上那西山呀採牠的薇菜，

強盜來代強盜呀不知道這的不對。

神農、臧、夏一下子過去了，我又那裏去呢？

唉唉死罷，命裏注定的死氣！」

「你瞧，這是什麼話？溫柔敦厚的才是詩。他們的東西，却不但「怨」，簡直「罵」了。沒有花，只有刺，尙且不可，何況只有罵。即使放開文學不談，他們撒下祖業，也不是什麼孝子，到這裏又譏諷朝政，更不像一個良民，……我不寫……！」（故事新編：采薇。）

在這段諷喻裏，映現了一個堅決的民主政治者和社會主義者重視實際政治的戰鬥姿影。他從來不掩飾他的寫作和言論是跟現實政治血肉相連的。他的大半生沒有停止過對反動統治者的「罵」，沒有停止過「義誦朝政」，這就使他成爲「閩人」眼睛中的「不祥火鴉」，終身受到奚落，侮辱和迫害，而他所遭遇的命運恰正是「一般被壓迫大眾的共同命運；他所咀咒和攻擊的敵人，也正是一般被踐踏者的共同敵人。然而可笑的是，那些噱噱營營的「完美蒼蠅」，却在罵魯迅爲刀筆吏和罵人專家了。便是那些以「公正」面目出現的高人雅士，也在爲魯迅歎惋，可惜他浪費筆墨在罵人的事情上。他們不能也不願了解，魯迅的「罵人」乃是他的政治鬥爭的形式之一種。（自然這裏應該分別他對於民衆敵人的攻擊，和對於文化戰友的規諍，不能把兩者混爲一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約瑟夫、孫中山……這些偉人都曾在實際政治鬥爭中對敵人作過酷烈的怒罵和嘲諷。

假如罵人和被罵者不是超現實政治超階級敵對的怪物，憑什麼證明罵人和一個戰士的偉大是不相容的呢？在魯迅還沒有成爲一個自覺的社會主義者之前，他是一個最奮勇、最清醒的民主主義者，他的民主主義愈到晚年，愈加鋒利結實，而在五四時代和大革命時代，他的民主主義和理性主義有一種特別親密的結合，這種結合表現在他反對奴隸主義反對復古運動和伸張人民權利的言論中：

「中國人攜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却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面，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的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彷彿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

噢，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假使真有誰能够替他們決定，定下什麼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老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填：燈下漫筆。）

正因為「中國人攜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所以在歷史上經常被少數「主子」當做牛馬算帳，至多是由牛馬升為奴隸。因此在「亂離之世」，就成了「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在「太平盛世」，就成了「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同上書。）絕大多數的人出沒在奴隸生活狀態中，少數占有吃人烹人的「廚房」的特權者，便在千千萬萬的骷髏上荒淫縱慾；他們要使被吃者永不自覺，永不反抗，而且「使犧牲者直到被吃的時候為止，還是一味的讚歎他們」（朝華夕拾：狗彘鼠），便施行極端殘刻惡毒的愚民政策，來穩定他們的「愚民的專制」：

「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大家漸漸死下去，而自己反以為衛道有效，這纔漸漸近於正經的活人。」（華蓋集：忽然想到。）

所謂「愚民的專制」正如周揚所解釋的，是「一種肉體的奴役加上精神的奴役，必使被吃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被吃，而被吃的人，同時無意中也在吃人。」這種「愚民的專制」主要是建築在封建主對農民勞動者的殘酷

的超經濟榨取上；和土地剝削關係結不解緣的商人資本恰恰增強了此種榨取，後來的實業資本更加深了這種奴役。剝削者不但利用經濟力量，而且利用特有的「精神文明」來長期摧殘民衆的理性與人格，用軟硬兼施恩威並用的統治手段，迫使被治者匍伏在他們的腳前，捧獻自己的血和肉，供他們狂飲大嚼，隨後還得感謝「皇恩浩蕩」。吃人的和被吃的像各色各樣的魚羣似的，叢集在一湖死水裏，大家都呈現「死相」，缺少生氣。魯迅憤然揭露了這種吃人與被吃的慘情，他要使一切被人吃而又無意中吃人的大衆認識自己的生活，改造自己的生活。他在論及蕭伯納的時候，曾經說過：「譬如有一堆蛆蟲在這裏罷，一律即即足足，自以為是紳士淑女，文人學士，名官高人，互相點頭，雍容揖讓，天下太平，那就全體沒有什麼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蟲。但是，如果有一隻驀地跳了出來大喝一聲道：『這些其實都是蛆蟲，』那麼，——自然，牠也是從茅廁裏爬出來的。然而我們非認牠為特別偉大的蛆蟲則不可。」（南腔北調集：論語一年。）這段用來稱頌蕭伯納的話也可借用魯迅自己。正當「紳士淑女，文人學士，名官高人」，在一湖死水裏「互相點頭，雍容揖讓，天下太平」的時候，魯迅驀地跳到水面上來，他大喝一聲道：「這些都是吃人和被吃的魚！」自然，他也是從死水裏浮上來的，然而我們非認他為特別敏感，特別勇敢的魚不可。

但魯迅並不止於勇敢指出吃人制度的慘酷，他更進一步號召大衆用動作和反抗，把自由的洪水引進死湖似的中國。他說：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這可詛咒的時代！」（華蓋集：忽然想到之五。）

組織的軍政府。……」（朝華夕拾：范愛農。）

辛亥「光復」後，豈止紹興一地的情景是如此，全中國都不是「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嗎？」那些由地主紳商包辦的反動政權，不是在最初的白旗和後來的五色旗之下繼續維持吃人制度嗎？「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實並未爲井和二字所埋沒，只有滿人已經退席，和先前稍不同。」（墳：燈下漫筆。）在阿Q正傳裏，魯迅描寫光復後，舉人老爺在那裏敷衍民政，把總依然做著武官，一切官僚制度「一仍舊貫」，所謂改革至多是表現在頭髮上，即「枉然失去了一條辮子」，或者如阿Q似的「用竹篾盤上他的辮子。」（華蓋集：續編的續編。）魯迅在頭髮的故事那篇小說裏，就帶着強烈的諷刺意味暗示革命流了許多血，其最大收穫不過是得到了剪辮子的自由。後來，他又用幽默的語調寫道：

「我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爲了使我們得有剪辮的自由。假使當初爲了保存古迹，留辮不剪，我大約是決不會這樣愛牠的。」（且介亭雜文末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然而他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的熱情烙印着他的文字思想，依然是不可掩藏的。他最引爲痛心的，是費了巨大的鮮血代價所換得的中華民國，依然被黑暗的統治籠罩着。頭髮的故事有一段寫道：

「多少故人的臉，都浮在我眼前。幾個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裏一顆彈丸要了他的性命；幾個少年一擊不中，在監牢裏身受一個多月的苦刑；幾個少年懷着遠志，忽然蹤影全無，連屍首也不知那裏去了。」

「他們都在社會的冷笑惡罵、迫害傾陷裏過了一生；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却裏漸漸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紀念這些事。」

「我們還是配起一點得意的事來談談罷。」（吶喊：頭髮的故事。）

被劊子手和「正人君子」繼續統治的中華民國，依然是充滿着奴隸的悲鳴與呻吟，廣大的農民和勞苦大眾受着殘酷剝削者的踐踏與鞭撻，一般人民仍舊度着鐵索銅鐐的不自由的愁慘生活，人的權利變成棄在路上，任人畜踐踏的藥渣。在這樣的慘澹局面之下，中華民國的靈魂是黯然失去了。魯迅寫道：

「我·覺·得·彷彿·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

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

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覺·得·什·麼·都·要·從·新·做·過·。

退一萬步說罷，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一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

經失傳了，雖然還只有十四年！」（華蓋集：忽然想到之三。）

這裏橫溢着一個懷着高度正義感的智識份子的悲憤，甚至閃漾着他的夾雜着諷嘲的哀愁，然而有誰能否認這裏沸騰着一般被壓迫民衆的憤激而淒苦的心聲。「什麼都要從新做起」，不正是過着奴隸生活的廣大人民爭取解放的唯一出路嗎？那些用斷章取義的卑劣技術證明魯迅「徹頭徹尾是一個虛無主義者」的論客們，懂得什麼叫「從做新起」嗎？

自然，我不是說魯迅早年的文字裏沒有憂悵和失望的暗影，騙人者兼吃人者用烈士的血花換來的勝利，戰士們（如他後來所說的「孫中山先生及其他先烈們」——見本文前段）遭受奴才們侮辱和殺傷的慘史，民衆們在無邊的刑場和牢獄中的哀號，使期待光明而慘遭打擊的猛士不由不震悚和憤慨；當震悚和憤慨不能或不願用直接形式表達出來時，從心坎裏湧出來的諷嘲，很自然會誇張那望、迫、着、光、明、勢、力的現實陰暗面（藝術家是懂得誇張手法在藝術上的效用的，然而很少有戰士們懂得誇張（不是過高估計敵人）在戰鬥上的效果的），於是熱狂的諷嘲在現象上就顯示爲陰冷的憂悵與失望。魯迅是一個富於熱情的剛毅戰士，他永遠不會對人生絕望，故意裝着多愁善感的面貌，用主觀的灰黯感去渲染世界，在他是不屑爲的。然而當橫暴的黑暗雲霧暫時掩住了新生的陽光時，他使不免將嚮往光明的爽朗熱情壓縮在他的誇張黑暗面的諷嘲裏。由於他早年尚未接觸到浩浩蕩蕩的勞苦大眾戰陣，使他看到的黑暗經常對光明占上風，這就更令他的作品和議論帶着「熱得發冷的熱情」，此種熱情在現象上常常表顯得陰森逼人。譬如他有一次對民國發過如次的感慨：

「啊，造物的皮鞭沒有到中國的脊梁上時，中國便永遠是這樣的中國，決不肯自己改變一根毫毛！」
（吶喊：頭髮的故事。）

後來他又描寫自己在民國初年的心情：

「我那時對於「文學革命」，其實並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
魯迅誇張了現實的黑暗面，同時也就連帶誇張了自己的失望情緒與懷疑態度。然而這不過是他的心胸的一

面，在另一面正躍動着他那不甘被黑暗淹沒的積極看取人生的情趣。他在描寫了上述的失望心情之後，接著又說：

「不過，我却又懷疑於自己的失望，因為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很有限的，這想頭，就給了我提筆的力量。」（同上。）

這裏，很坦白地解剖了他的懷疑心緒的根由。當他不久接觸到無數有為的「人們」和無數悲壯的「事件」以後，他的戰鬥豪情就以異常奔放的雄姿傾瀉在人生的戰場裏了。不過，必須指出，即令在他用懷疑的眼光看取現實的陰暗面時，他也並沒有掩藏自己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行進熱情。他在作品裏之所以要「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以上均見自選集自序），有時「不惟用曲筆，在藥的殮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吶喊：自序），不僅如他自己謙抑地所說的「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正做者好夢的青年」（同上），或者「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馳奔的戰士」（同上），而且分明是由于他深信：「人類總不會寂寞，因為生命是進步的，樂天的。」（熱風：生命的路。）本著這種自信，他就不忍教大眾長久逼視暗與冷的烟塵，他要指點大眾眺望光與熱的遠景，讓人們能够清醒找到歷史進展的道路。因此他雖然痛烈地斥罵和詛咒舊中國的沒出息，「不肯自己改變一根毫毛」，可是他毫不抑低他的高度的民族自信力與民族自尊心。這種態度越來越鮮明地表現在他的議論和作品中。他在大革命時代這樣歌唱道：

「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却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果來，也還有逐

漸生長的希望。」（而已集：黃花節雜感。）

大革命推動了中華民族的巨大覺醒，掀起了全國的爭自由的浪潮，使他對正在生長的新中國充滿了光明的熱望。舊時的陰鬱色彩從他的作品中褪去了，在他的文字裏閃現了新中國的面影。雖然在大革命失敗後，他又時時吐露出陰慘逼人的悲憤，然而那悲憤正像隱藏在冰雪中的炸彈的爆裂，它使人震悚，使人不自覺對慘酷的現實生出反抗的心情，同時不得不去檢討過去失敗的血史。在他積極參加和領導集團主義的戰鬥隊伍之後，他的以大衆的憎愛爲憎愛的生活態度，使他對人生，對中國，對世界投射了比前更明快、更爽朗的熱愛光輝。假如說，在以前他對現實黑暗面的詛咒和攻擊幾乎湮沒了他對光明的詠歎與讚美，那末，在他成爲集團主義的主將之後，他的歌頌光明的豪情和痛擊黑暗的正氣，就像兩股異常澄碧的山泉在巨川中交流起來了。一九三三年楊杏佛被刺，他寫了一首悼楊的詩，是：「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灑淚江南雨，又爲斯民哭健兒」，似乎當時頗帶有感傷的氣氛，但其實這正是魯迅的戰鬪豪情最奔放的時期。同樣地，他對於柔石等的紀念文（爲了忘却的紀念）的哀怨悱惻也不能掩蓋他的豪邁氣概。正在他生活的最後幾年，他特別發揚了那最可寶貴的民族自信力和民族自尊心。

「有人說過這樣的話：魯迅先生的文章的力量，是跟着他自己的思想走的。在寫最初的一篇小說《狂人日記》以前，他過着一段蟄伏的生活，對人生的失望和在思想上的懷疑，使他甚至不能寫作。《狂人日記》以後的吶喊和熱風的時代，他成了反封建的積極的戰士。這時他的文字就鋒利，明快，而有生氣。當他作《華蓋集》時，憂鬱的思想又籠罩了他，雖然也在戰鬥，但思想的苦悶使他的文字有了瑣碎無力的缺憾。他的文字的爐火純青時代，其實是在他接受了更新的思想以後，創作固然沒有了，但《自由書》之類的雜感

文裏，却表現着他的文字藝術登峯造極，而影響也最大。」（艾思奇：民族的思想上的戰士。）

艾思奇所引的這個或人的意見（不是艾思奇本人的意見），對魯迅不免有誤解之處，例如他說在魯迅寫作徬徨與華蓋集時，「思想的苦悶使他的文字有了瑣碎無力的缺憾」，對於徬徨與華蓋集的評價是不恰當的。大約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之間，也就是魯迅寫徬徨和華蓋集的期間，是他和北洋封建軍閥官僚及走狗式的文人學者作孤軍困戰的時期，那時五四時代的文化革命戰線起了分裂，五四健將「有的高陞，有的退隱，有的前進」（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他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的這種巨大變化，使他懷着「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同上）的寂寞心情。正像他在徬徨的那首五言絕句裏所表現的：「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徬徨。」（集外集。）因此他感覺到，這一期間他的文字「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鬥的意義却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那里呢？」（自選集序。）在如此的心境之下，他不能不把過去五四時代洋溢的戰鬥熱情暫時壓縮在他的分祕憂悵感的筆底下，同時不能不用轉灣抹角的曲筆來表達他對於舊社會與惡勢力的厭惡與抗爭，這樣就產生了他的徬徨、野草與華蓋集，但實際上收集在墳裏的好幾篇雜感文也是這一時期的產品。這一期間的文字固然常常掩映着悲鬱與蒼涼的波影，然而在那波影底下，却分明潛流着他的從五四雷雨過渡到大革命暴風雨的期待戰友的長征情熱，這樣的情熱，是大革命暴風雨到來的前夜與初期一個「荷戟彷徨」者的正義感與求友慾的合流，是一個追求光明和戰取新生的民族鬥士永遠前進的內燃力量，因為它不能直接洋溢到戰鬥生活的表面上來，不得不隱藏在淒清寂寞的波光之下，就特別易使人們感到當時魯迅的文字充滿着感傷和悲愴的氣氛。然而說他的這一時期的作品瑣碎無力，那分明是不能服人的。只

要舉出魯迅中的祝詞、示衆、孤獨者、傷逝、野草中的這樣的戰士、復讐、淡淡的血痕中、華蓋集中的忽然想到（特別是五至六）、夏三蟲、戰士與蒼蠅等篇，就可以反駁這種粗率的論斷。而同一期間寫的春末閒談、燈下漫筆、雜憶、論譯了眼看、再論雷峯塔的倒掉、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等雜感文（後來都收集在墳裏），都是閃爍着革命真理的工作；正如羅秋白所批評的：「墳以及整部的華蓋集……都包含着猛烈的攻擊統治階級的火花。」（論魯迅雜感——注意：羅秋白所評述的只以魯迅的雜感文為限，因此魯迅與野草沒有提到。）只要是善於讀魯迅的文字的人，應當承認羅秋白的批評是對的。

然而，在前引的一段意見中，我們承認有一點是說對了的，就是魯迅的思想和情懷經過了幾度轉變，這種轉變過程不能不影響到他的文字的內容與情調。大革命失敗不久之後，他從實踐和理論上解決了「新的戰友在那裏」（自選集自序）的苦悶問題，於是採取正面打擊黑暗的戰鬥方式，和人民大眾的內外敵人鏖戰，他的筆鋒正像出鞘的新刃，直刺入民衆敵人和民族世仇的內心，這和他在過渡期間帶着陰鬱和懷疑的色彩的筆調是兩樣的。在某種意義內是回復了五四時代的明快犀利矯健剛勁的作風，但他的晚年的文字，却又不同于五四時代的文字，因為它對於現實的反應特別敏銳、廣泛、深刻、有力，它表現了新人羣的悲苦、怨恨、掙扎、覺醒、怒吼、馳突和苦戰，泛溢着鮮爽雄壯的集體主義朝氣；恰像破曉前的洪鐘聲引起山鳴谷應，使漏夜在荒野長征的人羣忘了寂寞和倦怠，而想起了曙光不久就要照臨，因而更堅定了並整飭了一同前進的步武。

魯迅的民主主義思想的一個最大特點，就在于他處處以人民為本位，堅決主張用人民的自覺與行動，來對抗反動統治者的專橫與壓迫。他認為一切反動統治者及其思想代表所想到的「治國方法」，「都是爲了治民衆者

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爲民衆本身的，却一點也沒有。（且介亭雜文二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般以自己爲中心的人們，決不肯以民衆爲主體。」（老調子已經唱完。）人民不應對壓迫者懷着任何幻想，因爲推移民衆，阻撓改革，正是一切壓制者共同的本相。例如他在論及袁世凱時，曾經這樣說：

「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之後，大殺黨人，從袁世凱那方面說來，是一點沒有殺錯的，因爲他正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錯的是革命者受了騙，以爲他真是一個筋斗，從北洋大臣變了革命家了，於是引爲同調，流了大家的血，將他浮上總統的寶位去。到二次革命時，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個筋斗，從「國民公僕」變成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實不然，他不過又顯了本相。……

所以我想，中國革命的鬧成這樣，並不是因爲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爲我們看錯了人。」（偽自由書：殺錯了人異議。）

袁世凱正是一切殺人的壓迫者的代表人物，革命民衆流了自己的血，將那些欺弄人民的大騙子浮上治人者的寶座，到頭不免要吃大苦頭。因此，他剴切指明，人民唯有用獨立的戰鬥去反抗壓制者：

「事實既然教給了這些，備存的路，就當然使他們（小百姓）想到了自己的力量。」（南腔北調集：談金聖歎。）

魯迅始終不鬆懈反壓迫制度的鬥爭。他的筆和舌總是不斷對準黑暗的政治力量噴出攻擊的火線。他把一切「狼吞虎嚥」吃盡民脂民膏的民賊稱爲「坐寇」（談金聖歎），把那些譏笑毀謗民主革命戰士的奴才稱爲「完

美的蒼蠅」(蒼蠅與戰士)，把那些幫忙反動統治欺騙羣衆的文士稱爲「掛着小鈴鐺」的「山羊」(一點比喻)，把那些用虛偽的「人權論」來粉飾黑暗政治的幫忙文人稱爲「救火的鸚鵡」(王道詩話)；把那種「叫民衆看見是民權，而民族祖宗看見是忠孝」的虛偽參政制度稱爲「兩面光滑」的「藝術」(最藝術的國家)；這一類的諷刺在反對黑暗政治與壓迫制度的民主運動中，發揮了特殊的武器作用。

正因為魯迅從來不輕視政治鬥爭，並且特別反對「超于政治」的偏見與空想(見魏晉風度及酒與藥的關係與論第三種人等篇)，所以他的民主主義始終是帶有一貫的革命性與戰鬥性的。他在青年時代就特別歌頌「惡物悉顛」的「破壞」，見摩羅詩力說，而激烈攻擊那些維持現狀「嫉視破壞」的庸夫俗子；但他所讚美的破壞，不是「寇盜式的破壞」，也不是「奴才式的破壞」。(再論雷峯塔的倒塌。)就是一切是仇讎，一切都破壞」的梭惠略夫主義，他也同樣不贊成。(見菲蓋集續編：記談話)。他頌揚「將舊軌道……一掃而空」的「革新的破壞」(同上)，同時反對，「在互礫場修補老例」的改良主義，這就是他的澈底革命思想的要點。當大革命前夜北京反動政府在用屠刀維持黑暗的統治時，他預見了在壓迫和黑暗繼續增加中，「可以發生較激烈的反抗與不平的新份子，爲將來新的變動的苗藥」(兩地書)，他同時斥責了那些誣蔑革命的無恥鬮言(如「講革命是爲的圖利」，「過激派共產公妻」之類。見菲蓋集，論辯的靈魂)。在廣州時，他謳歌革命說：「其實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因爲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他讚美爲民族和社會奮鬥犧牲的革命家說：「我深深感到革命家的偉大……惟獨革命家，無論他生或死，都能給大家以幸福。」(而已集：黃花節雜感)。在大革命暴風雨過去以後，他領導中國的大衆文化運動，在民主革

命的理論和策略上作了許多不朽的貢獻。一切黑暗主力的衛隊和喉舌，一切吃人惡魔的幫忙和幫閑，一切自命爲「折中，公允，調和，平正」的紳士學者，一切幻想「離開戰鬥而獨立」的「第三種人」，一切「非革命的革命愈進論者」，全都逃不過他那鷹隼似的眼睛，逃不脫他的嚴厲的攻擊和批判，他的革命實踐更磨銳了他的革命思想的鋒刃。

魯迅的民主主義是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發展的反映與產物，但它轉過來又經過無數青年的傳播與文化運動的發展，充實了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內容，增大了中國民主主義思潮的活力。他的民主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帶着科學的理性主義和戰鬥的現實主義；新理性主義使他成爲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和思想革命家，而新現實主義則使他成爲徹底的民主主義革命者和革命思想家。

第三章 民族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的魯迅

第一節 表現在魯迅思想中的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統一性

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民主主義，和它的民族解放運動，是以交互滲透的作用統一起來。在中國革命運動中，反封建、反專制的民主主義，不能不帶有反帝國主義、反異族壓迫的民族主義色彩，另一方面，革命的民族主義，也不能不含有「反對壓迫的一般民主主義內容。」（列寧。）魯迅的思想和工作是最生動最深刻地反映了這一革命特質的。這個一身兼為思想革命家和革命思想家的戰士，不單用藝術的形式和政論的內容之織結來標出他的思想特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用最明細的筆觸表現了中國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交流與進展。

中國古老的社會秩序，在外來侵略者的推壓之下，日益趨于潰爛，早在清末已經成了極顯明的死症；甚至連顛覆的反動統治者也感到中國遭到「三千餘年一大變局」（李鴻章；壬申奏摺），感到「天下之變岌岌可危。」（張之洞；強學會序。）然而，他們傷悼腐爛社會秩序的哀鳴絲毫不能表現民族主義的要求，恰恰相反，他們正企圖以夷制漢，「用西洋物質文明的細帶來包裹中國殘餘封建制度的爛瘡」（拙著：中國民主憲政運動史），這就是洋務運動的本質。後來，以康、梁、譚為領袖的新黨用了比較開明的手法，想在滿清王朝試演變法維新的御前戲，他們提出了立憲國會說，要求皇上「釐革積弊，修明內政，取法泰西」（康有為），相當代表了市民層的進步要求，可是他們實際不過是帶着二重奴隸枷鎖打掃民族牢籠的新士大夫。他們所看重的，不

是百姓的覺醒，而是英主的「聖心」。（梁啟超在光緒皇帝配中說：「上乃一切獨斷，裁自聖心」），這終于使他們的維新好夢破滅于六君子的血泊中。不過從那以後，「維新」「立憲」的呼聲日益在朝野沸騰起來了。野蠻昏憤的滿清王朝，最後甚至不能不乞靈于預備立憲的騙術，企圖渡過被革命威脅的惡夢。「奔走于虛之徒」，「至愚屯之富人」，「善斷斷之市儈」（填：文化偏至論）就利用這個時會來大唱其「金鐵國會立憲」（同上）的時調。但民族的癢瘼只是日見沈痼，民衆的痛苦跟着日益加深。事勢非常清楚地指明出來了，不推翻那為中外壓迫者安排的人肉筵宴，祇是一味打算將那安排人肉筵宴的廚房粉刷新，中國人民是絕不能擺脫被吃的悲慘命運的。

在這時候，自然有孫中山領導的民族革命運動，足以衝破籠罩全國的死氣。然而，當時「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填：摩羅詩力說。）文化思想運動的貧乏與乾枯，恰正反映市民層的軟弱。這是一個極苦悶的時代，魯迅的青年時期就是在這苦悶中渡過的。

受過維新黨人影響的青年魯迅，抱着「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吶喊：自序）的大希望，跑到日本去學醫，然而一到了東京，吳邦人士的驕橫逼人，中華民族的風雨飄搖，祖國同胞的顛預麻木，都使他感到羞憤與惶悚。他這時的心境和抱負，恰如他在一首小詩中所寫出的：

「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踏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自題小像。）

魯迅目擊中國民族陷于半死不活的狀態，無數人民被折磨得失去了民族自信心，失去了民族安危感，甚至失去了被吃的痛苦感覺，這使他異常寒心，但並不絕望。他在研究國民性的病根（見許壽裳：懷舊），在渴望

藉助文藝來改變國民的精神。(見吶喊)。如果人們不依據歷史限制的苛求來看問題，不難看出，魯迅在青年時代所提出的改造國民性，啓發國人自覺和解放個性之類的要求，正是針對着當時亞細亞式的野蠻和黑暗的，是針對民族被奴役的苦難命運的。他作爲一個愛國者，痛心於民族的受難，痛心於國民的麻木，同時又作爲一個革新思想者，憎恨僵硬的傳統制度與傳統思想，憎恨「寧蟻伏墮落而惡進取」(摩羅詩力說)的沈重積習。顯然，在他的尚未成熟的青年時代思想中，是交流着愛國主義與啓蒙主義的要求，而這正是後來他的民族主義精神與民主主義理想統一起來結合爲一體的胚種。

第二節 魯迅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要求爲什麼發出於國民性的解剖與批判

魯迅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要求何以出發於國民性的解剖與批判？這是一個頗值得研究的非常有興趣的問題。機械唯物論者根本否認民族性或國民性的存在，甚至有些外行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以爲只有階級性，而沒有民族性。但實際上，一個民族有它的特殊心理狀態，這是不可否認的。史太林說：

「民族與民族的分別，不但由於他們的生活條件的不同，而且由於表現在民族文化特質上的精神容貌的差異。如果操同一語言的英吉利、北美利堅和愛爾蘭，構成三個不同的民族，那末，在這一點上，他們代由於不同的生存條件的結果所造成的那種特殊的心理狀態，實在演有不少的作用。當然，心理狀態，或——像別種說法——「民族性格」，其本身對於考察家是一種不可捉摸的東西，但是，它既然表現于民

族所共同的文化之特質，那麼，它就可以捉摸的，而且不能忽視的。不消說，「民族性格」並不是永久不變的一種東西，它是隨着生活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但是，它既存在于每個特定的時期，那麼，它在民族的形狀上，便印下了自己的痕跡。」（論民族問題，張仲實譯，九——十頁。）

如果每一個民族有牠的特殊的心態——特殊性格，並且這性格是隨着生活條件的變化而改變的，那末，一個思想戰士用了他的思想解剖刀來解剖中國的民族性或國民性，找出它的病根，以便改變或療救，這種工作的意義是絕對不能抹煞的。不管魯迅在青年時代對於國民性的理解與解剖，是如何包含着在時代限制之下所不能避免的缺點，但他是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人。要解答爲什麼他要從國民性的解剖來表現他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要求，這不能單拿他個人的生活條件與教育環境來說明，而必須考察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的特殊狀態，首先，必須說明帝國主義侵入以前的社會狀態。

如衆周知，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停滯性一向成了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重大特點。封建地主階級對於農民的非人剝削經常在麻痺農民的勞動生產性的積極發展，破壞農村以至整個社會的生產力，使廣大勞苦農民常常處於赤貧、飢餓與愚昧的狀態中。商業資本與利貸資本和土地所有是膠結得不可分開的。由于原始資本積蓄的條件的一般貧乏，商業資本和利貸資本未能轉化爲產業資本，農民與手工業者的勞動也就不能轉化爲產業勞動。因此，商人資本與利貸資本祇是使封建經濟制度更加僵化，更加腐化。農村生活，一半由於地主、商人與高利貸者三位一體對於農民的殘酷剝削，一半由於農村公社極端守舊與生產力不斷破壞的傳統狀態（不消說，這兩個原因是互相聯繫的），呈現着滯鈍、閉鎖、猥陋與萎縮的「死相」。這種「死相」因着封建社會的上層

建築的壓力而更加深，而且擴大到更廣的社會生活圈子裏去。建築在封建經濟基礎上的中央集權的專制政體與官僚制度，是封建地主的保護權力。有時在全國對立着幾個割據的王國，而這並不妨礙牠們對於封建生產方式的共同維持作用。剝削階級不儘利用經濟、政治、武力來維持其壓榨制度，同時還利用反動的精神力量（愚民政策、科舉制度、智識獨占、文化破壞等）來麻痺民衆的頭腦。被壓迫民衆本來也有他們的文化創造力量，但「士大夫常常奪取民間的東西，……這些東西一沾他們的手，也就跟着滅亡」（花邊文學），因此，民衆的創造力就大大遭殃。漢代以後，儒教成了地主階級的精神統治威權，南北朝以後，統治階級更利用佛教，但沒有動搖孔子在民間的偶像作用。「愚民的專制」（魯迅語）更加强了封建生產方法的頑固性與停滯性。這様，不但被剝削被統治的勞苦大衆經常生活於淤積的死水中，連剝削者與統治者也磨去了進取的銳鋒。誠然，大規模的農民叛亂與異族入寇，可以攪動死水似的社會生活；但缺少先進階級的領導的農民叛亂，不是很快給統治者的刀鋒削平，就是給新的統治者利用去做敲門磚，根本不能變革固有的生產方式與精神生活。而異族的侵入中原，也並不改變土著的封建制度，他們祇是將這種剝削制度改裝，以建立他們自己的王朝。而且，在異族入寇後，中國的剝削階級又匍伏在「胡兒」、「韃子」的跟前效忠，借助新主子的刀鋒來鎮壓同族的被壓迫大衆。顯然，外寇與內寇的騷動都不會引起中國社會的變質。正如魯迅慨然指出的：「外寇來了，暫一震動，終於請他作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補老例；內寇來了，也暫一震動，終於請他做主子，或者別拜一個主子，在自己的瓦礫中修補老例。」（墳：再論雷峰塔於倒掉。）

自從帝國主義的砲口強吻中華處子以後，古舊的封建社會制度給列強的魔手攙抱得半死半活。自然經濟生

活日益崩壞下去了，但並未引起全面的生產方式突變。爲了便利掠奪，帝國主義不能不利用土著的封建殘餘與地主階級，遏阻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勃興。在社會經濟殖民地化過程中，發生了買辦資本，它祇是加深着中國民族經濟對外的隸屬關係。民族資本主義雖然微弱地生長着，但不能掙脫國際資本的枷鎖，因此民族資產階級歷來就是以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衰病之身掙扎着，工人階級在最初半個多世紀尙未成長起來，農民殘喘於帝國主義與地主階級的重重踐踏之下。在如此的社會經濟狀態上僵臥的專制政體與官僚主義必然沉陷在失敗主義與奴隸主義的泥塘中，過去土著剝削階級對外寇甘於屈辱的傳統更加深了這種陷落的深度。專制主義與失敗主義結合，官僚主義與奴隸主義結合，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封鎖了民族進步的道路。是的，企圖衝破這種封鎖的維新運動終於起來了：

「古書裏的弱水，竟是驅了我們，聞所未聞的外國人到了，交手，幾回，漸知道「子曰」，「詩云」似乎無用，於是乎要維新。

維新以後，中國富強了，用這學來的新，打出外來的新，闔上大門，再來守舊。」（熱風：隨感錄四十八。）

然而，「維新單是皮毛，關門不過一夢」（同上），中國依然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中。其後，辛亥革命推除了滿人在中國的筵宴，但「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並沒有爲共和二字所塗沒。」（燈下漫筆。）實際上，自鴉片戰爭以來，所謂精神文明受了帝國主義的砲火洗禮，更潰溢了失敗主義與奴隸主義的膿血。這種膿血淤積在舊中國，造成了麻痺中國民族活力的亞細亞式的濃厚毒氣；頑固而又無自信，守舊而又無特操，

貧婪而又怕進取，殘暴而又怯弱，自大而又自卑，吃人而又被吃，狡詐而又愚昧，虛偽而又昏庸，吝嗇而又荒淫，怕革新而又愛破壞（寇盜式與奴才式的破壞），多夢想而又無創作，自欺欺人而又甘被欺，自命中庸而又趨極端……所有這些，本來是反動統治階級的奇特的矛盾性格，但是這些毒質經過經濟榨取、政治壓迫、文化蒙蔽、智識獨占以及各種直接與間接的傳染與滲透，也侵蝕一般被壓迫大眾的精神生活，敗壞民族風氣。自然，在另一方面，由於生產的落後，生活的折騰，和革命領導的薄弱，被損害被侮辱的大眾在不能找到宜洩積忿與熬苦的出路以前，爲了消極的自衛，也會發展各種病態的性格；然而造成民族劣根性的責任，無疑是應由統治者與剝削者來負的。不能否認，中國民族性不僅有它的黑暗面，也有它的光明面。但在革命勢力尙未成長到足以衝破反動勢力以前，消極的民族性格常常顯出其可畏的壓迫力量，像潰爛的毒瘡一樣，阻礙人們前進的手腳。祇有當革命的階級性和固有的民族性的矛盾獲得了合理的解決，民族的私極性格與進步質素才能和先進階級的實踐與意識一同飛躍地發展起來。

魯迅在早年，並未看到這種矛盾的合理解決，但他看到了傳統的民族劣根性像死屍似的沈重壓迫中國人民的精神活力，阻礙中國革新的道路，他感到無限的悲憤和驚怖。然而他深信國民精神是可以改變的，深信民族的病態是可以療救的，所以他執行了一種帶有愛國意識和民主要求的批判任務，我們可以稱之爲民族的自我批判。

第三節 魯迅所擔負的民族自我批判的任務

從辛亥革命前夜直到五四時代，魯迅的民族主義的思想活動，主要是表現在民族的自我批判上。在消極方面，是暴露民族的劣根性，揭發國民性的弱點，在積極方面，是喚起民族的自覺，要求改變國民精神。從表面看來，他在這一期間所攻擊的，是一般的國民性，但實質上，他的熾盛火力主要還是對準反動的統治者與剝削者。自然，他絲毫沒有放鬆對於「不長進的民族的病態」（熱風·隨感錄三十八）的嚴厲批判。惟其因為他憎恨民族的劣根性非常深，所以他愛護中華民族的生命力也非常切。在他對於民族所加的鞭策中，閃爍着他的崇高深厚的民族愛。

魯迅對於民族失敗主義與奴隸主義的攻擊，是非常銳利的。在辛亥前夜，已經顯露了他在這一方面的戰鬥姿態。滿清王朝對外戰爭與外交的失敗，並未促起統治階級的覺悟，相反地，反動統治者顯示得比以前更加昏憤，更加怯弱。專制魔王只要「使子孫王千萬世，無有底止」（憤：摩羅詩力說），便不惜以民命為代價，對外卑躬屈膝，對內專橫殘暴。「寧蟻伏墮落而惡進取」（同上）的阿Q主義者在外仇權壓之下「妄自尊大」，「見善而不思式」（文化偏至論）；自己已經做了奴隸，還要自誇為「古文明國」之華胄，「願思歷舉前有之光，特未能言，則姑曰左鄰已奴，右鄰已死，擇亡國而較量之，冀自顯其佳勝。」（摩羅詩力說）在朝在野的顯老們不願正視嚴重的民族危機，祇是一味自欺欺人，粉飾昇平。於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宰割和中國統治階級的失敗主義互為因果；被犧牲的，是中國的土地與人民。土著的統治者，對於庶民，是殘暴的主子，而對於帝國主義，則是恭順的奴才。自然，當時富國強兵的夢給了苦悶中的新官僚士大夫以若干慰安，但在帝國主義的天羅地網中，在滿清王朝的民族牢獄中，那裏容得了致富強之術？那些「談言武事」的「幹才小慧之徒」，根

本就不懂，中國的手足給人完全捆縛住，即令武備擴張了，「而舉國猶屏，授之巨兵，奚能勝任，仍有僂死而已矣。」（文化偏至論。）那些主張立憲的紳董士大夫，根本就不了解，政權完全操在反動統治者手中，即令宣布立憲，召開國會，除了遮掩滿清王朝的潰爛而外，還有什麼意義？何況那些政客們不過是「假是空名，遂其私慾，不願見諸事實，將事權官議，悉歸奔走干進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斷斷之市儈。」（同上。）

至於那些提倡工商救國者，也忘記了整個民族經濟命脈操在外人手中，要想從國際資本的榨取中分一點餘瀝來圖富強，是多麼愚蠢可憐的幻夢！何況他們的動機，祇是出發於自私：「蓋國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圖富強之名，博志士之譽；即有不幸，宗社為墟，而廣有金資，大能溫飽，即使怙恃既失，或被虐殺如猶太遺黎，然善自退藏，或不至身受；縱大禍垂及矣，而倖免者非無人，其人又適為己，則能得溫飽又如故也。」（同上。）

有了這種亡國奴式的打算，民族獨立自由與否，自然全和他們痛癢無關。為要對抗這一類「活身是圖，不郵污下」（摩羅詩力說）的民族失敗主義與奴隸主義，魯迅主張啓迪人民的自覺，爭取「人國」的實現：

「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風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

（文化偏至論。）

誠然，如果不將政權從反動統治者轉移到人民手中，根本摧毀封建殘餘與帝國主義的壓迫，所謂「人國」，也不過是一個烏托邦。然而就算魯迅所提出的是一個烏托邦，而在反對「愚民的專制」的思想史上，仍然有其鋒芒驚人的戰鬥意義。因為他所理想的人國，是奴隸的「沙聚之邦」的否定，是民族獨立自由的爭得，也是人

民自覺的實現。他評論拜倫的精神，說這位援助希臘獨立戰爭的詩人，「重獨立而愛自繇，苟奴隸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視，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視所以怒其不爭。」（摩羅詩力說。）其實他所闡釋的拜倫精神，正是他當時所強調的民族主義精神，沒有獨立與自由，所謂建立「人國」根本是一句空話。值得指出的是，早在一九〇三年（魯迅二十四歲），他所寫的那篇斯巴達之魂（集外集），就是宣揚民族戰鬥精神與愛國主義的充滿熱情文藝作品。

在辛亥革命時代，魯迅參加了掛滿的革命組織。但當他感到革命失敗以後，他便沈潛起來了。他自譬住在一間「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裏面。（見吶喊序。）可是，一到五四的春雷響動於古老的中國以後，魯迅就以異常激烈的雄姿要打破這間「鐵屋子」了。

五四時代，是中國民族自覺浪潮沖潰中古的反動精神生活的突變時代。這一運動是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急進份子掀起的。民族資產階級意識代表僅僅提出了反封建的啓蒙任務，他們並未深刻考慮到中國民族走向殖民地前途的危機。他們很容易滿足於局部的改革。就拿文學革命運動來說吧，雖則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提出了反對古文和創立國語文學的要求，並且實行了語文的改革，然而他們可就沒有寫出一篇表現中國民族生活的作品。無產階級的思想在五四運動初期還只在萌芽狀態，但到了五四的後期，這種思潮就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尖銳地對立起來了。魯迅在當時自然還不是屬於無產階級革命行列的，他只是一個進步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革命家，但他的刻劃中國民族生活的劃時代的藝術，在五四時代應當被認為民族解放運動的奇異花果。這個收穫是不能在表面上看出來的，必須發掘魯迅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現的「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才能見到。

魯迅在五卅時代的作品，充滿了反封建的思想，這是很容易看出來的，然而其中是否包含了民族解放的要求呢？我的回答是，這些要求是隱藏於他的反封建思想之下。

中國民族在外來征服者和國內壓迫者合力糟蹋之下，一天一天走向死滅的道路，這是使敏感的愛國者感到非常沈痛和恐怖的事。魯迅在五卅時代的戰鬥鋒鏢，是集中於攻擊國內的封建反動勢力和腐敗傳統，因為他認為這些乃是阻礙中國民族進步的主要內在原因。他對於「不長進的民族的病態」表示無限的沈痛，因此用了他的銳利的筆對這些病態予以無情的揭發。他在五卅時代的反封建鬥爭，實際是他的民族自我批判工作更具體更廣大的發展。他的批判的基本武器，就是進化論。攻擊的火力主要是對準反動的國粹與精神文明，因為所謂國粹，不過是那些「現在的屠殺者」阻遏民族革新的「國渣」，而所謂精神文明，也不過是「祖傳老病」患者塗塗進步潮流的精神野蠻——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蠻人的文化」。（熱風。）魯迅提出了一個平常的却含有深意的問題：「倘說：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搗頭，舊派也戴氣？」（熱風：隨感錄：三十五。）這就給了「國粹」以鐵一般的否定。他希望中國多產生「趕過祖先的新人」（隨感錄：四十九），「醫治中國的昏亂病。」（隨感錄：三十八。）他深切感到，民族的沉痾痼疾將使中國遭受淘汰，在亡國以後，即令保存了中國人的名目，中國人也將失去了世界：

「許多人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擠出。」

有人說：「我們要特別生長，不然，何以爲中國人！」

於是乎要從世界擠出。

於是乎中國人失去了世界，却暫時仍要在這世界上住！

——這便是我的大恐懼。」（熱風：隨感錄：三十六。）

要住在世界上，而又要從世界擠出，這正是一個「古文明國」的悲哀矛盾。「現在的屠殺者」是甘心要把中國民族推向絕路，而魯迅是要解除民族危機。

魯迅嚴酷攻擊了民族自大狂，因為自大狂和自卑狂正是一脈相通的，「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隨感錄：四十八），正是民族自大狂和民族自卑狂互相轉化的具體說明。他以為患了這種狂病的民族，如不設法救，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

「滅絕」這兩句話，只能嚇人，却不能嚇倒自然，他是毫無情面；他看見有自向滅絕這條路的民族，便讓他們滅絕，毫不客氣。」（隨感錄：三十八。）

固然，魯迅還不能拿社會歷史的原因來說民族的生滅存亡，但在這裏，他指出了一點，一個不願自求生路的民族，是只有走向滅亡的道路的。

中國民族「久受異族及其奴僕鷹犬的蹂躪」（華蓋集續編：死地）的血淚史，不僅造成了政治經濟的腐爛和衰沈，並且造成了民衆生活的愚昧和萎靡，祖傳的野蠻統治制度更直接助長了這種慘狀。「屠伯們逍遙徑道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而已集：詠辭），把廣大民衆自肉體至精神壓迫得成了不能伸直技幹的「病梅」。魯迅是看穿了這種病態的民族生活的。但他並不抽象地去研究中國民族被壓迫的問題，他只是通過人性

——社會關係——的具體發掘去反映民族性——民族被壓迫的現實，通過典型環境與典型性格的生動描繪去表現危殆萬分的民族命運，如以五四時代的作品為例，阿Q正傳就是一篇民族被壓迫生活史的縮圖。魯迅寫出了阿Q的猥劣與麻木，但同時也寫出了阿Q被踐踏、被欺凌的慘狀。阿Q的半白癡的性格，是不能依照理水中「拿拄杖的學者」所主張的「罵人的子孫都是國人，愚人的子孫都是愚人」那樣的遺傳學來解說的，這種性格明明反映了赤裸裸的社會關係，並且也是這種社會關係必然造成的。阿Q的精神勝利法不用說不是一個半白癡的流浪傭僕所能發明的。實際的情形却是，爲了在不斷被踐踏、被侮辱的生活環境中維持自己可憐的生存，他不得不從他的主子們那裏接受自欺欺人安於奴隸命運的精神傳統，來免除受傷的靈魂。自然，他並非接受這傳統的「第一個」，和他同一命運的被損害者早就如此做了。如其阿Q沒有自輕自賤的卑微感和自覺自解的優越感交錯運用，他能在土穀祠裏「心滿意足的躺下」，「得意了許多年」嗎？阿Q和他同命運的人羣所應用的精神勝利法，明明是有本本的。難道呼着「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

（熱風）得意文章的國粹主義者，不是高等阿Q主義者嗎？難道高唱「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

（熱風）濫調的民族誇大狂，不同時又是自稱蟲豸的民族自卑狂嗎？在先前，是北方的異族用快馬和磨刀闖入了中原，在後來，是帝國主義用槍砲和商品轟毀了中國守舊的萬里長城，「戰具比我們精利的歐美人，戰具未必比我們精利的匈奴、蒙古、滿清人，都如入無人之境。」（華蓋集：忽然想到。）在這些災害中，土著寄

生階級，連同自己生息其中的民族，分明遭到了被掠奪、被踐踏的命運，然而他們不敢正視鮮血淋漓的現實，却是用騙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論睜了眼看。）明明是慘敗了，給人做了俘虜了，但却不願承認失敗，也

不願從慘敗的歷史中去學習教訓，爭取勝利的前途。這性格通過政治的和社會的壓迫權力，也就傳染到了廣大被壓迫的羣衆。（自然，我並非說，阿Q主義的產生只能單純歸因於異族和帝國主義的闖入，阿Q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有着比這更複雜的原因；但不可否認的，由於中國民族長期被征服被壓迫的史實，阿Q主義取得了易於孳生繁殖的條件。）除非把阿Q主義放大，和民族被踐踏的血史一同考察，人們是不會認識阿Q主義的根源的。魯迅不但有意識地通過阿Q的劣根性，暴露了民族的劣根性，同時也不自覺地通過阿Q被摧殘被奚落的生活史，烘托了中國民族被損害被侮辱的血淚史。因此他在阿Q正傳寫出：「阿Q……是永遠得意的，這或者也是中國精神文明冠於全球的一個證據了。」在另一處他又指出：「十二年前，魯迅作的一篇阿Q正傳，大約是想暴露國民的弱點的。」（偽自由書。）在他後來的許多作品中，常是對着土著壓迫者的麻木，寫出了異族（包括古代的異種族和現代的帝國主義）征服中國民族和奴役中國人民的慘史。如果魯迅否定了阿Q的劣根性，否定了辛亥革命的弱點，當然也就連帶否定了那應由土著寄生者負責的「國民的弱點」，否定了一切革命的不徹底性。不洗去這樣的弱點和不徹底性，加強中國民族抵禦外來橫逆的精神武裝，中國是絕不會由牛馬奴隸之國變爲真正的「人國」（摩羅詩力說），而中國人民也就決不能「創造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墳：燈下漫筆。）因此在他嘲笑精神勝利的反面，他教我們怎樣在民族新生運動中鍛鍊鋒銳的勝利精神，這種勝利精神，唯有在清算失敗主義的鬥爭中才能生根的，因為失敗主義正是阿Q主義的本質。

第四節 魯迅的反帝思想的發端

如果魯迅在辛亥革命前夜和五四時代，是從側面來表現和警告中國民族被征服被壓迫的現實，是着重於國民弱點和民族病態的暴露，那末，到了五四以後，也就是大革命前夜和大革命期間，他就開始從正面來攻擊帝國主義及其在華走狗，着重於民族生存戰鬥精神的發揚。自然，他同時也不放棄民族遭受壓迫的側面揭發。這一發展恰正是反映帝國主義對中國掠奪重新加緊，也反映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重新高漲。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歐戰時期一度繁榮的風光，只消國際資本捲土重來的洪水一沖，就給湮沒下去了。帝國主義權益和中國民族生存的尖銳衝突，激起了中國民衆的革命新潮，這新潮是爲國際帝國主義所不能容許的，他們用了一切橫暴卑劣的舉動和陰謀來對抗中國人民的解放運動。封建地主和中國買辦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軍閥官僚，很馴服地執行了國際主子屠殺人民鎮壓革命的意旨。民族資產階級消失了五四時代一點僅存的銳氣，重新走上了失敗主義的舊路，他們曾經對軍閥和帝國主義抱了過高的幻想，希望經過妥協來苟延殘喘，在政治上取得一角立足之地。然而無情的事實很快就教訓了他們，證明了他們的幻想已經破滅了。經過廣大羣衆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浪潮的推動，一個新的民族革命戰線（包括工農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建立起來了。中國民族第一次以洪大的聲音向全世界怒吼了。這一切情景，魯迅是用着戰慄的和興奮的心情來看的，他經過徬徨和孤獨的苦悶，畢竟重振了昂奮和熱烈的戰鬥精神。

亡國士大夫歷來是用「排斥異端的正氣」（阿Q正傳）來擁抱「國粹」的，就是號稱維新的新官紳也不過是想「用學來的新，打出外來的新，關上大門，再來守舊。」（熱風。）他們不僅是封建殘餘勢力的保鏢，其實同時又是殖民地的敗卒。正因為他們失去了民族自衛的信心和勇氣，所以他們懼怕外來的新事物，而只有藏

在「國粹」的烏龜殼內，正像契科夫描寫的貝里柯夫縮頭在囊中一樣。五四雷雨曾經動搖了守舊的精神體系，然而隨着民族資產階級的退却（約從一九二〇年到五卅以前），「反改革的空氣又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華蓋集：通訊）這種反動空氣的氾濫，不僅反映着中國封建守舊勢力向革新勢力的反攻，而且特別反映中國民族殖民地化危機的加深，反映革命民衆（首先是工人階級）和守舊勢力鬥爭的進展。一方面是革命化的民衆把五四時代的文化革命成果加以發展，另一方面是封建營壘和妥協的市民層在文化思想上大開倒車。魯迅對後一種反動傾向作了比五四時代更尖銳的打擊。成爲這一時期的特色的是，他是意識地明確地把反守舊勢力的鬥爭和民族危機的解剖聯結起來。他指出了，那些復古的守舊的反動份子，雖然死死抱住「國粹」不放，自命爲民族「固有文化」的守護者，然而實際上，他們是喪失了民族自信力的，是一面站在前門畏懼外來征服者，而又一面打從後門引進帝國主義的。他確信着，一個民族愈是頑固地排斥異端，就愈證明其衰弱；反之，越是魄力雄大的民族，越有勇氣取用外來事物。他曾引史實來諷喻國人：

「宋的文藝，現在似的國粹氣味就薰人。然而遼金元陸續進來了，這消息很耐尋味。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爲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末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的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而國粹竟成爲勝王和

勝奴的寶貝。」（墳：看鏡有感。）

反革新勢力把一切革新勢力當作「赤化」危險來「討伐」，「國粹」遂成爲軍閥及其走狗的「寶貝」，帝國主義更從旁張大國粹派的反動氣餒。就在這時，魯迅通過了繼續反封建反國粹的戰鬥來喚起民族的覺醒，來攻擊帝國主義鷹犬削弱民族解放力量的活動與陰謀。國故論者「口口聲聲叫着保古，保古，保古」(華蓋集)，然而他們根本忘記了帝國主義者正利用中國統治者「不肯變革……自相殘殺」(同上)的機會「很容易地進來了」。擺在全國人民面前的嚴重問題是：還是保存「國粹」來犧牲中國呢，還是犧牲國粹來保存中國？魯迅指出了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現在，「古也就難保，因爲土地已危險而不安全。土地給了別人，則「國寶」雖多，我覺得實在無處陳列。」(華蓋集：忽然想到。)他最痛恨的是，守舊的反動統治者對國內民衆則作威作福，而對帝國主義則奴顏婢膝，所謂「見了羊顯兇獸相，見了兇獸則顯羊相」(華蓋集)，正是這些奴才們最逼真的寫照：

「復古家儘可不必悲觀的。太平的景象還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誰聽到大叫喚麼？打的打，革的革，可有處士來橫議麼？對國民如何專橫，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猶是差等的遺風麼？」(華蓋集：燈下漫筆。)

中國反動統治者就是這樣打着「肅靜」，「迴避」的朱牌，來爲外來的征服者清道。不但如此，他們還繼承了歷來事大主義的奴隸傳統，很恭順地爲外來征服者安排人肉筵宴，「中國人的耐勞，中國人的多子，就是辦酒的好材料。」(燈下漫筆)。

「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爲蠻夷，自不免個個蠻類，但是，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會經獻於

「孔獻於金，獻於元，獻於清的盛，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專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盛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呢？」（同上。）

以前被「天朝」目爲蠻夷強迫下跪的西洋帝國主義者（後來還有東洋帝國主義者），駕着他們的砲車來到中國，做了「享用盛」的上賓，他們壓根兒就不把中國人當人算帳。雖然有時也「頌讚中國固有文明」（同上），但那不過是「醉飽後的嘔吐。」（霍普斯泰因）。實際上，他們有權利在中國隨意宰殺人民，「以青饒吻」；五卅慘案就是一個例子。當帝國主義的屠刀在上海閃着兇光造成了極大的流血慘案的時候，一些高等華人在那裏極力「辯誣」，洗刷「赤化」的「罪名」，魯迅再也按捺不住他的義憤：

「我們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國巡捕擊殺了，我們並不還擊，却先來趕緊洗刷犧牲者的罪名。說道我們並非「赤化」，因為沒有別國的煽動；說道我們並非「暴徒」，因為都是空手，沒有兵器的。我不解爲什麼中國人如果真使中國赤化，真在中國暴動，就得聽英捕來處死刑？記得新希臘人也曾用兵器對付過國內的土耳其人，却並不被稱爲暴徒；俄國確已赤化多年了，也沒有得到別國開槍的懲罰。而獨有中國人，則市民被殺之後，還要皇皇然辯誣，張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華蓋集：忽然想到。）

帝國主義的「文明」本來就是建築在壓迫殖民地（包括半殖民地）的暴力上，因爲「帝國主義非剝削殖民地，非用暴力將殖民地強制在「統一的整體」的範圍內，是不能够生存的，……不然，它就不成其爲帝國主義了。」（史太林：論列寧主義的基礎。）雖然中國尚未變成被帝國主義獨占的或瓜分的殖民地，但帝國主義

剝削中國民族，以暴力強制中國成爲他們的經濟政治上的附庸，這一事實已經存在很久了。魯迅揭穿了帝國主義的「文明」的本質，指出「文明向來是如此的，並非到現在纔將假面具揭下來。只因爲這樣的損害，以前是別民族所受，我們不知道，或者是我們原已屢次受過，現在都已忘却了。」（忽然想到之十。）難道中國人民忘了鴉片戰爭時代不列顛帝國的砲轟嗎？忘了太平天國時代戈登、華爾的洋槍隊嗎？忘了甲午戰爭的流血嗎？忘了中、法戰爭時法國人在諒山的屠戮嗎？忘了八國聯軍在華北的燒殺淫掠嗎？中國人民如不健忘，就應該清醒地認識，帝國主義在上海、沙基、漢口等地製造的流血慘劇，本來不過是過去屠殺政策的繼續。在這樣的慘酷局面之下，高等華人們還要「皇皇然辯誣」，「張着含冤的眼睛」和帝國主義講「公道」，那除了傷害中國民族的自尊心，增大帝國主義的橫逆氣燄而外，還有別的結果嗎？魯迅教給了我們對抗暴力的戰鬥道路：

「因此，中國青年負擔的煩重就數倍於別國的青年了。」

因爲我們的古人將心力大抵用到玄虛縹渺平穩圓滑上去，便將艱難切實的事情留下，都待後人來補做，要一人兼做兩三人，四五人，上百人的工作，現在可正到了試驗的時候了。對手又是堅強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來磨練。假定現今覺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齡爲二十，又假定照中國人易於衰老的計算，至少也還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奮鬥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這樣的數目，從個體看來，彷彿是可怕的，但倘若這一點就怕，便無藥可救，只好甘心滅亡。因爲在民族的歷史上，這不過是一個極短時期，此外實沒有更快的捷徑。我們更無須遲疑，只是試驗自己，自求生存，對誰也不懷惡意的幹

下去。」（華蓋集：忽然想到。）

魯迅認識了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長期性，他勸告中國青年「共同抗拒，改革，奮鬥三十年，不夠，就再一代，二代……」。中國青年的確沒有辜負這位民族先驅者的期望。從那以後，三十年的奮鬥道路我們至少已經走了一半了。我們堅決相信，只要全國人民絕不動搖地「抗拒，改革，奮鬥」下去，是一定可以縮短爭得民族徹底解放的途程，在不到三十年的苦鬥中，完成我們的革命大業的。

然而，在「抗拒，改革，奮鬥」的過程中，各種重大困難向民族革命戰線襲來，是絕非意外的。帝國主義不僅要常親自出馬來壓迫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而且更毒辣的是，喚使黃面皮的鷹犬來摧殘反帝民衆，以達到「以華制華」的目的。一九二六年北京愛國青年用請願來抗議日本和列強干涉中國革命，立即遭到帝國主義的華種獵犬的毒手，暗無天日的三一八慘案就是如此製造出來的。魯迅的筆噴出了攻擊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憤火：

「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會。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顛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

然而竟將他們屠殺了！

假如這樣的青年一殺就完，要知道屠殺者也決不是勝利者。

中國要和愛國者的滅亡一同滅亡。屠殺者雖能因為積有金資，可以比較長久地養育子孫，然而必至的結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孫繩繩」又何足喜呢？滅亡自然較遲，但他們要住最不適於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鑛洞的礦工，要操最下賤的生業。……」（華叢集續編：無花的蔷薇之二。）

「中國要和愛國者的滅亡一同滅亡」，這是鐵一般的真理。事實上，除了熱血的愛國者而外，那些「心悅誠服地充當奴才沒齒而無怨言」（華蓋集續編：死地）的賤胚子是唯恐中國不亡，那些「見了羊顯兇獸相，而見了兇獸顯羊相」的「奴隸總管」是只有加速中國的滅亡，而那些「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華蓋集）的孱頭們唯有坐待中國的滅亡。魯迅是愛護愛國者（民族解放鬥爭者）的，因為他們是中國民族僅有的生氣和活力。然而，在另外一方面，從帝國主義直接和間接營養的殖民地奴才那里，却常常噴來了毒蟻愛國者的狗血。所謂學者名流和正人君子，就經常在為帝國主義及其奴僕洗刷「侵食中國」和「殘虐百姓」的罪名。魯迅帶着正義的憤怒跟他們搏擊，因為他們乃是「比主人更惡厲的狗」，並且常常又是「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的哈吧狗。」

（墳：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看一看章士釗、陳西滢們的嘴臉吧，他們說，三·一八慘案「羣衆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說青年男女「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的苦」，是只怪他們自己幼稚，魯迅寫道：「這些東西彷彿就承認了對徒手羣衆應該開槍，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華蓋集續編：空談。）再看一看「詩哲」徐志摩的救陸邦交的怪論罷，他說：「如其有人拿一些時行的口號，什麼打倒帝國主義等，或是分裂與猜忌的現象，去報告羅蘭（羅曼羅蘭）先生說這是新中國，我再也不能預料他的感想了。」魯迅寫道：「莫非從「詩哲」的眼光看來，羅蘭先生的意思是以為新中國應該歡迎帝國主義的麼？「詩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時也無從質證。不知孤山的寒梅，着花也未？可也在那里反對中國人「打倒帝國主義？」」

（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魯迅用投槍猛擲帝國主義的鷹犬奴僕，正是要堅定反帝國主義的愛國民衆的確

信，正是「設法增長國民的實力，永遠這樣的幹下去。」（華蓋集：忽然想到。）

在號召反帝國主義戰鬥的時候，從來不是作爲一個單純的愛國主義者，一及擊了「侵食中國的虎狼」，就放鬆了幫忙虎狼的鬼，相反的，他絲毫不爲對外的鬥爭感亂了反對國內黑暗勢力的目標。他常常把內賊和外敵放在一道來拷問，來打擊，甚至攻擊帝國主義的鷹犬奴僕比攻擊他們的主子更嚴厲無情。這就是爲什麼他在帝國主義加緊屠掠政策時，毫不放鬆和奴才胚子的官僚政客與「正人君子」鬥爭，爲什麼他一面沈痛地鼓勵愛國者將「淪爲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另一面清醒地警告大眾不要安於「做自己人的奴隸」（半農小集）；這是貫串在他的全部民族主義思想中的一個最大特色。這里再舉一個實例來說明：

「上海的英國捕頭殘殺市民之後，我們就大驚憤，大嘆道：偽文明人的真面目暴露了！那麼，足見以前還以爲他們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國有槍階級的焚掠平民，屠殺平民，却向來不很有人抗議。莫非因爲動工的是「國貨」，所以連殘殺也得歡迎；還是我們原是真野蠻，所以自己殺幾個自家人就不足爲奇呢？」（華蓋集：忽然想到。）

只要是对民衆的殘虐和迫害，不管牠是「舶來品」，還是「國貨」，魯迅毫不遲疑地起來攻擊它。魯迅自始就不是一個沙文主義者（Chauvinist），而是一個民主的愛國主義者。

第五節 由進化論跨向階級論

如果說，魯迅在五卅時代主要是通過民族的自我批判來喚起民族自覺，在大革命時代主要是作爲一個民主

主義的愛國者攻擊帝國主義及其奴狗，那末，到了大革命失敗以後，他發見作爲一個階級論者把民族主義自覺地和國際主義聯結起來。研究這個蛻變，不僅對於魯迅思想的了解有極大價值，而且對於中國現代思想史有深鉅意義。

大革命暴風雨曾是使國際帝國主義及其奴才震駭絕叫的一個噩夢，魯迅當時曾以抑止不住的興奮心情歌頌這暴風雨。然而，帝國主義暗中的「帶甲拳頭」很快就得到了土著的殖民地奴才的幫助，擊破了中國的革命戰線。資產階級再度退回了民族失敗主義的舊路。這樣開始了新的民族大分裂，同時也開始了革命戰線內部的大分化。殘酷的階級內戰和嚴重的民族危機一同發展，這特點也深刻地反映在文化思想戰場上。在革命戰線方面，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非常明則地結合起來了，舊式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遭到了實際的和理論的清算。歷史以空前的明確性指示了只有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主動力，因爲大革命失敗後，它在與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聯盟的基礎上，堅強地英勇地單獨領導革命。這是中國革命運動相對地沈潛的時候，然而也是革命運動較前更爲深入的時候。魯迅的明確採取階級論立場，加入新的集體主義戰線，從整個革命運動發展趨勢來說，正有其歷史的必然。

不過，我們不能以這種一般的說明爲滿足，問題是要更進一步找出魯迅思想發展的內在原因。

如衆周知，魯迅原來是採取進化論觀點的。他曾用生物的進化論來解釋社會的發展，說：「生物界的現象，一要保存這生命，二要延續這生命，三要發展這生命。」（填：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就從這個命題出發，他得出了「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華蓋集：忽然想到之六）的主張。因爲他深信「後起的生

命總比以前的更有意義，更近完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所以推論出來，就以爲子代必比父代進步，幼者必比長者重要，而青年人也必比老年人優勝。把這一系列論點擴大開去，他就認定將來必比現在光明，而革新勢力應當代替陳舊勢力。他深知舊傳統對於人類進化的阻力巨大可怕，但他堅信「生命的路是進步的……什麼都阻他不得。」(熱風：生命的路。) [Le Bon 先生說，死人之力比生人之力大，誠然也有理由的，然而人類究竟進化着。](華蓋集：這個與那個。)這種進化論的觀點貫串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是非常鮮明觸目的。

本來，從進化論出發，人們可以走上兩條完全相反的道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利用進化論作爲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護符，他們把生存競爭、自然淘汰和適者生存等進化論的範疇，來論證資本主義的競爭與掠奪是合理的；強者犧牲弱者是有必要的，而少數財富占有者和帝國主義永遠支配世界是適合自然法則的。這種反動的理論，歷來就被某些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者所傳播，所援引。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強調達爾文主義的進化概念——發展概念，來論證人類社會和人生是不斷在棄舊更新的，將來必勝於現在，正如現在必勝於過去。這樣的觀點自然還是不完全正確的，它還脫不了用達爾文主義的自然法則來概括人類社會的發展法則這個軌轍，但它顯然和前面一種觀點有根本差別。因爲不可否認，雖然人類社會和生物界各有自己的發展法則，而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運動與發展，却是統一於唯物辯證法之下的。因此，這樣的發展觀雖然仍舊不可與辯證法的發展觀混爲一談，但和後者有相當親近的血緣。魯迅先前正是持這種觀點來運用進化論的。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包含了許多關於歷史發展的觀念。他否認國民性與人性是不變的，堅信人類與人道是不斷在生長的，生命是向前

進步而「不回頭」的，事物「沒有萬古不磨的典則」，黑暗決不能永久存在，「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着希望的前途。」（這裏不能多引原文，請參看拙作魯迅的思想遺產。）這些信念幫助他擺脫了失望悲觀的暗影，而走向了積極戰鬥的道路。他不是一個庸俗的客觀主義者或靜觀的進化論者。和他的進化論發展觀一同，有着最鮮明的變革精神浸透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這就是，積極方面歌頌革新，強調改變，主張超越（後代超越前代；將來超越現在），號召反抗，消極方面反對因襲，攻擊腐舊，憎惡傳統（陳腐的傳統），詛咒復古（以上加有黑點的字眼都引自熱風、墳、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等書，原文不必多引了）。顯然，他的進化論世界觀和他的戰鬥現實主義相結合，包含了個別的辯證法種子，這種結合就作了他日後躍向無產階級世界觀的跳板。

而且由於魯迅把進化論和戰鬥現實主義聯結起來，又使他早期的思想包含了唯物論的成分。誠然，他在青年時代的思想頗帶有唯心論的色彩，所謂「格物質而張靈明」（文化偏至論），「崇奉主觀，張皇意力」（同上）之類的觀念，就是受了斯蒂納（M. Stirner）、叔本華、尼采諸人的影響而揭發的。他用這種唯心論的武器來提倡個性解放，攻擊立憲主義者，客觀上自有其反專制的戰鬥意義。然而當革命運動發展到需要澈底清算封建勢力的時候，這種武器就不適用了。因此，魯迅在五四時代大體上是採取了唯物論的觀點，不過這時的唯物論還是基於直感性的認識來運用的。它主要表现在反對精神文明，反對精神勝利法（廣義的），提倡科學思想，攻擊所謂「特別國情」等論著上。和反對精神文明相聯的是，他提出了「生存，溫飽，發展」的有名命題，把這一命題加以闡釋，顯然就是主張增強，改變和發展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與物質文明，克服中國的守舊勢力與落後狀態。他說：「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因此他的民族主義和精神文明、國粹主義、特別國情

說是絕對不相容的。他對於個人與環境之關係的了解，大體上也是站在唯物論立場的。例如論到「時代落伍者」時，他發表過很深刻的見解：

「時代的環境全部選流，並且進步，而個人始終如故，毫無長進，這纔謂之「落伍者」。倘若對於時代環境，懷着不滿，要牠更好，待較好時，又要牠更加好，即不當有「落伍者」之稱。因為世界上改革者的動機，大抵就是這對於時代環境的不滿的緣故。」（兩地書第一集。）

每個人只要對於時代環境有清醒的認識，隨着時代的進步而前進，就會「有不平而不悲觀」（同上書），自然就成爲時代的戰士；而且只有如此，環境才能因人力而改善。在這裏，人的實踐對於歷史的發展取得了主動的地位。

正因爲對於時代環境與人的實踐作了清楚的估計，所以魯迅到處強調了改變環境的必要和可能：

「什麼·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荆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後也該永遠有路。」（熱風：生命的路。）

魯迅重視主觀的能動作用，是從對於客觀世界的清醒認識出發的，如果客觀世界沒有泥土，自然踐踏不出開闢不出「路」來。但僅僅有客觀物質條件存在，有人的能動作用，還是不夠的，這中間還必須要有貫徹實踐的物質力量。因此，魯迅主張在抗拒改革，奮鬥時，要「設法增長國民的實力」，認爲「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兩地書）。他反對阿Q式的「白盔白甲」式的幻想，主張「深沉的韌性戰鬥」（墳：娜拉走了後念裏），正是說明他的現實主義是與唯物論的戰鬥觀結合爲一的。在魯迅的早年創作中，對於典型性格與

典型環境的關係的處理，常常暗示出一個真理，即人的本性是受一定的生活環境的規定的。如果他把阿Q的性格和封建社會的剝削、壓迫、勢利與愚昧切離開來，把阿Q描寫成爲一個簡單可笑的傻瓜，阿Q正傳是決不能成爲一篇劃時代的傑作的。一個有正義感的讀者對於阿Q不知不覺流露真純的同情，那決不是因爲有所愛於他的性格，而是由於憎恨那摧殘阿Q的黑暗世態，很自然會替阿Q受人間的痛苦。從祝福那篇小說中，人們會讀得出，索法社會的禮教是怎樣殘酷地吞噬一個可憐的婦女，殘害她的脆弱靈魂。從孤獨者那篇小說中，讀者會看得出，一個孤獨的智識份子，如何在世態炎涼的狼狽社會環境中，改變本來面目，「躬行先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先所崇拜，所主張的一切」，開始在「失敗」中來粉飾「勝利」，終於在「勝利」中忘記了「失敗」。魯迅寫人物時，他的筆觸是像山嵐的巨爪，緊緊抓住在一定生活環境中鑄成的某種性格之特點，因此寫孔乙己，決不同於阿Q（雖然孔乙己也帶有阿Q性），寫魏連受，決不同於涓生，寫愛姑，決不同於祥林嫂，寫高老夫子，決不同於四銘。環境與性格的多樣性與可變性，在他的小說中，是用着最生動最鋒銳的筆觸彫刻出來的，即使在他的粗線條的速寫中也是如此。從他的對於環境與性格的關係的處理中，人們會看得出他是運用高度的寫實主義手法的，而這種手法的背後，分明隱藏了他的直感性的唯物論世界觀。

進化論與直感性的唯物論，在魯迅運用起來，有着一定限度的進步意義；在反封建傳統的鬥爭中，是可以發揮武器的作用的。然而，當革命戰鬥發展到了更高的階段，當尖銳的階級矛盾與民族危機迫使革命者不得不全面來重新估定一切、檢討一切的時候，進化論與直感性的唯物論顯然就會暴露它們的弱點。魯迅就從自己的實感與實踐中經驗到原先的武器碰到了不能解決的矛盾。他的由進化論跨向階級論，由直感性的唯物論跨向歷

史的唯物論，由個性主義跨向集體主義，由人道主義跨向社會主義，與其說最初是受了學說的誘導，不如說是出發於深遠的生活實感與現實觀察。（這一點巴人已先我指出，不過原文找不到。加有旁點的句子，意思上和巴人的說法相差不遠。）他在廣東「目視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了兩大陣營」之後，他的「思路因此轟毀」了。他說：「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纔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謹案：許多人根據這兩句話來概括魯迅的進化論思想，顯然用例證代替了他早期的全部世界觀。實際，魯迅的進化論思想在內容上比這兩句話廣大的多），……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三閱集序言。）他目視了無產階級在大革命中與革命失敗後浴血抗戰的精神，看到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革命勝利與建設成功，內心非常感動，因此極誠懇地解剖自己說：「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知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牠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纔有將來，却是的確的。」（二心集序言。）一個在真理面前「俯首甘為孺子牛」（集外集）的現實主義戰士，是最善於根據「事實的教訓」向前驅驅的。魯迅之所以能够把握世界最高的革命真理，主要是由於他清醒地認識現實，用「事實的教訓」來武装自己。自然，這並非說理論的學習對於他的思想發展不重要，他自己就說過：「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的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讀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糾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三閱集序言。）

魯迅在思想上發展成爲一個階級論者，雖然可說是一個飛躍，但這飛躍是經過他自己的思想準備和自我鬥

爭實現的。因為他所走的，一向就是現實主義的路，所以無論是對於事情的觀察，人物的解剖，問題的提出，他都是由客觀和發掘客觀的真實出發的，這就使他的思想不自覺地包含許多唯物辯證法的個別因素，使他能夠深刻地把握住客觀世界的現實生活關係，使他傾向於「變革世界」這個最高律令。但是，由於他的前期思想受到進化論的限制，他主要是根據直感經驗和正義感去體察世界，批判現實，因此，他雖是「覺到了舊社會的腐敗」，「希望着新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麼，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以後是否一定就好」（且介亭雜文：答國際文學社問），這就使他當時不免「常常以『不勝遼遠』似的眼光對無產階級。」（畫室：革命與知識階級。）十月革命的巨大勝利使他開始認識了無產階級的力量，然而「資本主義各國的反宣傳」，使他「對於十月革命還有些冷淡，並且懷疑。」（同上。）直到後來「蘇聯的存在和成功」給予他以深刻的印象，他在那「偉大肥沃的黑土」裏，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鬥，變革，戰鬥，建設，戰鬥，成功」（南腔北調集：祝中俄文字之交），這纔使他「確切的相信無產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答國際文學社問。）顯然，他的現實主義精神幫助他走向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終於打破了過去拘束他的進化論的限制，衝決了直感唯物論的不徹底性，而這種蛻變是經過他的誠實的嚴刻的自我鬥爭完成的。他在翻譯科學的文藝論時，就自白：「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疼，却決不肯有所增減」（二心集），可以充分表現他是如何不留情地跟自己過去的「偏頗」搏擊。

在沒有意識地接受唯物史觀與階級論之前，魯迅通過直感的體驗，是看到了階級的對立，有時不自覺地接

觸到了社會存在決定主觀意識這個最高命題的。在他早期的雜文中，他是在不斷地和所謂「閹人」、「治者」、「壓迫者」、「屠殺者」、「正人君子」、「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們鬥爭的。他曾很巧妙地暴露了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階級關係，指出了剝削者與支配者無法穩定其統治的悲哀：

「殊不知我國的聖君，賢臣，聖賢之徒，却早已有過這一種黃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麼？不是「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麼？不是「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麼？可惜理論雖已卓然，而終於沒有發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從作威，就須不活，要貢獻玉食，就須不死；要被治，就須不活，要供養治人者，又須不死。」（填：春末閒談。）

在這裏，不但揭發了階級相互間的矛盾，而且暴露了剝削階級所要維持的社會秩序的內在矛盾，割出了支配階級內心的矛盾。馬克思在資本論裏不僅寫出了資本與勞動的對立，還指出了資本家爲什麼一面要殘酷榨取工人的剩餘價值，一面又要維持工人及其家屬最低限度的物質生活。同樣，他和恩格斯也分析了奴主與奴隸封建主與農奴的對立，暴露了歷來的剝削階級依靠被剝削階級所遭遇的不可解決的矛盾。在尚未接受科學社會主義以前，魯迅固然不能從本質上解釋社會的階級矛盾關係，但是他實感到了並且描寫出了這種矛盾關係。更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常是把階級對立形象表現在他的文藝作品中。在阿Q正傳中，一面存在着阿Q、王、小D、吳媽這一羣被踐踏的人物，一面活躍着趙太爺、秀才、趙司晨、假洋鬼子這些踐踏別人的閹人（這當然是大體上的劃分，從階級成分來說，阿Q是屬於雇農）；最後在辛亥革命的場面中，豪紳地主竟然成了「革命政權」的掌握者，而幻想「白晝白甲的革命黨造反」的阿Q終不免落入流血的「大團圓」中。這就刻劃

了辛亥革命的流毒。在故鄉中，不僅寫出了「閩土的辛苦麻木的生活」，刻劃了他被生活壓迫得失去了活氣，而且描繪了在閩土和作者間之無形中隔着一道深淵，這深淵把他們幼小時的天真友情湮沒掉了：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喜歡的了不得，知道老爺回來……」閩土說。

「你怎的這樣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哥弟稱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母親高興的說。

「啊呀，老太太真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閩土說着，又叫水生上來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緊緊的只貼在他背後。」（吶喊：故鄉。）

自然，魯迅早年的階級體認，主要是依據生活的直感和歷史的經驗得到的，所以並非浮光掠影的，但因為缺少有系統的階級理論的幫助，他究竟不能以科學的歷史觀去分析各個社會形態的階級關係，使他大體上不能超過進化論的局限。他曾說過，在早年讀俄國文藝時，「從文學裏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南腔北調集：說中俄文字之交。）這個劃分，誠如他自己所說：「從現在看來，是誰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時，却是一個大發見，正不亞於古人發見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東西。」（同上。）然而從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來看，僅僅認識了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對立，還是不夠的，問題是在於要進一步把握，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什麼樣的壓迫階級和什麼樣的被壓迫階級對立，並且怎樣對立。在一九二七年，他曾在演講中特別強調「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這正是突破庸俗的超然文學觀的卓越理論。然而

他在當時究竟還不是依據階級關係的分析去研究文藝史，所以不能更本質地解決文藝的歷史發展諸問題。認

識上的局限和真理的追求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這使他不能繼續停留在進化論的階段，而不能不迫切尋求新的「思路」。他終於用馬列主義的階級論代替了多年的進化論。經過了這個巨大的蛻變，他在最後七八年間思想活動的戰果，幾乎可以說超過了他過去二十年的思想勞績。現在很有些人好意地否認魯迅在一九二八年後的思想突變，以為承認這種突變，就否定了魯迅思想的一貫性，我以為是沒有了解真理的發展規律，同樣也沒有了解魯迅。在個人思想史上，有什麼比跨越一座思想高山這件事更艱難更光輝的呀？魯迅自己是沒有否認他的思想突變的。他很早就說過：「多有不滿的人，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熱風），他就是一個最不自滿而永遠前進的思想戰士，他不但頑強地跟周圍的黑暗主力搏戰，而且堅定地和他自己的過去鬥爭，這恰是他的平凡中的偉大。正因為他能夠有勇氣有識力改變自己的「思路」，才能顯示出他的思想的一貫性（現實主義的本質）的發展，也才能顯示他的思想戰鬥的光芒；而歷史就在他身上指證了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優越，預示了中國革命運動的勝利。

魯迅的了解一切問題，始終顯示了一貫的特點，就是依靠直感與經驗，深入具體的事物及其相互關係，揭示出他們的矛盾。他早年從經驗與直感中熟識了各階級的生活相與矛盾性，意識到了壓迫者（治人者）和被壓迫者（治於人）是永遠不能相通的，是在矛盾與敵對中聯繫的（春末閒談提供了輝煌的範例）。所以在他自覺地用階級論來代替進化論之後，他對於階級鬥爭、階級性與階級關係的理解與闡釋，比許多早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人深刻得多，也切實得多。

魯迅的闡釋階級論，正如他的解剖別的事物一樣，不是出以抽象的說教，而是用綿密的思力與實踐去探掘

現實矛盾的泉源。正像傳說中的由大禹在夜裏化成的黃熊，是親自用他的堅嘴與利爪，去疏九河的。（不會又有人以為我是在拿魯迅比做大禹吧。）他在一九二八年已經堅定地宣稱文學、性格、感情等「都帶着階級性」，因此「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階級，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三問集：文學的階級性。）關於階級性的解說，在他的雜文中提供了浮腫似的範例。他把階級性表現得如此明確和生動，使人好像從銀幕上看到了各個階級所扮演的角色的容貌，的性格，的搏擊。下面就是兩則關於人性與階級性的關係之科學的藝術的解說：

「而且，人性是永久不變的麼？」

類人猿，類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來的人，……如生物真會進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變。不說類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氣，我們大約就很難猜得着的。則我們的脾氣，恐怕未來的人也未必會明白，要寫永久不變的人性，實在難哪。

譬如出汗罷，我想，似乎於古有之，於今也有，將來一定暫時也還有，該可以算得較為「永久不變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風」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長給世上的文字，要充長留世上的文學家，是描寫香汗好呢，還是描寫臭汗好？這問題倘不先行解決，則在將來文學史上的位置，委實是「岌岌乎殆哉。」（而巴集：文學和出汗。）

「梁先生以為無產者文學理論的錯誤，是「在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面」，因為「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有不同的地方，但還有相同的地方，「他們的人性（這兩字原本有套圈）並沒有兩樣」，例如都有喜怒哀樂，都有戀愛（但所「說的是戀愛的本身，不是戀愛的方式）」，「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

性的藝術。」這些話是矛盾而空虛的。既然文明以資產為基礎，窮人以竭力爬上去為「有出息」，那麼，爬上是人生的要諦，富翁乃人類的至尊，文學也只要表現資產階級就够了，又何必如此「過於富同情心」，一併包括「劣敗」的無產者？況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樣表現的呢？譬如原質或雜質的化學底性質有化合力，物理學底性質有硬度，要顯示道力和度數，是須用兩種物質來表現的，倘說要不用物質而顯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單單「本身」，無此妙法；但一用物質，這現象即又因物質而不同。文學不藉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裏，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毋需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辛酸，饑饉的災民，大約總不會去種蘭花，像閩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寧呀！」固然並不是無產文學，然而「一切的東西呀！」「可喜的事來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現「人性」的「本身」的文學。倘以表現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學為至高，則表現最普遍的動物性——營養，呼吸，運動，生殖——的文學，或者除去「運動」，表現生物性的文學，必當更在其上。倘說，因為我們是人，所以表現人性為限，那麼，無產者就因為是無產階級，所以要做無產文學。」

(二) 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從上面兩則標本中，我們讀到了光芒四射的階級論的開發。作者向我們提出了如下的真理：抽象的超階級的、不變人性在現實社會中是根本不存在的，離開了具體的階級關係的把握，無視了人世間的階級性，就決不能說明和表現人性。由於社會生活——階級關係在不斷遷流，人性也是借階級性來表現自身的改變的，所以現代

的人性決不同於古代的人性。同時由於階級關係決定人性，各個不同的階級就有不同的生活形態，所以無產階級的觀念、趣味、習性和情緒也決不同於資產階級。在階級社會裏，階級性是必然表現在一切生活領域和意識領域中的；如果剝削階級有它自己的文化，那末，被剝削階級爲了生存與戰鬥，也就必須有自己的文化，無產階級文學就是其中之一種。在這裏，魯迅不僅直接粉碎了「文學當描寫永久不變的人性」（文學和出汗），「文學是表現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的資產階級文學理論，實際上也間接打破了一切反動集團超階級的謬論。在這裏，魯迅列舉了許多生動鮮明的實例來幫助真理的闡明。然而你決不會以爲他是用例證來湊合理論，相反的，他是從活生生的理論與實際的溶合中，來發掘和鑑照真理。他所舉的例證不是裝飾客廳的瓶花，而是天然開在枝頭的花朵。

魯迅不僅看穿了社會的階級敵對的實質，而且用電光似的炯眼洞察了在現社會中各個階級的沒落與上昇，用火炬似的筆力照耀了無產階級的戰鬥雄姿和勝利希望。他確信「惟有新興無產者纔有將來」，因此把他過去寄托在青年身上的光明希望和偉大熱愛，更集中地更具體地寄托在無產階級身上。（自然，他到死也沒有減弱對於青年的希望與熱愛。）他絲毫不諱言自己是獻身於無產階級的戰士；在他加入了新興人羣的戰壘之後，他更像泰山般地屹立在政治的文化的戰場上。公開表示自己「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聯繫，揀動他的雙拳似的巨臂，和一切階級敵人作不倦的搏鬥。當「喪家的資產階級的乏走狗」（二心集）在那裏對無產階級狂吠，否認後者的自覺的時候，他挺身而出提出抗辯，他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駁法，把敵手所主張「無產階級本來沒有階級的自覺，是幾個過於富有同情心而又態度偏激的領袖把這個階級觀念傳授了給他們」（「硬譯」與「文學的

階級性」的理論搗得稀爛：

「不錯，但我以為傳授者應該並非由於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況且「本無其物」的東西，是無從自覺，無從激發的；會自覺，能激發，足見那是原有的東西。原有的東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萊阿說地體運動，達爾文說生物進化，當初何嘗不或者幾被宗教家燒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擊呢？然而現在人們對於兩說，並不為奇者，就因為地體終於在運動，生物確也在進化的緣故。承認其有而要掩飾為無，非有絕技是不行的。」（「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中國無產階級在大革命失敗後的十年間，遭受了人世間最殘酷最惡毒的迫害和摧殘，然而他們一面在用血寫出自己的失敗史，也另一面在用血寫出自己的勝利史。這樣的勝利雖則是局部的，個別的，無產階級戰士總是以含淚的喜悅珍視它們，發揚它們。作為無產階級文學運動領袖的魯迅，在柔石等七位文化戰士流血以後，用那爲了無產階級文學而寫的悲壯的頌詩，代替了那爲死難烈士而唱的哀傷的輓歌：

「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發生，在涇嶺和壓迫之中滋長，終於在最黑暗裏，用我們的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二心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先驅的血。）

戰士的流血並未使他因感傷而頹唐，相反的，他在戰場上站得更穩。他的心搏和大眾的心搏交響成爲一片。人們分辨不出：是他以大眾的喜怒哀樂爲喜怒哀樂，還是大眾以他的喜怒哀樂爲喜怒哀樂。不管階級敵人的刀斧是如何兇殘，但他毫不動搖地指出：「無產階級文學却仍然滋長，因爲這是屬於革命的廣大勞苦大眾羣衆的。大眾存在一日，壯大一日，無產階級文學也就滋長一日。」（同上。）他的預言已經由歷史的事實證明，

將來還要由更光輝的歷史事實來證明。

實際上，無產階級和無產文學不僅受到暴力的摧殘，也遭到那些被養的走狗文人的圍剿。「民族主義文學家」就曾盡了這種獵狗的任務，他們用造謠、誣蔑、和一切卑劣伎倆向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文學進攻。魯迅對他們作了最兇猛的打擊。他宣布所謂民族主義文學不過是「鴉犬派」文學，揭穿反動階級的文人向來以「自欺欺人的種種美名來掩飾自己的潰敗，一到舊社會的崩潰愈加分明，階級鬥爭愈加鋒利的時候，他們也就看見了自己的死敵，將創造新的文化，一掃舊來的污穢的無產階級，並且覺到了自己就是這污穢，將與在上的統治者同其運命，於是就必然湊集在為帝國主義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順民所發起的「民族主義文學」的旗幟之下，來和主人一同作一回最後掙扎了。」（二心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他用畫筆描出了民族主義文學的本質，批判了它的沒落的命運，也畫出了甘為帝國主義驅犬的反動階級的鬼臉，判定了他們的最後歸宿：「他們將只盡些送喪的任務，永含着戀主的哀愁，須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風濤怒吼起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樣能說出這沉滯、猥劣和腐爛的命運。」（同上。）

中國階級鬥爭的尖銳發展，不僅使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在惶恐的絕叫中，動員了全副武裝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加緊對工農的圍剿，同時也使一部分落後的小資產階級份子（大體上說來，小資產階級在當時與工農建立了革命聯盟）預感到了自己沒落命運，怕見工農革命運動的勝利，而投身到資產階級地主的陣營。他們和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一樣，披了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對進步勢力大放冷箭。魯迅所說的「在指揮刀的保護之下，掛着「左翼」的招牌，在馬克思主義裏發見了文藝自由論，在列寧主義裏找到了殺盡共匪說的論客」（南腔北調

集：論第三種人，就是指這批人而言。他們之中一部分人以「第三種人」的面目出現，自命爲超然於階級鬥爭與政治敵對之外的理論家與作家，但其實他們分明是在反革命的刀光劍影中襲擊革命，因爲他們「不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洩」（填：雜憶），不向壓迫者爭求自由，而反向被壓迫者要求自由。爲了保衛革命文學和整個革命戰線，魯迅揭去了這些虛偽的自由主義者的「超然」面具。他探動階級論的武器，指出：「雖是『第三種人』，却還是不能超脫階級的，……作品裏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論第三種人），指出那些「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同上）的人們，其幻想「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可笑。

魯迅的徹底的階級論，一點不掩藏地和政治戰鬥取得了密切的聯繫，這種聯繫正是他過去反對「超於政治」的文學的歷史現實主義的深廣發展。他確信，一切應服從於最高的階級革命任務，而這任務，在現在祇有通過政治鬥爭表現出來。凡是把階級關係和政治鬥爭切離開來的有害傾向，在他都是絕對不能容忍的。然而祇僅承認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還是不夠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者」有時也能够靠了這種虛偽的承認來掩飾其「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一個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者，必須堅信無產階級在革命運動中的最高領導權，堅信無產階級靠了階級專政能够最後消滅階級敵對，建立無階級的社會。魯迅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主義戰士。當帝國主義及其奴才在那裏譁囂蘇聯，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怕結果」來恐嚇「智識階級」的時候，他立刻提出反問：「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爲了將來的無階級社會麼？只要你不去謀害牠，自然成功就早，階級的消滅也就早，那時就誰也不會「餓死」了。」（南腔北調集：我們不再受騙了。）當幼稚病者在那裏用恐嚇

代替正當的革命戰術，來打擊論敵的時候，他立刻作了糾正：「無產者的革命，乃是爲了自己的解放和消滅階級，並非因爲要殺人。」（南腔北調集：辱罵與恐嚇決不是戰鬥。）他無畏地宣布自己願爲無產階級的勝利貢獻一切，因爲他「確切的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且介雜文：答國際文學社問。）

魯迅的堅決皈依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正是他過去一貫反對社會黑暗和政治野蠻的戰鬥精神發展的必然結果。他會坦率地承認：「我的反抗，不過是與黑暗搗亂。」（兩地書。）不過，他早年在反對黑暗的戰鬥中，最引爲苦悶的，是那些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戰伴動搖變節，而一時又不能找到「新的戰友在那裏」。自選集自序。）同時在思想上，他也常常直感到，社會如不澈底改變，任何局部的改良主義和温情的人道主義，都不能根本解決社會問題。例如在一九一八年他曾說過：「人道不是靠佈施捐助得到的，是要用奮鬥培養出來的。」（熱風。）一九二三年他曾經贊成婦女要爭得經濟權，但他接着又指出：「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並不是傀儡了麼？也還是傀儡。……因爲在現在的社會裏，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作女人的傀儡，這決不是幾個女人取得經濟權所能救的。……如果經濟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當是廢話。」（墳：娜拉走后怎樣）值得注意的是，他這時已受了唯物史觀與階級論的初步影響，或者不自覺地吐露了新社會觀的幼芽。爲了要尋找「新社會的戰友」，爲了要追求澈底變革社會的方案，他的跨過個性主義與人道主義，而走向集體主義與社會主義，正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不過，這種轉變還是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的，我們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如衆周知，魯迅在最初是傾向於個性主義的，他在青年時期提出了「任箇人而排衆數」（文化偏至論）的

主張。在五卅時代，他曾說過：「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衆宣戰。」（熱風：隨感錄：三十八。）又說：「必須先改造自己，再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熱風：恨恨而死。）顯然看得出尼采、史蒂納等給予他的影響。（自然，他並非無條件地接受尼采等的影響，他對於尼采的超人說，就始終抱了懷疑態度。參看拙作再論魯迅的思想遺產。）如果關聯着清末到五四時代的中國社會狀態與政治情勢來看，人們必須承認，魯迅的堅持這種個性主義，是可以反封建，反「愚民的專制」的戰鬥意義中，找到歷史的解釋的。而他的個性主義却又不同於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因為他痛恨資產階級地主的自私自利，傾向於平等互助的精神，同情被壓迫的弱者，憎惡「向弱者抽刃」的屠頭。一到了民族革命與階級鬥爭顯示了民衆力量的偉大，他便開始放棄個性主義的陣地，而轉向於新民主的集體主義。他在一九二四年已經說過：

「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裏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衆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衆，就沒有天才。有一回拿破崙過 Alps 山，說：『我比 Alps 山還要高！』這何等英偉，然而不要忘記他後面跟着許多兵；倘沒有兵，那只有被山那一面的敵人捉住或者趕回，他的舉動言語，都離了英雄的界線，要歸入了瘋子一類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產生以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衆。」（墳：未有天才之前。）

在一九二五年，他更明確地承認羣衆在改革運動中的力量，但教示有志於革新的青年，要注意於羣衆的教養與訓練：

「更進一步而希望於點火的青年的，是對於羣衆，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沈的勇氣

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啓發明白的理性；而且還得偏重於勇氣和理性，從此繼續地訓練許多年。」（墳：雜憶。）

在一九二六年，他更銳利地喊出，「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進步。」（華蓋集續編：學界的三魂。）在這裏，他強調了發展民衆力量爭取革命新勝利的主張。

這其實是他過去所提出的啓發人民自覺的主張在羣衆本位思想下的具體發揮，和以人民爲阿斗的諸葛亮專政主義是有着本質上的差別的。因爲如果不承認羣衆有「理性」與「勇氣」，就無從「啓發」。

誠然，在一九二八年以前，他和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還有相當距離，但不能忽視從二七運動直到大革命這一段期間，他的思想正在醞釀着新的變化，這正是他的日後跨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歷史性的準備。不把這一關節，是不能圓滿地說明魯迅的思想轉變的。

假如在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之間，是魯迅由個性主義向民主集體主義轉變的時期，那末，一九二八年就是他由民主集體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轉變的關口。從那以後，他便高舉社會主義的大纛，爲被壓迫大眾的生存與解放而勇猛戰鬥。「革命的愛在大衆」，他是用了他的全部生命力實踐這個主張的。資產階級的文人在不斷侮蔑大眾，他反擊了這種侮蔑，說：「梁實秋先生們雖然很討厭多數，但多數的力量是偉大的，要緊的。」（二心集：習慣與改革。）擁護舊社會秩序的學者把文化看作是少數人創造的，他諷刺了這種歷史觀，說：「中國的學者們，多以爲各種智識，一定出於聖賢，或者至少學者之口；連火與草藥的發明應用，也和民衆無緣，全由古聖王一手包辦。」（花邊文學：知道了世界。）他確切的相信人民大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信

賴大眾的力量與正確。那些大眾的壓迫者，剝削者，那些屠殺大眾的劊子手及其幫兇，不但在行動上，而且在思想上把大眾當作螻蟻一樣踐踏；魯迅憤怒地嘲笑了這些「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的英雄：

「他們以為華夏的人口太多了，第一位大員道，「減少一些也是致太平之道。況且那些不過是愚民，那喜怒哀樂，也決沒有智者所推想的那麼精微的。知人論事，第一要憑主觀，例如莎士比亞……」

「放他媽的屁！」禹心裏想，但嘴上却大聲的說道：「我經過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溼」確是錯誤了。以後應該用「導」……」（故事新編：理水）

在這裏，活畫出了那些蔑視大眾精羅大眾的正人君子的嘴臉，同時也描出了一切尊重大眾愛護大眾的嚴肅工作者的胸襟。——禹作了這種精神的象徵。爲了刻畫這種精神，魯迅描寫了禹堅決打破舊的成法，尊重民衆意見改「溼」爲「導」的無畏氣概：

「我看大人還不如「幹父之蠱」，一付胖大官員看得禹不作聲，以爲他就要折服了，便帶些輕浮的大聲說，不過臉上還流出着一層油汗。「照着家法，挽回家聲。大人大約必知道人們在怎樣講說老大人罷！」

「要而言之，「溼」是世界上已有定評的好法子，「白鬚髮的老官恐怕胖子鬧出岔子來，就搶着說道：「別的種種，所謂「摩登」者也，昔者蚩尤氏就壞在這一點上。」

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說我的爸爸變了黃熊，也有人說他變了三足獸，也有人說我在求名，圖利。說就是了。我要說的是我查了山澤的情形，徵了百姓的意見，已經看透實情，打定主義，無論如

何，非「導」不可！」（故事新編：理水。）

由梅茂大眾來打擊大眾的革命戰鬥，這原是一切壓迫者及其「幫忙」與「幫閒」通行的職術。他們明明也知道大眾力量的可畏，但他們却有一枝阿Q主義的曲筆，把明是非、辨黑白的大眾譁畫成爲「盲目的暴力」。「沒有理性，沒有明確利害觀念」，「鷄來迎鷄，狗來迎狗」，這就是「第三種人」杜衡評述莎士比亞名劇凱傳時對於「羣衆」所下的論斷（聰明的讀者不會以理水中提到莎士比亞的名字而感到奇突吧），而這一論斷確也代表一般畏懼工農革命者的普遍心理。魯迅用憤火照出了他們的肺腑，同時也擊中了他們隱隱作痛的傷疤：

「真的，「發思古之幽情」，往往爲了現在。這一比，我就疑心羅馬恐怕也曾有過有理性，有明確的利害觀念，感情並不被幾個煽動家所控制，所操縱的羣衆，但是被驅散，被壓制，被殺戮了。莎士比亞似乎沒有調查，或者沒有想到，但也許是故意抹煞的，他是古時候的人，有這一手並不算什麼玩把戲。」（花邊文學：又是莎士比亞。）

在另一處，他提出了與梅茂大眾者尖銳對立的見解：

「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裏覓道，但能從大樞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剛剛接到本日的大美晚報，有北平特約通訊，記學生游行，被警察水龍噴射，棍棒刀砍，一部分則被閉於城外，使受凍餓。「此時燕冀中學，師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紛紛組織慰勞隊，送水燒餅，饅頭等食物，學生略解饑渴……」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

弄，騙，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且介亭雜文二編：「題未定」草。）

歷來的反動統治者用了一切暴力和毒謀將民衆壓迫成了病態，還要無恥地把國勢貽危、內憂外患歸責於老百姓，每逢外侮逼至，中國老百姓就得到了「一盤散沙」的惡證。魯迅依據明確的階級觀點，指出了誰是「一盤散沙」狀態的真正負責者，他說：

「小民雖然不學，見事也許不明，但知道關於本身利害時，何嘗不會團結。先前有跪香，民變，造反；現在也還有請願之類。他們的像沙，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來說，就是「治績」。」（兩

腔北調集：沙。）

在魯迅還沒有成爲一個階級論者以前，他對於大眾——尤其是農民——的痛苦，是深深地覺察到了的，他「知道他們學生受着壓迫」（集外集拾遺：「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後來他看了許多外國小說……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這許多和我們的勞苦大眾同一命運的人。（同書。）然而先前他只能根據人道主義對他們表示同情。一到他接受階級論以後，他便清楚地認識了，惟有依靠被剝削階級的獨立戰鬥，才能解除大眾的痛苦。因此，提高大眾的階級自覺，讓他們「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病中答救亡情報記者的談話，轉引自參作紀念魯迅），正是增強大眾戰鬥力量的第一步。他指明：「被壓迫者對於壓迫者，不是奴隸，就是敵人，決不能成爲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並不相同。」（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他指出，剝削階級爲要救被剝削階級忘了自己的痛苦，麻痺大眾的不平的靈魂，常是拿有利於少數吃人者的道德來籠罩天下，以便安穩地享用人肉筵宴；因此「勸人安貧樂道成了古今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絡。」（花邊文學：安貧樂道法。）他用了蘆葦憤

怒的筆尖諷刺了不把大眾當人的「安貧樂道法」，這類諷刺文除了一再見於他的雜感文外，在他的故事連寫中也可以找到：

「你們坐近一點來！」馮不答他的詢問，只對大家說。「查的怎麼樣？」

大員們一面膝行而前，一面面面相覷，列坐在殘筵的下面，看見咬過的松皮餅和啃光的牛骨頭，非常不自在——却又不敢叫膳夫來收去。

「稟大人」，一位大員終於說。「倒還像個樣子，——印象甚佳。松皮水果，出產不少；飲料呢，那可豐富得很。老百姓都很老實，他們是過慣了的。稟大人，他們都是以善於吃苦，馳名世界的人們。」

（故事新編：「灑水。」）

「人肉筵宴」的享用者是要勸大眾「安貧樂道」，而魯迅却是要教大眾「想到自己的力量」。（南腔北調集：談金聖歎。）爲了要幫助大眾的戰鬥，他說召：「有志於改革者……深知民衆的心，設法引導，改進」（二）心集：習慣與改革），他勸告「做偉大事業的人要把自己當作「大眾中的一個人」（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他提倡大眾文化（新文字、大眾語、連續圖畫、木刻等），去加強大眾的精神武裝力量。

第六節 表現在魯迅思想中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一致

魯迅靈活地運用了階級論來襲擊舊社會和「黑暗主力」，代表勞苦大眾而吶喊，而戰鬥，使他由民主主義者進步而爲社會主義者，由民族主義者發展而爲國際主義者。但是，在魯迅的思想中，正如在一切中國無產階

級戰士的思想中一樣；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正是統一起來，不可分裂的。在下面，我們就要研究魯迅的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一致。

魯迅晚年的接受國際主義，從他個人的思想發展過程看來，和他早年反對國粹主義的戰鬥是有着直接的聯繫的，正如他的接受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國際主義），和他過去反對中庸主義的戰鬥傳統，有着直接的聯繫一樣。他唯恐「中國人自世界擠出」，所以和一切崇奉國粹的頑固派苦鬥。他後來不但沒有如別人一樣從反國故的戰線退却，並且以愈戰愈新的精神繼續打擊一切開倒車的復古份子。在戰鬥過程中，他看出了帝國主義的反動和腐敗，看出了世界工人階級的生長與銳進，終於作了國際資產階級的死敵和世界勞苦大眾的戰友。

如果魯迅在辛亥革命前夜所憧憬的，是「自覺至，個性張」的「人國」，在五四時代所憧憬的，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的民族國家，在大革命時代所憧憬的是「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那末，在大革命失敗後，他所嚮往的，就是「沒有人壓迫人的無階級社會」。這個「理想之光」照耀他站在國際主義大旗下為無產階級戰鬥到死的巨大工作，燃燒他的反剝削制度的新人道主義精神。他不是一個空談理論的書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戰鬥的批判的現實主義精神，幫助他處處從實際上去磨銳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鋒刃。因此，他熱烈地同情和保衛「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裏湧現而出；幾萬萬羣衆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南腔北調集：林克多「蘇聯開見錄」序）的蘇聯；他咒咀那些謬良和毀謗蘇聯的帝國主義者，揭穿了他們欺騙大眾的鬼蜮伎倆：

「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牠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癡疽，是牠們的寶貝，那麼，牠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牠們自身正在崩潰下去，無法支持，爲挽救自己的末運，便憎惡蘇聯的向上。謠言，詛咒，怨恨，無所不至，沒有效，終於只得準備動手去打了，一定要滅掉牠才睡得着。但我們幹什麼呢？我們還會再被騙麼？」（南腔北調集：我們不再受騙了。）

「帝國主義的奴才們要去打，自己（！）跟着牠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們人民和牠們利害是完全相反的。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倒要打退進攻蘇聯的惡鬼，無論牠說着怎麼甜膩的話語，裝着怎樣公正的面孔。」（同上。）

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統一，在魯迅晚年的思想中，是表現得再明確沒有。在早年，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宰割中國民族，他是深深地感覺到的，並且用了猛烈的火力去攻擊殘暴惡毒的民族敵人，但那時僅僅是把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結合起來。祇在他接受了階級論以後，他纔自覺地把握了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聯繫。史太林說：「民族問題，祇有與無產階級革命聯繫起來，並且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而西方革命勝利的道路，須經過與殖民地 and 附庸國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的聯盟。」（論民族問題中譯本。）這個公式在魯迅的思想表現中，是靈動地被運用着。在許多地方，他總是堅定而具體地昭示出：中國民族和帝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是處於絕對敵對的地位，但和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國家與一切被壓迫民族站在同一戰線上。他的辨明友敵分別憎愛的現實主義精神，在確立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關係中，達到了最高的表現。在東洋帝國主義的血爪開始攫奪東北土地的第三天，他回答了文藝新開社的一個時局問題：

「這在一面，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膺懲」他的僕役……中國軍閥，也就是「膺懲」中國民衆，因為中國民衆又是帝國主義的奴隸；在另一面，是進攻蘇聯的開頭，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羣衆，永受奴隸的苦楚的方針的第一步。」（二心集：答文藝新聞社問。）

在這百餘字的答案中，分明指示了中國人民和蘇聯與世界勞苦大衆在利害上的聯帶一致，揭露了東方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真實意義，說明了這個侵略對於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威脅；也暗示了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結成的可能。

正因為魯迅站在民族的與無產階級的立場，堅定地把握住了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有機關聯性，所以他對於帝國主義的鬥爭，是用了最高度的警覺性與明確性貫澈着的。他不斷指出了民族殖民地化的危機，證明不能爭取民族的澈底解放，一切民族復興、工商救國的空論都不過是夢囈。那原因是「國際的財爺扼住了中國的喉嚨，連氣也透不出。」（南腔北調集：真假堂吉訶德。）他在大鑿警告：帝國主義是時刻在懷着殺機，用槍尖瞄準着中國人民，「四萬萬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私心在微伺的，只是還沒有被打着。」（准風月談：「抄靶子。」）他更揭穿了帝國主義在不斷用「公理」、「正義」、「人道」之類的鬼話欺騙被壓迫民族，因此提醒國人對於帝國主義陰謀的警覺與戒備：

「一睜開眼，就露出惡鬼的本相來的，——牠要去懲辦了。牠一面去懲辦，一面來詭騙。正義，人道，公理之類的話，又要滿天飛舞了。但我們記得，歐洲大戰時候，飛舞過一回的，騙得我們的許多苦工，到前線去替牠們死，接着是在北京的中央公園裏豎了一塊無恥的、愚不可及的「公理戰勝」的牌坊（但

後來又改掉了。)現在怎樣?「公理」在那裏?這事還不過十六年,我們記得的。」(南腔北調集:我們不再受騙了。)

是的:中國人民「第一需要記性。」(填:綁拉走後怎樣。)在這第二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的時期,魯迅的教訓是值得一切中國人記取的。

帝國主義要征服殖民地,必須要養當地主產的鷹犬,這些鷹犬不管在打着怎樣好看的旗幟……「民族主義」也好,「國粹主義」也好,但他們總不外是「一面靠着帝國主義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羣之馬」,不安本分的「莠民」……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治者之上的。」(二心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魯迅是懷着極大的恨意來攻擊這些鷹犬的:

「德皇威廉因為要鼓吹『德國德國,高於一切』,而大叫着『黃禍』,這一張『亞細亞勇士們張大』的『吃人的血口』,我們的詩人却是對着『幹羅斯』,就是現在無產者專政的第一個國度,以消滅無產階級的模範——這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目標;但究竟因為是殖民地順民的『民族主義文學』,所以我們的詩人所奉為首領的,是蒙古人拔都(Batu),不是中華人趙構,張開『吃人的血口』的是『亞細亞勇士們』,不是中國勇士們,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統馭之下的『友誼』,不是各民族間的平等的友愛——這就是露骨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但也是青年軍人的作者悲哀。」(二心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在這裏,他不僅揭破了民族主義文學的本質,抑且展示了他的民族主義要求和國際主義精神的交流。他

所要愛護的，是「無產階級的模範」，「無產者專政的第一個國度」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間的平等的友愛」。根據這個觀點，他把對於帝國主義的熱烈的憎，和對於社會主義的熱烈的愛，從一個中國人的立場傾瀉出來：

「……十來年前，說過蘇聯怎麼不行，怎麼無望的所謂文明國人，去年是在蘇聯的煤油和麥子面前發抖。而且我看見確實的事實：他們是在吸中國的膏血，奪中國的土地，殺中國的人民。他們是大騙子，他們說蘇聯壞，要進攻蘇聯，就可見蘇聯是好的了。」（二心集：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

根據同一觀點，他擲出了強烈的反法西斯主義的投槍。他公開宣布自己是憎惡法西斯蒂的一個。（南腔北調集：又論「第三種人。」）在他的雜文中，他不止一次對法西斯蒂屠殺民衆，壓迫革命，消滅自由和摧殘文化的暴行作了銳利的抗議與諷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很早就看到了一切帝國主義國家正在向法西斯化的道路奔馳：

「據說，現在的世界潮流，正是龐大權力的政府的出現，這是十九世紀人士所夢想不到的。意大利和德意志不用說了；就是英國的國民政府，「牠的實權也完全屬於保守黨一黨。」美國新總統所取得的措置經濟復興的權力，比戰爭和戒嚴時期還要大得多。」大家做動物，使上司不必徵求什麼同意，這正是世界潮流，豈歎盛哉，這樣的好榜樣，那能不學？」（淮風月談：同意和解釋。）

魯迅的反對法西斯主義，不單是作爲一個民主主義者出陣，同時也是作爲一個社會主義者迎戰。他曾參加過反法西斯主義的國際組織，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召開的反世界大戰反法西斯蒂大會，他便是組織者之一。他會率領上海文化團體代表親赴上海德國領事館對納粹摧殘文化的暴行提抗議書；他也會熱烈同情于西班牙人民

綠的反法西斯戰爭（以上三點參考蕭參作紀念魯迅先生）。就在反法西斯鬥爭中，他也把握到了中國民主革命與國際主義運動的聯繫。正因為他堅強反對帝國主義，擁護世界勞苦大眾利益，所以極端憎惡國際法西斯特權魔；也正因為他熱烈支持中國工農大眾解放戰鬥，反抗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反動勢力，所以猛烈攻擊國內的法西斯主義毒藥。他不只一次囑笑了和打擊了那些偷運和抄襲外國法西斯主義的「黃臉乾兒們」（淮風月談：「華德焚書異同論」），他曾特別強調反法西斯傾向的爭民主運動，喊着「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的自由！」（二心集：答中學生雜誌社問。）在他和他的戰友的號召之下，保衛民主反抗法西斯主義的伏流是在各地文化界奔馳着。

和他的攻擊乾兒式的法西斯主義一同，他反對阿Q式的民族主義。阿Q式的民族主義者一聽到了「黃禍」兩個字，便「得意了好幾年，準備着去做歐洲的主子。」（淮風月談：「黃禍」）他們一向在誇耀着：「成吉思汗征服歐洲，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且介亭雜文：「隨便翻翻」）他們「硬霸「元人」為自己的先人，彷彿滿臉光彩似的，去驕傲同受壓迫的斯拉夫種。」正像阿Q以做趙太爺的「本家」為光榮一樣。（三閒集：「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他們要「追隨拔都元帥之後」（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去「西征幹羅斯」，但是他們實際上是在幫忙恩主轉移大眾反對帝國主義的目光。是要大眾追隨在大亞細亞勇士之後，去進攻中國真正的友邦。魯迅用雷火照出了他們散佈的「美麗的毒菌」。在他的歷史解剖刀之下，暴露了阿Q式的民族主義者的淺薄無聊與昏庸無恥：所謂「黃禍」，其實是德皇威廉所想像的佛陀侵入歐洲文化，與華夏無關；所謂「最闊氣的時代」，「其實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國，我們做了奴才」的時代（隨便翻翻），而所謂「西征幹羅斯」，「倒是俄人做奴的資格比我們老。」（同上。）

魯迅的民族主義，也就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是跟一切民族失敗主義、法西斯主義、和阿Q式的民族主義不並立的，因為它和國際主義是血肉相連的。從國際的意義來說，它所追求的，是「各民族的平等的愛」，其最後目的是實現「無階級的社會」。但是，中國還處在帝國主義暴虐壓迫之下，不首先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爭得民族的徹底解放，中國人民就不能擺脫奴隸的枷鎖，走向更高階段的革命。魯迅在作為國際主義者參加反帝國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戰鬥時，沒有叫他的愛國熱心打半點折扣。他確鑿地宣稱：「我不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自從「亞細亞勇士」的屠刀從東北一路殺進來以後，他同全中國警告民族危機迫使全國人民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分界線，他憤激地攻擊亡國主義者，號召民族的團結：

「……當「揚起火鞭」焚燒「幹羅斯」將要開頭的時候，就像拔都那時的結局一樣，朝鮮人亂殺中國人，日本人「張大吃人的血口」，吞了東三省了。莫非他們因為未受傅彥長先生的熏陶，不知「團結的力量之重要」，竟將中國的「勇士們」也看成非洲的阿剌伯人了嗎？」（二心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正當全國人民在「亞細亞的勇士」的刀光劍影中掙扎於死亡線上的時候，「先安內然後攘外」的沈瀟空氣在亞塞民族的呼息，一方面是「誘敵深入」，「縮短防線」的對外「戰略」，另一方面是「雖流血亦所不辭」的對內政策。（偽自由書：戰略關係。）魯迅的反民族失敗主義的鬥爭，在這時就具體化而為反不抵抗主義，反安內第一主義的鬥爭。他說：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關，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內而後可以攘外。」但可恨的是外患來得太快一點，太繁一點，日本人太不爲中國諸公設想之故也。」（南腔北調集：論「赴難」和「逃難」。）

事實很快證明了他的豫見。「岳飛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聽命國聯爺爺的孝……誘敵深入的和平」（南腔北調集：真假堂吉訶德）給予「亞細亞勇士」「深入」以無比的便利。從此以後，「親善」、「提攜」的老調子又瀰漫於東亞，魯迅是憂懼這「親善」、「提攜」發展下去的悲慘後果的：「不久之後，恐怕那親善的程度，竟會到在我們中國，認爲排日即國賊——因爲據說是共產黨利用了排日的口號，使中國滅亡的緣故——而到處的斷頭臺上，都閃爍太陽的圓圈的罷。」（且介亭雜文末編：我要騙人。）他不及看見中國神聖的民族革命起來，就逝世了，這不只是他個人的遺憾。然而，他的遠慮並非過慮。他深知民族失敗主義的老病根潛伏在某「羣「君子」的內心太深，一到民族遭到挫敗，「那些君子們，不是像白鶴的騰空，就如獼猴的上樹，「樹倒獼猴散」，另外還有樹，他們決不會喫苦。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蟻蟻和泥沙，要踐踏殺戮都可以……」（南腔北調集：沙）。在這樣的「君子爲猿鶴，小人爲蟲沙」（語出抱朴子，魯迅在這裏把這兩句話加以新的解釋）的兩極化中，用「排日即國賊」的罪名加在「蟲沙」似的「小民」頭上，自然是「名正言順」的。而不幸，魯迅在民族革命戰爭前夜所說的這些話，已經成爲部分的被證實的豫言了。但其實，這也沒有什麼不幸，猿鶴的「上樹」和「騰空」，豈但對中國沒有絲毫損失，而且越發澄清了中國的民族陣線；沒有猿鶴，就不能反襯蟲沙的團結力偉大。小民雖如「蟲沙」，但決非「散沙」（沙），因爲「小民知道關於本身利害時，何嘗不會團結。」（沙。）正是根據了這個確信，魯迅擁護了並號召了民族統一戰線。

「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是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認為非常正確。」（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

他在很早之前就昭示：「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不過先前的聯合戰線「目的都在工農大衆」（同上），而現時的統一戰線目的却在民族生存，「因為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有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以一切生活都與這問題有關……而中國的唯一出路，是全國一致的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且介亭雜文附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因此，抗日人民統一戰線是比法國的人民陣線還要廣泛得多。」（答徐懋庸並關於民族統一戰線），「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同上。）這樣，他就堅持民族革命的統一戰線政策，反對一切破壞統一戰線的企圖。

然而，魯迅的民族主義和他的階級論完全是一元的（參見幽雪著作一種誤會），他的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非常明確地貫串在他的思想與藝術中，因此斷然反對了那些藉口「民族立場」而進攻國際與國內的勞苦大衆的反動傢伙。他在攻擊「民族文學」時，曾經這樣表白了自己的階級立場：

「作為這武器而出現的，是所謂『民族文學』。他們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種的臉色，決定了臉色一致的人種，就取得同一的行爲，所以黃色的無產階級，不該和黃色的有產階級鬥爭。」（且介亭雜文：中國文壇上的鬼魅。）

他的堅定的階級立場，就在強調民族統一戰線的時期，也沒有絲毫動搖過，他不曾叫民族團結的熱潮沖昏

了自己的頭腦。他大聲警告一切擁護抗戰的人們：「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出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且介亭雜文附錄：半夏小集。）他深刻指出：民族統一戰線「決非停止了歷來的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一切反動者的血的鬥爭，而是將這鬥爭更深入，更擴大，更實際，更細微曲折，將鬥爭具體化到抗日反漢奸的鬥爭，將一切鬥爭滙合到抗日反漢奸鬥爭這總流裏去，決非文學放棄牠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而是將他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才真是階級的立場。」（且介亭雜文附錄：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正因為他堅持着民族立場與階級立場一致的主張，所以他猛烈反對藉口「國難期間，共體時艱」，對勞苦大眾實行「有理的壓迫」（偽自由書：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警告愛國民眾時刻提防有可能化為「猿鶴」的「君子」把自己出賣，暗示被壓迫民眾要分辨清楚，迫害他們的，究竟還是長毛之類的「流氓」，還是「短毛」、「花綠頭」之類的王軍。（見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之餘第三節。）而在另一方面，斥責了那些「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道德」替「亞細亞勇士」滑道的「高超的理論家」。

（見且介亭雜文附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而且，在堅持抗日民族革命戰鬥的時候，魯迅也並未忘記他的國際主義立場。他明確宣示，中國人民的反對東亞帝國主義，並非仇視一切日本人，「日本和中國的人民之間，是一定會有互相瞭解的時候的。」（且介亭雜文：「活中國的姿態」序。）但自然，在被壓迫的中國民族沒有爭得自由解放之前，和壓迫民族決談不到「親善」與「提攜」，因為「現在還不是這樣的時候。」（同上。）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是這樣生動地互相滲

透在他的每一個政治思想細胞中。

如前所說，魯迅的傾向國際主義和他過去反國粹主義的鬥爭有直接的聯繫。在這裏，我們要研究，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統一性是如何表現在他的文化思想中。

魯迅是最早堅決主張吸收外國文化來救治中國民族的精神敗血病的。在他開始輸入歐洲文化的時候，他已經具有民族主義的熱烈傾向。他最初介紹西洋文學，即被壓迫民族的文學為主，這因為中國民族的命運，和那些被壓迫民族相似，中國民族要爭得自由，不得不引別的謀自由的弱小民族為同調。在論及介紹波蘭文學時，魯迅就曾自白過：「『紹介波蘭詩人』，還在三十年前，始於我的摩羅詩力說。那時滿清宰華，漢民受制，中國境遇，頗類波蘭，讀其詩歌，即易於心心相印，不但無事大之意，也不存獻媚之心。」（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章。）誠然，在當時，他的民族主義鋒芒，主要還是對準滿清壓迫者，但他已經看到了，中國民族應當覓求別國的新聲來鼓起戰鬥的熱情，反抗民族的壓迫。他在域外小說集的序言中說：「……異域文術新宗，由此始入華土。彼有士卓特，不為常俗所囿，必將擊然有當有心，按邦國時期，審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就可見他的介紹外國文學，不但單純出發於藝術的要求。到了五四時代，魯迅高舉了反國粹的旗幟，也是主要着眼於民族的生存。「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熱風）所謂國粹，是否能保存我們呢？魯迅的回答是否定的。此後，他的打擊國粹派的戰鬥，構成了他的民族自我批判重要的一部分。從民族的生存出發，他反對復古，反對倒退，「因為古國的滅亡，就因為大部分的組織被太多的古習慣教養得硬化了，不再能夠轉移，來適應新環境。」（華蓋集：十四年的讀經。）

他希望用外來的新文化來洗刷塵封的舊中國，甚至希望「真有良心」的外國人「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填：燈下漫筆。）然而，後來的事實告訴了他，帝國主義者是唯恐中國的民族組織不「硬化」。魯迅慨然警告中國人：「他們對於中國人是毫不愛惜的，當然任憑你腐敗下去。現在聽說又有別國人在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了，那裏是尊重呢？不過是利用。他們倘比我們更聰明，這時候，我們不但不能同化他們，反要被他們利用我們的腐文化來活埋我們這腐敗民族。」（集外集：老調子已經唱完。）顯然，半殖民地的中國，不能被帝國主義所愚弄，爲了救治民族硬化的危機，應當毫不遲疑地吸收外國文化的血液，因爲「中國固有的文化咒不死帝國主義。」（南腔北調集：真假堂吉珂德。）所謂吸收，不是不加擇別胡亂地吞嚥，而是批判地有系統地輸入。在轉變爲階級論者與國際主義者之後，魯迅更堅強地主張中國應當大膽地取用外來的文化，但不能是被動地讓別人「送來」，而必須主動地從外國文化倉庫中「拿來」，這就是說，對於外來文化，「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且介亭雜文：拿來主義。）落後的中國，要按照自己的民族解放需要，批判地提取外國文化的精英，一面消除中國「固有文化」的毒質，一面培養中國新文化的根幹，這就是「拿來主義」的本質。在這裏，文化思想上的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一致，非常鮮明地表現出來了。

魯迅是外來文化的辛勤介紹者和有力鼓吹者，同時又是民族文化遺產的優秀繼承者和傑出發揚者。他對於民族文化與國際文化的關係，有着最正確的理解。他一面鼓吹大量介紹外國文化，一面贊成採取民族形式，一面主張不怕「歐化」，一面又提倡「地方色彩」。事實上，他的全部作品，是鑄化了世界進步的文化成果，而又保留了特有的民族風格。

★

★

★

★

如果說，魯迅的國際主義和他的反對民族閉關主義有歷史的聯繫，那末，他的民族主義和他的尊重民族戰鬥傳統有直接的聯繫。他的對於舊中國與竊敗傳統的憎惡和詛咒，並不絲毫減弱他的民族自尊心，反之，他是非常珍重歷來中國民族的傳統戰鬥精神的。他曾說：「明亡以後，一點土地也沒有了，却還有竄身海外，志在恢復的人」（華蓋集：這回是「多數」的把戲），顯示了他對於民族先烈的敬意。在他到了廈門以後，看見鄭成功所造的城壕遺迹，不禁慨然說：「一想到除了臺灣，這廈門乃是滿人入關以後，我們中國的最後亡的地方，委實覺得可悲可喜。」（華蓋集續編。）他痛恨滿清政府，除了是因為牠用苛政壓迫漢人外，還因為牠毀滅漢人的民族自尊心，他指出，滿人的任意刪改漢籍，其目的在於「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裏面，也曾經過很有骨氣的人。」（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之餘。）在堅持民族解放鬥爭的過程中，提高民族的自信力與自尊心，正是發揚民族革命精神最必要的任務。魯迅正是從各方面執行這個任務的愛國者。當少數軟骨蟲在那裏高呼中國人民失掉了民族自信力的時候，他提出了有力的反駁：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輝，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罷了。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於全體，那簡直是誣蔑。」（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然而在另一方面：那些民族軟骨蟲是真的失掉了民族自信力的，他們向王道的宣揚者獻雲說道：「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這分明是「攻心爲上」的戰略，而魯迅指出這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偽自由書。）民族軟骨蟲所渴望的，是侵略者用真正的「王道」來代替「霸道」，但他們不知道：在歷史上，「……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乃是兄弟，這之前和之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且介亭：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如果從奴隸立場看來，在侵略者實行「王道」的時候，不過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墳：楹下漫筆）；而當「霸道跑來」的時候，不過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同上）。然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是不會到來了，於是奴隸悲哀了，因爲他們所渴望的「征服中國民族的心」的「王道」是給「頑民」弄得毫無根據了。魯迅確鑿指出，中國民族的心是斷然征服不了的，即使「中國也有過謳歌了元和清的人們，但那是感謝火神之類，並非連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證據。」（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任憑王道宣揚者如何賣力，可是，他至多是少數中國軟骨蟲見了害怕的火神，在今天，中國人民不是處於元、清之際，他們用不到感謝火神，更不會被王道所愚弄。

但是，魯迅認爲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力是要用民族戰鬥來培養的，因此，他不僅厭惡活得最舒服最橫暴的漢奸，而且也反對活得最清高的「逸民」。（半夏小集。）

附錄 思想家的魯迅

前記

這篇思想家的魯迅，寫於一九三八年。那時留在上海孤島上的文化孤軍組織了好些教育自己整肅隊伍的座談會，其中之一就是學術性兼時事性的未名座談會，我也忝列座末。這年十月中旬，在陳公館開會，適逢魯迅先生逝世兩周年祭。由我提議，選定了「關於魯迅思想的研究」這個題目，作了將近三小時的討論，發言人配得有：許廣平、羅稷南、胡曲園、陳珪如、吳清友、藍天寧、樊英、何封、潘蕙田、郭箴一、孫冶方、王紹文、吳大琨、旅岡、平心諸人，雖然當時無人記錄，沒有留下一點文字痕跡，但那一回大家交換意見的懇切與熱烈的景象，至今猶歷歷如在目前。當天下午，大家選舉我執筆寫一篇專論，而且並不約束我取材於座談的論旨，由我自由發揮意見。我硬起頭皮，窮一星期之力，——最後兩天因為要趕上刊期，連開了兩晚夜車，草成這篇論魯迅的思想約五萬字，交王任叔兄主編的民族公論發表。這位巴人老兄並不厭篇幅太長，毫無刪節地將全文一次刊完。他的大刀闊斧的爽快作風，至今猶令我感歎不已。後來他撰述論魯迅的雜文一書，復承他不棄，引用其中二三節不成熟的鄙見，發為宏論，對於我簡直是空谷足音。我分明記得，在草寫論文時，我將魯迅全集溫習了一遍，有如伐木童子攜荷斧斤深入無邊山林；但見林樾參天，濃蔭撲地；真是喬木萬千，伐之不暇；奇葩蔽日，採擷不勝。我時而掩卷大笑，時而擱筆嗚泣。鈍拙如我，尚且如此歡動於迅翁如椽之筆，敏感

之士讀完這一代文藝的力作，怎能不肅然起敬，憬然動容呢？說老實話，這篇拙文與其說是爲了公諸讀者而撰述，毋寧說是爲了自己的欣賞與學習而寫成。靜夜理稿，想起當年一同參加座談會的好友雲散各地，音問斷通；而任叔兄又衍教異域，海天遙隔，連一個小小的座談會和民族公論一類的刊物也恢復不起來！悵悵之懷，又豈是重讀舊作的喜慰之情所能排遣！

平心記於一九四六年初寒之夜

附錄 思想家的魯迅

第一節 怎樣研究魯迅思想的發展

正像魯迅自己所用的筆名特別衆多一樣，由各方面和各種人加給他的惡謔與嘉名也格外來得多。「學匪」、「學棍」、「墮落文人」、「反動文人」、「封建餘孽」、「毒筆文人」、「文壇貳臣」、「沒落者」、「雜感專家」、「買辦」、「虛無主義者」、「刀筆吏」、「世故老人」、「思想權威者」、「中國思想的權威」、「青年叛徒的首領」、「革命文豪」、「舊社會的叛徒」、「新文學的開山」、「民族革命的象徵」、「民族導師」、「偉大的革命鬥士」、「偉大的民族射擊手」、「第一個人民」、「中國的高爾基」、「新中國的聖人」，……所有這許多表示毀譽褒貶的不同稱呼，對於魯迅本來不能絲毫減損或增益他的偉大。然而當它們從不同的嘴巴裏喊出來，或者從不同的筆下寫出來的時候，其中的任何一個其實都代表一定人羣對於魯迅的看法，並且多少是帶有一定的社會意義的。對一個時代巨人的咒詛嘲罵，或頌揚喝彩，不論它們是從那一方面發出來，也不論其發出時的動機怎樣，決不能簡單看作一種私的感情衝動。「每個人也依照自己的見地而行事」，這是二十年前列寧遇刺後對高爾基說過的話。實際上，每個人都依照自己的見地而發聲。當戰士的正義槍尖刺痛了某一羣人不可告人的瘡疤的時候，被刺中的人倘使不是由刺痛引起了他的覺悟，大抵是要用輕蔑惡罵來表示他和他所屬的一羣人的「見地」的。（自然，其中由於對戰士的認識不足，以左傾幼稚病的眼光表示輕蔑的

也不少。在相反的一面，凡是願意正視現實不怕和正義的戰鬥見面的人，看到一位模範的戰士勇敢善戰，領導大家向前衝殺，在他戰死的前後，也不由不從心坎裏湧起讚美和感激的呼聲，來表示和上面恰相反的「見地」。就在各種不同的「見地」交相鬥爭之中，於是對準這位力戰到死的鬥士，一方面有糞污沙泥紛紛投擲，另一方面也有鮮花彩紙飄飄飛來。

在魯迅還活着的時候，他在一般人的眼睛裏，好像還是一個極大的謎。就算承認他是一個謎吧，這個謎其實也像清水一樣清澈，使人容易見底。然而問題是，這個偉大的謎對於現世界的糞穢和爛瘡表現了強烈的諷刺味道，使得許多逐臭嗜痂的正人君子紳士淑女由頭痛而勾起草憤，於是帶着悵心懷着惡意瞎猜亂擬，彷彿一羣碰着窗上玻璃亂飛亂撞的蒼蠅，在透射進來的亮光面前嗡嗡一陣，而始終不知道亮光是回什麼事。兩年前的今天，魯迅給結核菌奪去了他的生命，於是偉大的謎底揭舉在大衆面前了；作成這個謎底的，除了魯迅自己的人格、戰績和思想的總結外，還有大衆對他一致發出的嘆息和流出的眼淚。於是魯迅的崇高偉大在許多人的眼睛裏比以前清楚得多了，爲更多的人所承認所讚嘆了；雖然仍舊有一部分人在那裏想打翻謎底，繼續他們的「噓」。

「謎底」雖然公布了，然而關於構成這個謎底的主要因素——魯迅的思想還是值得大家研究的。不了解這個巨大的思想，就無法了解他的藝術，也就無法了解他給予時代的影響和他在歷史上的地位。

魯迅是以民族號手兼民族代言人的雄姿出現在中國的現代史上的。他的光芒四射的思想照耀在落後的中國，不但使他當得起列維它夫加芬易卜生的評語：是一個「偉大的疑問號」（？），同時也當得起列維它夫加

給魯伯納的評語，是一個「偉大的感歎號」(！)。自然，「偉大的疑問號」和「偉大的感歎號」結合在魯迅的思想中決不是偶然的事，也不能簡單拿魯迅的天才和修養來說明的。長期過着奴隸生活的中國人民大眾，在現代歷史變動的悲喜劇中，眼前碰到無數可悲可笑的矛盾，心頭懷着無數不可解答的疑問，他們悲痛，忿恨，憂鬱，絕望，彷徨，掙扎，呻吟，啼號。整個民族喘息在慘苦和頹廢的氣氛中，像一頭拴在潮濕而黑暗的牛欄裏忍受着蚊虻環攻的老牛。順應着歷史的需要，於是出現了一位奇特的天才，他發見了許多為一般人所忽視的古老民族和腐舊社會的病症，找到了許多為別人所看不清的現實世界裏的矛盾，提出了許多觸及民族命運和大衆生活的問題。他僅僅是把這許多病症、矛盾和問題用他的筆描寫一下就滿足了嗎？不！他要診斷病症的真相和癥結，要追究矛盾的來歷和實質，要找出問題的基因和要點。於是通過他的筆尖和喉舌，有着最明確的關於民族病與社會病的暴露，有着最生動的關於現實矛盾的揭穿，同時也有着最切實的關於大衆切身問題的解答。還在他沒有接近最新的關於歷史觀與社會觀的科學理論以前，他早就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了歷史進展和社會鬥爭的真理，把握了許多現實問題和社會現象的本質，預見了各種社會變動和政治變動的趨勢，指示了不少有利於社會變革和民族改造的實踐方針，同時並運用了一種與唯物辯證法相近的思辯方法。這時候他算得是一個自發的走向革命走向科學的世界觀的出色思想家。在他自覺的運用了最新的真理武器之後，他的思想就更真實有力地馳騁於藝術、人生和政治的戰場。當我們考察魯迅的思想發展過程的時候，不難看出，他的發掘真理的能力與方法並不完全得自書本，而主要地是從生動而豐富的現實中得來，是在勇猛不息的戰鬥與深沈無比的體驗中得來的。靠着銳利的洞察一切的眼力，靠着他所吸收的最優秀的中外文化傳統，這位天才把他所

接觸到的周圍的多種現象，把現實的每一面，把各種人物與社會心理的典型，把名式各樣羣衆的生活與意識，把表現在歷史舞台上的悲劇和喜劇，都觀察得最真切，而又最深刻。他的頭腦像一個巨大的分金爐，一切現象、人物和事情經過這分金爐，都各自顯出了他們的本體。他決不籠統地模糊地觀察任何事物，他是把客觀的真實當作有統一性的然而又有千差萬別的對象看待。不但如此，他的大部分的作品和言論都是經過不斷的鬥爭產生出來，發表出來的，因此沒有空洞的議論，更沒有脫離實際玩弄教條的臭味。這樣，就使他的思想呈現了好些優異之點，那便是具體，深澈，綿密，生動而又富有實踐性。

魯迅表現自己的思想，有好些值得注意的特殊方式，不了解他的特殊的思維表現方法，就很難認識他的思想全都。

魯迅跟一般的理論家和政論家不同，他並不寫純理論的社會論文和政治論文，也絕少正式提出自己的社會改造方案和民族革命主張。正因為如此，就使許多人忽視了他表現在各方面的思想的價值，不能把他作爲一個思想家和政論家來了解。實際上，在魯迅的全部作品言論中，包含了最豐富最生動的關於社會、人生、歷史、政治與藝術各部門的剖解、批判與理論。他不僅發揮了先驅者的最進步的理論與思想，而且顯示了許多他自己特有的創見與預見。他是最有胆力和最有眼力的能够跳出「時代限制」的思想鬥士。但是作爲思想鬥士的魯迅，一開始就是披上藝術鬥士的鎧甲馳騁在思想戰場的。他是用藝術的手腕巧妙地表現足以代表社會進步勢力的各種觀念和理想，是常以形象化的方法傳達他對於民族對於社會的批判、希望和預言。不僅在他的純文藝作品——小說、詩歌中，他運用了極熟練的形象描寫法來表現自己的思想，就是在他的小品文或雜感文中，他的思

想也常是通過形象化的方法來接觸讀者。例如春末閒談（墳：全集第一卷）是他在大革命前夜寫的一篇攻擊封建軍閥官僚及其走狗的政治雜感；但他並沒有一開始就說出一篇大道理，只是先從一個昆蟲界的故事談起，隨後才針對軍閥官僚和所謂「特別智識階級」來一通辛辣的諷刺。在這諷刺裏面，他揭露了一個不可磨滅的歷史真理，即「治人者」無法消滅「治於人者」的反叛，就因為大眾的思想是無法除掉的。至於在魯迅的小說詩歌中，他的通過具體的形象和典型表現出來的社會思想與政治思想，實在太豐富了。

魯迅不但善於運用一般的形象化手法來發表自己的思想，而且慣於用一種特殊的形象化方法——諷喻法（Allgory）來傳達自己的意思。這是因為他經常處在一種不自由的惡劣環境中，不能使用巧妙的藝術來曲折地打擊敵人。他有許多作品通篇不直白題旨，却用寓言或象徵來隱藏自己所要說的話，只是給讀者以有力的暗示，讓讀者自己去體會。例如論雷峯塔的倒掉（墳）一篇小品文表面上好像是「閒話」雷峯塔的神怪故事，骨子裏却在於暗示大眾，反動的統治者無論怎樣禁壓人民的自由，他的「反動冰山」終有一天要崩潰的，那時候他就不能不像法海和尚一樣逃到蟹殼裏去避禍。收集在故事新編裏的文字差不多全是假托中國歷代的神話和傳說來諷刺現代各色各樣可憎的人物和怪象。阿Q正傳許多人都承認是魯迅暴露農民的愚昧和豪紳的惡毒的小說，但它同時也包含了一種寓言的意味，即通過阿Q等的形象來諷刺國民性的弱點（記得茅盾先生曾在一篇文字裏指出這一點。魯迅先生在再談保留的一篇雜感中似乎也承認的）。此外的例子還很多，這裏不能細舉。

從魯迅的雜感文裏，可以看出他通過人物的批評來揭發社會和民族的弱點、病態和各種的黑暗面。何澹（雁秋白）說魯迅所攻擊的人物的姓名「簡直可以當作普通名詞讀，就是認做社會上的某種典型」，大抵是不

錢的。對於魯迅的雜感文，不從社會的戰鬥意義上去認識，而專從私人的恩怨好惡去猜想，去「索隱」，那必然要歪曲塗污魯迅的思想。

魯迅的作品特別是諷刺文每每愛用反語（Irony）來表現自己的見解。這也是爲了應付客觀環境所不得不使用的一種戰術，不過同時也是要加強一種修辭上的諷刺力量。例如，在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篇諷刺文裏，「愛昂理」的氣味就特別濃厚。

記得有一位名叫葉公超的教授曾經抓住了而已裏面的一段「反語」，就當作魯迅傾向自私自利的「內傾的個人主義」的鐵證。這位教授是够聰明的。

最後，魯迅不但善於用自己的言詞來發表思想，而且也經常用外國人的言詞，即是用翻譯來表示自己的意見。例如一九二一年所譯阿志巴綏夫（Michael Artsbashev）的工人綏愚略夫（The Workingman Shevryev）相當可以表露魯迅的反抗思想。不過綏愚略夫式的反抗還只是個人的，虛無主義的，並非集團的，革命的。到了後來，魯迅對於這樣的一種戰鬥觀已經覺察到不怎麼正確了，據說他曾表示讓這本譯書絕版。從一九二九年以後，他譯了許多關於革命藝術與新興文學的名著與論文，此時他的集團主義戰鬥思想是借外國理論書與小說的翻譯表現着的。至於他早年與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所選多爲被壓迫民族的小說家的作品，可以想見他那時頗帶有民族主義的思想。從魯迅的翻譯中，可以找到他的思想發展的線索，是很值得注意的。但也不可看得太機械，以爲每一部書的翻譯都可以恰當地表徵他的思想。

第二節 從清末直到大革命以前的魯迅思想

一切不朽文豪大概都在歷史上都鑿着時代鏡子和社會鏡子的作用。魯迅就是中國民族的一面偉大鏡子。凡爲他的藝術語言所震撼的人，大約都會承認，他的作品和思想是明澈地照透了中國民族的狀貌和精神，反映了中國民族生活的蛻變和發展。從保留着的魯迅言語裏面，我們可以感奮地看到中國民族的受難，被侮，患病，掙扎，苦鬥，可以親切地聽到中國人民大眾的呻吟，詛咒，啼號，吶喊，怒吼。舊中國向新中國轉變的每一階段都在魯迅的作品中印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然而作爲民族鏡子的魯迅，並非把民族生活變化的影子平面地映現出來就算了，他始終是取着批判的態度來透視和評價一切，始終是代表着民族與社會的生機來和民族與社會的死氣不斷鬥爭。他的批判和鬥爭恰恰是跟中國社會政治與文化的發展和鬥爭合拍的。他的思想誠然是時代不斷發展的產物，但是他也常常能動的用思想去影響羣衆，照耀社會，喚起民族的自覺，改變陳腐的風氣。他實在是舊民族生活的批判者，新民族風氣的創造者。

但是，魯迅不是超時代的怪物，他的思想發展是反映現代歷史——特別是中國現代史的轉變與進展。這個不僞爲外力發展過速所苦，而且爲自己發展不足所苦的老大中國在最近半個多世紀中，並非像死水一般停滯不動，她經歷了許多次大小的風暴和巨變；其間有僵屍的復活，有大衆的受難，有屠戶的施暴，有奴隸的苦鬥和失敗。有革命的起伏和變化，種種複雜紛紜的歷史景象在魯迅是觀察得太熟悉了，迫使他不得不思索，又不得不把他的批判、透視、意境和希望通過筆尖傳達於羣衆中，而所有這些都是作爲他突擊舊中國的武器而結晶焉。

文字的，這便是魯迅寫作的由來。

正因為魯迅思想是社會發展歷史轉變的反映，所以必須拿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歷史來說明魯迅思想的源流與發展。

粗略地劃分起來，魯迅思想的發展大概是經過如下幾個重要階段的：

第一期，約從他的求學時代到五四以前；

第二期，約從五四時代到大革命前後；

第三期，約從大革命失敗後到病死之前。

以下我們就依照時代的順序來考察他的思想發展過程，以及發展的每一個階段所表現出來的特點。

魯迅的幼年和青年正值十九世紀的末期，那時正是外洋資本主義的急潮深入中國，中國舊社會急遽趨於崩潰的時代。商業資本不能迅速蛻化為獨立的民族資本主義，而殘破的封建主義堤防又阻礙着中國社會進展到近代化的道路。整個民族窒息在一種「世紀末」的焦燥與苦悶中。市儈化的官僚士大夫們逐漸意識到有變法圖強的必要。然而由於中國社會條件的限制，使他們並不能擺脫骸骨的迷戀。他們只是主張用槍砲與工藝（即是後來所謂「物質文明」）來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李鴻章、張之洞等所提倡的「洋務」便是這一時期官紳的中心運動。接着中國初期的啟蒙運動已露出曙光了。適應着當時洋務運動的需要，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勃興了輸入泰西科學的風氣，半政治性的學術團體，如廣學會、強學會、桂學會等先後成立了啟蒙運動的領導組織。這時提倡洋務輸入新學還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做中心口號。一八九八年突發的「戊戌政變」是緊接甲

午戰爭失敗後的政治維新運動，這運動雖然在很短期間就流產了，但它在中國現代史是有着重大的社會文化意義的。戊戌政變暴露了中國社會的內在矛盾，同時也加劇了國內的文化鬥爭與思想鬥爭。接近於近代資產階級思想的康、梁、譚等成了這一時期啓蒙運動的領導人物，他們代表一部分比較開明的智識份子。然而戊戌政變失敗以後的康、梁（譚嗣同已犧牲於政變中）並不能領導當時的改革運動。唯有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興中會，才相當担负起了民主革命的任務，和妥協的保皇黨（以康有爲爲首領）作猛烈的鬥爭。這樣，初期的啓蒙運動轉入一個新的階段，和革命的民主運動結合起來，成爲反封建反專制主義的洪流。

魯迅因爲出生較遲，自然不是初期的啓蒙運動和民主運動的領導人物。然而他在青年時代已經深深地受了這兩大運動的影響，是毫無疑問的。他出生在一個正在沒落中的士宦家庭，照例一個破落了讀青人家子弟在當時只有兩條路走，即做幕友或商人。但是青年的魯迅却不願走上這兩條老路。強烈的求知慾使他「想走異路」，即是去學洋務。他的母親哭了，「因爲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爲是走頭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出賣給鬼子。」（吶喊序，全集卷一），這實在足以代表當時一般的社會心理。此後是魯迅開始接受科學知識的時期。他最初是學開鑛，由此不但學到了一些關於數理化、地質學和礦物學的知識，並且接觸了由「新黨」編譯的許多新書報，進化論（天演論）給予他的影響特別深鉅。從當時魯迅的求知活動中，可以想見初期的啓蒙運動是使他日益走上思想革命道路的主要推動力量；沒有這次啓蒙運動，也許魯迅就不會成爲五四啓蒙運動的主導人物。

初期的啓蒙運動使魯迅發生了維新思想，他到日本去學醫，就是希望借他所學到的醫學知識「促進國人對

於維新的信仰」(吶喊序)。然而他後來因爲有一次在電影上看到一個中國同胞被日人殺頭示衆，而左右圍繞着許多麻木的看熱鬧的中國人，使他省悟到「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識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吶喊序)。於是他決定轉向文藝了，因爲他認爲唯有文藝善於改變國民精神。其實，早在他開始寫作的時候，他對於文藝已有相當興趣。從一九〇三年爲浙江潮謄譯的斯巴達之魂一篇小說裏，就可看出他的文藝修養。這篇小說是頌揚弱者的戰鬥來喚起「國魂」的。不過到了一九〇六年他才決定放棄學醫，走上文藝的道路了。這時候，他對於科學和文藝的造詣都相當深，他主張用科學來振興邦國，用文藝來改善民族。一九〇七年他爲河南雜誌撰文，介紹了新的自然科學知識。(在此以前他曾爲浙江潮撰說鉛一文，介紹了新的化學知識)，如人之歷史是一篇闡明生物進化論與人類起原論的，科學史教篇是敘論自然科學發達史的。在後一篇文章的結尾，指出提倡科學不應妨害文藝的發展，把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原文譯作狄士不爾)、拉斐爾 (Raphael = Raffaello) (原文譯作洛非羅)、悲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原文譯作培得奇芬)、喀萊爾 (Thomas Carlyle) (原文譯作嘉來勒)和牛頓 (Isaac Newton)、波爾 (Robert Boyle) (原文譯作波義耳)、康德 (Immanuel Kant)、達爾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 一視同仁，可見他主張科學與文藝並重。

這時候魯迅思想的鋒芒是對準着當時流行於士大夫之間的庸俗而淺薄的清議政論。洋務運動者在高唱「振兵興業」論，但他們又不願拋棄「國粹」的骸骨，依然說不了「中體西用」的裏白。魯迅譏笑他們「倒果爲因」，「惟枝葉是求」(科學史散篇，墳)。他雖不反對「振兵興業」，但認爲不重視科學研究，發揚科學精

神，一切富國強兵的高調都只有完全落空。當時阻礙科學發展的，實際上，就是不澈底的「中體西用」論，淺薄的「振兵興業」論，和庸俗的衛道崇儒精神。

在未出國之前，魯迅的思想是頗受了「新黨」的影響的。等他回國後，國內思想界，除却一部分投身於民主革命的份子外，多數是匍伏於統治者跟前謳歌說夢；主張維新變法者有的是傾向粗俗的軍國主義，動輒「觀言武事」，……謂勾爪解牙爲國家首事」（文化偏至論，墳）；有的是標榜市儈的工商立國論，有的是高唱浮淺的立憲國會說，魯迅非但不隨從唱和，還揮擊不遺餘力。他揭破這些論客們無非是假力圖富強之名，干祿致富，釣名沽譽。「觀言武事」者「干祿之色灼然見于外」固然不用說了。就是那些熱心提倡「製造商估」者，其目的非「博志士之譽」，即預備享受亡國後「廣有金資，大能溫飽」的生活。至於侈言立憲國會者，大多數不過是「假是空名，遂其私慾，不願見諸實事，藉事權官議悉歸奔走干進之徒，或至愚鈍之富人，否亦善壟斷之市儈」。他接着就慨然指出：「古之臨民，一壺天也，由今之道，且頓變而爲千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於興國何與也」。（以上引文均見文化偏至論。）候補武夫市儈政客們完全從自私自利的立場來高談振兵修武、製造商估和立憲國會；流弊所至，不過是替中國造成了滿坑滿谷的殘民軍閥、亡國富翁和貪官污吏，這到了辛亥革命後不幸竟成了預言了。

這裏必須指出，魯迅當時並不反對「振兵興業」（他在科學史教席聲明「非謂人必以科學爲先務，始以振兵興業也」），也並非要反對實施真正的民主政治。他所要攻擊的，是假富國強兵之名來侈言武事實業而不注重「啓發人智」的主張，是假借多數人名義來提倡立憲國會而不重視「個性解放」的論調，至於許多人徒托空

名來達到自私自利的目的，那更是他所深惡痛絕的了。

當時魯迅在思想上很受了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的影響，就是重個性，非物質。尼采的超人學說在歐洲誠然是資產階級壓抑勞苦大眾反對社會主義的一種精神武器，但是的確如羅秋白所了解的，魯迅在當時的傾向尼采主義却反映着別一種社會關係。(魯迅雜感集序言)。那時候中國的勤勞大眾還沒有成爲自覺的決定政治命運的鉅大力量。「大部分的市儷和守舊的庸衆統治階級保守着奴才主義，的確是改變進取的障礙。爲着要光明，爲着要征服自然和舊社會的盲目力量，這種發展個性，思想自由，打破傳統的呼聲，客觀上在當時還有相當的革命意義」。(見上引書。)正因爲大眾在當時沒有成爲左右國家命運決定政治趨勢的鬥爭主力，那種假借多數名義的立憲國會主張，即使實現出來，也不過是替垂死的統治階級撐腰，造成「民不堪命」的惡果。何況「立憲」原不過是清末統治者用以緩和民衆反抗的一種烟幕。魯迅提倡「個性解放」，攻擊立憲國會之說，其目的就在於反抗壓抑人智閉塞性靈的奴才主義與守舊傳統。至於魯迅在當時「非物質」，決不是要提倡「精神文明」，恰恰相反，他是自始就反對陳腐的名教禮法，反對僵尸式的「國故」，「國粹」而主張發揚物質科學的；雖然，無可否認，他的思想在當時頗受了唯心論的影響。他所要非難的「物質」是一般功利主義的和軍國主義的論客們所看重的「金鐵」(二字見全集卷一四一頁)，「金」就是金錢(黃金)，鐵就是兵器(黑鐵)。他認爲倘使不能啓發民智，解放個性，即使中國有了多量的金錢財貨和長槍大砲，也不過產生了一些只顧自己「廣有資金，大能溫飽」的富翁財閥，也不過造出了一批「干祿」殘民的趙武夫，「於興國究何與焉」。他揭發了「捨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衆議」的主張(文化偏至論)，倘使

備作抽象的了解，很易誤解他在當時是一個提倡「精神文明」重視個人私利的理論家，但把他的主張和當時的社會政治情勢聯繫起來具體地加以考察，便不難明白，他的立論在客觀上還是具有一定限度的進步意義的。只因爲當時工農大眾還沒有成爲社會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只因爲當時還沒有正確的集團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輸入到東方來，使他不能不拿「平個性非物質」的尼采學說來作爲鬥爭的武器。

雖然士大夫的一羣在那裏高唱變法維新，富國強兵，但籠罩全中國的，仍然是缺少反抗精神和進取精神的暮氣。這使得一向痛恨民族麻木的魯迅再也無法沉默了。他斷然發出反抗喊聲來排拒那種「順世和樂之習」，提倡進取精神來擊退那種「膏蟻伏墮落而惡進取」的死氣，發揚進化思想來打破那種「無希望，無上征，無努力」、「不擾人心」反撲歸真的幻夢。（以上引語都見全集卷一，墳五九——六一頁。）摩羅詩力說便是這時候針砭時病喚起民心的一篇輝煌有力的作品，比起他在四年前爲浙江潮寫的斯巴達之魂是更雄烈更明朗地宣揚了他的戰鬥思想。這篇論文雖然主要的內容是介紹西方富有反抗精神的詩人，但作者的着眼點分明是借外國詩人的戰鬥事蹟和反叛思想來號召反抗與進取，打破向來麻痺人心樂天安分守己的奴才傳統。他贊美撒但（佛語謂之「摩羅」），就因爲撒但敢於反抗，敢於戰鬥。自然他所要頌揚的是「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爲世所不並愉悅」（摩羅詩力說）的地上撒但，是「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擊退可咒詛的時代」（華蓋集）的人間摩羅。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 英國詩人，原文譯作斐倫）、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英國詩人）、普式庚（Aleksandr Sergeyevich Pushkin 俄國詩人）、萊爾亡托夫（Mikhail Yurevich Lermontov 俄國詩人）、密開威支（Adam Mickiewicz 波蘭詩人）、斯洛伐支齊（J. Slowacki 波蘭詩人）、

克拉斯基 (S. Krassinski 波蘭詩人)、斐象飛 (Sandor Petöfi 匈牙利詩人)。這一流的詩人正是這種借借或摩羅的化身。魯迅的意思並非要中國文人個個都變成像拜倫一類的詩人，他是要中國人民特別是有推動民族進步之責的智識份子學習拜倫他們的精神。

魯迅生平最痛恨那種薄今尚古返璞歸真的開倒車思想，他在後來寫的一篇題名風波的小說中，就借九斤老太愛說「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的老套話，來諷刺流行的復古的老調。在摩羅詩力說中，這種反對復古的見解，已經鋒利地從他的思想劍鞘裏閃耀出了。

「故所謂古文明國者，悲涼之語耳，嘲諷之辭耳！中落之胃，故家荒矣，則喋喋語人，謂厥祖在時，其為智慧武怒者何似，嘗有闕字崇樓，珠王大馬，尊顯勝於凡人，有聞其言，孰不騰笑？夫國民發展，功雖有在於復古，然其懷也，思理朗然，如鑒明鏡，時時上征，時時返顧，時時有光明之長途，時時念群愷之舊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其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悅，則晝夜之始，即在斯時。」

(墳全集卷一，五八頁。)

他諷刺那班以「復古」為名而以「復古」為實的僵尸們是何等犀利，打擊不肯「時時上征」不顧「有光明之長途」的守舊者是何等有力。但他還不以反面的諷刺為滿足，他更用人羣的歷史進化真理指明初古社會並非如「隱逸」「復古」的人們所想像的那麼真樸可愛，那麼和平不爭，因此希圖遁世復古的思想顯然是違反歷史真理的：

「吾中國愛智之士，獨不與四方同，心神所注，遼遠在於唐、虞，或逕入初古，遊於人獸雜居之世；

謂其時萬物不作，人安其大，不如斯世之惡濁險危，無以生活。其說照之人類進化史實，事正背馳……故作此念者，爲無上征，爲無努力，……非自殺以從古人，將終其身更無可希冀經營，致人我于所儀之主的，束手浩歎，神實同墜焉而已。且更爲忖度其言，又將見古之思士，決不以華士爲可樂，如今人所張皇；惟自知良瀕無可爲，乃獨圖脫屣塵埃，倘恍古國，任人羣墮于蟲獸，而已身以隱逸終。思士如是，社會善之，咸辭之高蹈之人，而自云我蟲獸我蟲獸也。其不然者，乃立言辭，欲致人同歸于樸古。」（全集卷一，六〇頁。）

當時許多儒士正中了老子學說的毒，魯迅對於「不擾人心」、「無爲之治」的思想攻擊不遺餘力，因爲這種思想恰恰投合那批幻想逃避現實自命爲「高蹈」的「逸民」、「隱士」，恰恰足以消滅中國人民反抗的進取的精神。他指出不論有人如何想把社會拉回初古狀態，如何「自致樸木之心，立無爲之治；以無爲之爲化社會」，爭奈社會是不斷向前發展的，爭奈「星氣既凝（案即指星雲凝結爲世界），人類既出而後，無時無物，不稟殺機，進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摩羅詩力說。）從這裏可以看出，他所受進化論影響是何等深刻。

魯迅反對老子的「無爲而治」的學說，原意就在於打擊那種阻礙民族革命與人羣進化的反動思想。

「中國之治，理想在不擾，……有人擾人，或有人得擾者，爲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孫王千萬世，無有底止，故性解（案即「天才」的最初譯法）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擾我，或有能擾人者，爲民大禁。」（墳全集卷一，六一頁。）

這不明明是針對着反動的滿清王朝而擲的投槍麼？不是在猛烈攻擊滿清政府屠殺陸皓東、史堅如、譚嗣同之類的天才禁壓人民的思想自由麼？

魯迅出世後，外患相繼而來，其間重要的，有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戰爭。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一九〇〇年的八國聯軍攻入。魯迅認為外侮之來，和民族麻木不仁萎靡不振的民族性有關。正因為民族缺少抵抗精神，圖茸無能，怯懦苟安，所以外患也就特別來得多。這種解說，自然並不十分正確，但在當時他揭發了中國民族的重要病態，的確是有針砭時弊的意義的。

「……創痛少去，即復營營於治生，活身是圖，不恤汗下，外仇又至，摧敗繼之。故不爭之民，其遭遇戰事，常較好爭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蒼落傷亡，亦視強項敢死之民衆。」（全集卷一，六三頁。）

因此提倡抗爭精神在當時就成為十分必要。而要打破那種「活身是圖，不恤汗下」的苟安忍辱習氣，又必須喚起民衆的自覺。「自覺之發，每響於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響。」（同上書五八頁。）只有如此，民衆才可以把民族國家的命運看做自己的命運，才不是「愚民政策」下的順民奴才。結論自然是要爭取人民的思想自由。

魯迅號召反抗，立意在打脫人民大眾的枷鎖，粉碎一切阻礙進步的陳舊傳統，「舉一切偽飾陋習，悉與滌蕩」，因此他贊成澈底的破壞，而反抗不過是達成破壞目的的手段：

「世之嫉視破壞，加之惡名者，特見一偏而未得全體者爾。若爲按其真狀，則光明希望，實伏于中。惡物悉顛，于羣何毒？」（上引書卷一，八二頁。）

十年前魯迅的前輩譚嗣同也會吹響了「衝破網羅」的戰號，也會反對箝制民口禁錮民心的專制，但他並未主張對舊傳統作徹底的破壞，時代的推移使魯迅比他的先驅者更進一步踏上了思想革命的道路。他所引為遺憾的是，一般人因為「染舊既深，輒以習慣之目光，觀察一切，凡所然否，隱解為多，此所為呼維新既二十年，而新聲迄不起於中國也。」（上引書一〇〇頁。）他最後慨歎：「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是的，當時精神界之戰士是過於零落了，他不得不感到孤獨寂寞，不由不用悲憤的眼光來觀察當時的社會文化。

當時孫中山、章炳麟等所領導的民族革命運動已經震撼全國了。進步的青年都捲入在革命浪潮中。魯迅在發表上述論文的次年（一九〇八年），即「從太炎先生（章炳麟）學」，並且加入了光復會。（這是據許壽裳編的魯迅先生年譜所說。但周作人在宇宙風發表的關於魯迅之二否認魯迅曾為光復會會員）。魯迅從章太炎所受到的影響大約是很大的，看他後來寫的論華太炎先生之二三事，可以想見章多鼓吹革命不屈不撓的精神與人格感動他的確很深。魯迅那時候的政論思想，我們不能具體得知，但有一點是沒有疑問的，就是他已接受了民族主義和民主革命的思想，他贊成太炎先生「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鬥爭」（全集卷六，五四八頁），「時常出入民族社（按即章太炎所主辦），所與往來者多是同盟會的人。」（宇宙風：周作人：關於魯迅之二。）他在當時至少是已經成爲一個「思想界的革命戰士」——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精神界之戰士」了。

前面說過，魯迅常用翻譯來代表自己說話，從他當時和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所介紹的作品看來，他是主張反抗異族壓制頌揚民族主義的，因為選擇被壓迫民族（波蘭、波思尼亞、芬蘭、捷克、保加利亞等）的小說特別多，而俄國文學中凡有歌頌反抗者，都擇要選入。這和他在五六年前譯述斯巴達之魂是有相似的意義的。

辛亥革命前後魯迅的寫作很少，我們很難闡述他此時的思想；但間或也可以從他的著作鱗爪中，窺見他對舊社會的攻擊與諷刺是沒有停止過的。如一九一二年寫的懷舊（發表於小說月報），就可以看出他的辛辣的諷刺作風。這篇作品是不能僅僅看做一篇幼年時代的回憶錄的。

五四時代（這裏是把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反日鬥爭前後所進行的文化革命運動都歸入于五四時代）是中國政治、社會與文化、思想轉入大變革的時代。中國民族資本在世界大戰時期曾經一度呈現了繁榮，反映在社會、政治、思想各方面，就展開了要求變革要求鬥爭的民族自覺運動，具體地說，進步的智識份子在這時期所要求的，在政治上是實現民主主義，解除加於民族的外力束縛；在文化思想上，是要求打破「國故」、「禮教」、「倫常」、「迷信」的纏鎖，實行語文和文學的革命，政治上的民主運動和文化上的啟蒙運動匯合成為五四革命運動。實際上，不等到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毆打賣國賊趙家樓的悲壯劇揭幕，作為大革命前奏曲的第二次啟蒙運動就已經開始奔騰。一九一六年以後，提倡文學革命、擁護民主（德謨克拉西）科學（賽因斯）和反對國故禮教的春潮，已經由文化界的愈先鋒掀起來了。就在五四事件發生的前一年，沉默了一時的魯迅全副武裝地躍上了文化戰場，作了反封建鬥爭和新啟蒙運動的戰士。一九一八年四月間在新青年上出現了狂人日記，這不但是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也是中國思想革命運動史上不可磨滅的豐碑。

狂人日記最鋒銳地撲擊了舊社會的爛腐傳統和罪惡因襲。作者借一個「迫害狂」所見所聞的一切來暴露各種虛偽道德、名教禮法的罪惡。

「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

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

「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吶喊；狂人日記。）

中國是一個吃人的國度，「吃人的要被吃，被吃的又要吃人」，而追究造成這種吃人和被吃的慘劇的，就是「屠殺現在」的僵尸，一切虛偽道德和吃人禮教都伏在這僵尸身上。然而魯迅看清了吃人的現象是不能永遠存在的。他借着那個迫害狂的話來警告一切吃人者：「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狂人日記。）他對未來的光明一點不懷疑，他認為吃人的歷史總有一天要過去的，因此把未來的希望寄托在下代的以「救救孩子」的呼聲，就這樣作了狂人日記的結尾了。

辛亥革命雖然把滿清皇帝從王座上拉了下來，成立了「有民國之名無民國之實」（孫中山語）的共和國，但革命的火種並不會燒斷封建勢力的老根。反革命的僵尸們（代表封建社會階級的軍閥、官僚、政客，以及和他們結不解緣的買辦遺老）不僅利用政治軍事的阻力來擋住革命的車頭，使中國無法向近代化的道路駛進，同時還利用精神的鐐銜來桎梏人民的頭腦，要把中國拖回到最野蠻最黑暗的狀態去。他們竭力鞏固腐爛得發臭的國故，美其名曰「保存國粹」，那些愛着僵屍打奉的守舊士大夫，更從旁助威，做了國粹主義的鼓樂隊。到了五四前後，無拳無勇的進步智識份子既無法立刻顛覆僵屍的政治軍事壓力，實現德謨克拉西的政治理想，便不能以全力和僵屍們所築成的國故陣線鬥爭，去掃蕩一切朽腐野蠻的有毒傳統——禮教、舊道德和舊思想。這時候，魯迅不僅宣佈了封建社會的罪惡，預告了吃人的僵屍必然有一天要倒下去，並且對國故陣線一開始就作白

刃戰，鼓起了大眾掙脫精神鏽蝕的勇氣。他把那些防守國故陣線的活木乃伊稱做「現在的屠殺者」：

「明明是現代人，吸着現代的空氣，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言語，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熱風：全集卷二，七〇頁。）

僵屍們的維持朽腐的「國故」自然也有一套理論，他們說，我國有爲別國所無的「國粹」，這正是一種可以誇示於人的光榮，故必須永久保存。「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贊美的了不得」（熱風：懺感錄三十八），但魯迅駁得最痛快：

「什麼是「國粹？」照字面看來，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換一句話，便是特別的東西，但特別未必定好，何必應該保存。」

譬如一個人，臉上長了一個瘤，額上腫出一個瘡，的確是與衆不同，顯出他特別的樣子，可以算是他的「粹」。然而據我看來，還不如將這「粹」割去了，同別人一樣的好。

倘說，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但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歎氣。」（熱風：懺感錄三十五頁。）

還在十年前（一九〇七年）魯迅便喊出「國民精神之發揚，與世界識見之廣博有所屬。」（墳：摩羅詩力說）。然而國故派却要在中國和世界之間築起一道國粹主義的高牆，便是曾經高唱維新的人，有一部分，到了後來，也要「用學來的新，打出外來的新，關上大門，再來守舊。」（熱風：懺感錄四十八）。這許多國粹主義者說道：「我們要特別生長，不然，何以爲中國人？」（懺感錄三十六）。「於是乎要從「世界人」中擠出」。

依照國粹派的路線活下去，必定要害得「中國人失去了世界」，但另一方面，中國人「却暫時仍要在這世界上住！」（引書同上。）要生活在現世界，又要排拒現世界的進步力量，這就是國粹派所不能不造成的可悲矛盾。抓住了這個矛盾，魯迅不但對國粹派行了劈刺戰術，還指示了：中國人要合理地健全地生活下去，只有毫無憐惜地拋棄國內的腐爛屍骸，呼吸世界的新鮮空氣：

「……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總比中國陳舊的好。與其崇拜孔丘、關羽，還不如崇拜達爾文、易卜生；與其犧牲于瘟將軍、五道神，還不如犧牲于Apollo。」（上書隨感錄四十六。）

要攻破國故主義的堡壘，必須從各方面進行殲滅戰。一切腐舊倫常、虛偽道德、名教禮法、宗法制度與僵死文學，在這時期都成了新文化運動者聚殲的對象，魯迅在每一方面的作戰都表現了特別英勇的戰績。他不僅在論文、雜感、演講裏對國粹派作了頑強的鬥爭，便是在小說裏面，對國粹主義也作了深刻的諷刺，如肥皂、孔乙己、高老夫子等篇便是代表的例子。他撕破各種封建道德的假面，揭穿吃人禮教的黑幕，暴殄宗法社會的絞架，發碎僵死文學的骸骨。他不僅在消極方面諷刺暴露而已，在積極方面，更用進步的新道德觀去代替有毒的舊道德觀，用合理的生活方法去代替野蠻的習慣制度，用真摯的人情去代替虛偽的矯情，用生動的新文學去代替朽腐的舊文學（主要表现在創作上）。

他在一九一八年寫的我的節烈觀裏，首先對封建的野蠻道德和禮教作了犀利的抨擊。原來在民國成立不久之後，一班國老和遺老在那裏大鬧提倡節烈的把戲，在他們看來，婦女的「不節烈」害了國家，或者用魯迅一篇小說中的主人翁四銘的口氣來說：「擾亂天下的就是她們」（見榜樣：肥皂），只有表彰節烈，才可以挽救

世道人心。這套提倡節烈的荒謬理論，遭到了魯迅尖刻的諷刺：

「……女人死了丈夫，便守着，或死掉；遇了強暴，便死掉；將這類人物，稱讚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國便得救了。」（全集卷一，一〇五頁。）

提倡守節，表彰烈女，不過是爲的維持垂死的宗法社會軀殼，維持男性——特別是「閹老」「富翁」們作踐女性的吃人制度。在後來寫的一篇題名祝福的小說裏，魯迅是把舊社會殘酷地對待一個改嫁之後死了丈夫的寡婦——祥林嫂的慘劇，刻劃出來了，叫人讀了酸鼻。他是寄同情于被犧牲的女性，對野蠻的「表彰節烈」的惡習挑戰。他大聲喊出：「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已害人的昏迷和強暴。……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製造並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全集卷一，一一五頁。）這宣言不僅鼓起了婦女們爭生存平等的勇氣，更激發了一切進步羣衆反舊社會的義憤。

僵屍們不但要提倡節烈，叫女性們永久做男子的犧牲，而且要鞏固父權，叫青年人永久做老朽的殉葬物。倘使有人對這個發議論，便會得到「劇倫常」、「禽獸行」之類的惡名」。（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然而魯迅却鼓起了勇氣和那種「死人拖住活人，老人管住青年」（瞿秋白的話）的舊勢力鬥爭。他依據生物進化的理論認爲「後起的生命總比以前的更有意義，更近完全；因此也更具有價值，更可寶貴。」（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然而「中國的舊見解，又恰恰與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應在幼者，却反在長者；置重應在將來，却在過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犧牲，自己無力生存，却苛責後者又來專做他的犧牲。」（同上。）這就是僵屍們所要維持的「孝」道，孔子所說的「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豈不是明明要後代的人永遠不前進，永

遠「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轉，同他們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熱風：隨感錄二十五）這是如何荒謬，如何違背人類進化的原則。爲要打破這種把子孫當做犧牲的荒謬見解，魯迅主張前代的人應該讓後代的人「超越了自己，超越了過去。超越便須改變，所以子孫對於父祖的事應該改變。」（我們怎樣做父親。）「應將天性的愛，更加擴張，更加醇化；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於後起新人。」（同上。）尤其重要的是，上代的人應該「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孩子或青年）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同上。）魯迅不僅這樣勸告一切做父親者，他自己大半生就實行了這個原則，他是爲了青年的中國「一面清結舊帳，一面開闢新路。」（同上。）他的思想之所以能够不斷前進，站在時代的前哨，一個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他願意爲後代的人着想，爲民族的進步着想，和那些自己不肯前進還要拖住青年人做自己殉葬品的昏庸老朽對照起來，恰恰是代表了進步與反動，光明與黑暗的兩極端。

魯迅不但無情的攻擊了那「蔑視了真的人情」的「虛偽道德」，反對「一味收拾幼者弱者」提倡孝烈的惡風，並且他不斷在鼓勵「幼者」、「弱者」，爭取自己的幸福。在「與幼者」一篇雜感裏，他借了日本有島武郎的話勸告青年們：

「幼者呵！將又不幸又幸福的你們的父母的祝福，浸在胸中，上人生的旅途罷！前途很遠，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走罷！勇猛者！幼者呵！」（熱風隨感集六十三）。

懷着「對於一切幼者的愛」（同上），魯迅是不斷地指導和護衛青年，像一個負責的教師，又像一個熱情
的保姆。從辛亥革命前後一直到死，他對於青年所做的教養工作是繁重得驚人的。別人要青年人替老年人「背

着因襲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閘門」，而他却要自己把這種「重担」和「閘門」背着肩住，把青年人「放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對於婦女，魯迅所要求的是解除男女不平等社會所加於她們的束縛，而要達到這個目的，當然需要戰鬥，因為世上決沒有不經過弱者的戰鬥，強者會自動給弱者以幸福的事情。

五四時代，婦女要求參政權的聲浪已經很高了。魯迅倒並不提出這一類的口號，他只很簡勁地提出了兩個原則：「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和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墳：娜拉走後怎樣。）他接着又說：「可惜我不知道這權柄如何取得，單只知道仍然要戰鬥；或者也許比要求參政權更要用劇烈的戰鬥。」然而他一面主張戰鬥，一面也主張用「和平的方法」來達到解放的目的：「這就是將來利用親權來解放自己的子女」，這和他以前主張的上代人應該為後代人爭取幸福的見解是一貫的。他提出了婦女要求經濟權的主張，但他却明白指出了，這並不是最根本的解決辦法：

「在經濟方面得到了自由，就不是傀儡了麼？也還是傀儡。……因為現在的社會裏，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這決不是幾個女人取得經濟權所能救的。……如果經濟制度改革了，那上文當然完全是廢話。」（全集卷一，一四九頁。）

他深刻地洞燭了現社會的經濟制度，阻住了婦女澈底解放的道路。現社會的中心問題不是男女之間的彼此的對立，而是各個不同社會階級相互的矛盾，所以才會有「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的現象。唯有整個的社會經濟制度，合理地改變了，婦女才能够獲得完全的解放。因此他的

見解，跟那些僥倖地主張婦女反對男性壓迫，要求平等自由的理論，是大不相同的。

長期的封建統治掩藏着不長進的商業資本的糜爛氣息，造成了中國民族根深蒂固的遺傳病。對於這種民族病，魯迅很早就注意到了。據許壽裳的懷亡友魯迅說：「魯迅在弘文學院時（一九〇一——〇三年），常常談到三個相聯的問題：（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最缺乏的是什麼？（三）它的病根何在？」（魯迅紀念集第一輯第四頁。）自然，魯迅當初還不能運用新社會科學的觀點來找出民族的病理，但從他開始寫作以後，對於國民性的弱點或民族病會作了有力的暴露與打擊；特別在五卅時代，他的鷹隼般的眼力洞察了中國民族種種的劣根性，喚起國人為革除民族劣根性而鬥爭。一九二一年發表的傑作阿Q正傳實際上是一篇描寫民族病態的小說。阿Q不但是一個落後的農民典型人物，同時也是中國民族劣根性的象徵人物。阿Q到處表示自尊自大，誇耀祖上的闊氣，這種自負的口氣，不是和國粹派所慣說的「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之類的老調一樣嗎？阿Q用「兒子打老子」之類的自言自語，即所謂「精神勝利法」來安慰自己，這種自欺欺人的辦法，不是和舊士大夫們「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墳：論淨了眼看）之類的作風差不多麼？阿Q慣會「估量對手，口吶的便罵，氣力小的便打」，待到吃虧上當，便「改爲怒目而視」，或自稱蟲豸，這種欺弱畏強，自輕自賤的性格，不是和大人先生們「對於羊類凶獸相，而對於凶獸則顯半相」（華蓋集）或對於異族不稱禽獸，便稱聖上（熱風）的老脾氣相像嗎？（參看許壽裳：魯迅的生活。）在魯迅的筆底下，中國民族的老毛病是照樣得原形畢露了。然而凡真正熟悉「國情」的人，自然看得出這一類可惡而又可憐的民族病，實際上是應由衰朽腐敗的封建支配階級負責的。魯迅在五卅時代的作品，反映民族的兩極

化一端趨向於腐敗與墮落，另一端趨向於進步與革新）還不十分明顯，這是因為那時候，民族內部的政治分化還未十分成熟。當時屢次出現在魯迅雜感文中成爲諷刺對象的「中國人」，實際上主要的是指那些朽腐反動的僵屍們，自然僵屍的愚民政策給了人民大眾以長期的有毒的影響，使後者也分担了一部分「民族病」的惡果，是沒有疑問的。然而所謂民族病或國民性的劣點並非不可克服的。後來，魯迅對於國民性的問題作了極正確、樂觀的見解：「幸而誰也不敢十分決定地說：『國民性是決不會改變的。在這「不可知」中，雖可有破例的滅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復生的希望，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點慰藉吧。』（忽然想到。）往後的歷史不是確證實了魯迅的預見嗎？

五四運動雖然把中國的新文化新思潮推進了一步，在啓蒙運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光輝，但是新文化陣線不久就發生了分裂。一部分人漸漸鬆懈了對於國粹主義的抗戰，甚至對各種舊勢力（如舊文學、國故學、儒道等）表示姑息和妥協。另一部分人却再接再厲繼續作不妥協的鬥爭，把新文化運動推進到更高的階段。在這一時期，表現在中國思想戰場上的，有舊勢力的反攻，有過去新文化運動的投降，有有力戰不屈的新文化戰士的苦鬥，也有夾在新舊兩大陣線中的中庸主義者的奔走調停。這些現象反映着什麼呢？無疑的是反映中國各種社會利益的矛盾與分化。在此時期，由於戰後國際帝國主義對中國作加緊的榨取，來補償它們在大戰時期的損失，曾經繁榮過一時的民族資本主義至此又遭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大資產階級特別是買辦階層在國際資本主義的策動之下，勾結國內的殘餘封建勢力，對民族革新運動盡了極大的阻礙作用。而脆弱的民族資本集團，表現了一時的退縮。這樣就使反動的封建軍閥官僚政客以及和他們相結托的御用文人，對民主革命展開了全面反

攻。曾經代表民族資本的智識份子至此動搖的動搖，叛變的叛變。有些五四的健將在大開倒車。

魯迅曾描敘這種情景：「記得初提倡白話文的時候，是得到各方面的劇烈攻擊，後來白話漸漸通行了，勢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轉而引爲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運動」。又有些人便主張白話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話文要做得好，仍須看古書。前一類早已二次轉舵，又反過來嘲罵新文化了；後二類是不得已的調和派，只希圖多留幾天僵屍，到現在還不少。」（填：寫在墳後面。）對於這種文化的開倒車趨勢，魯迅是擊不遺餘刀。別人在恭維他的白話文寫得好，全得力於古文，他却感慨地說：「這實在使我打了一個寒噤，自己却苦于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後來有人勸青年讀莊子，選，魯迅也猛烈反對。他不光是爲了青年的利益着想，也是爲了語文改革運動的前途着想。

文化界開倒車的現象，還不僅表現在五四健將的妥協投降上，不僅表現在語文範圍內，當時所有復古派衛道派都在乘機起來。「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這道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一九二五年魯迅給兩週的信。）爲回答這種濃厚透頂的「反改革」空氣，魯迅再度喊出了「思想革命」的口號。他以爲此時再來喊「思想革命」，固然「未免可悲」，但除此而外，沒有別法：

「不革新，是生存也爲難的，而況保古。——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都踏倒他。」（華蓋集。）

事實上，他在此時已經把思想革命與政治革命的任務聯繫起來了。他猛烈攻擊那些詆毀革命的調音（如

「講革命是爲的圖利」，「過激派共產公妻」之類的謬說在他的雜感文裏都遭到了鋒利的諷刺），反對「修補老例」（見墳：再論雷峯塔的倒塌及華蓋集：記談話）的傳統，對於改革或革命則熱烈地加以鼓勵和頌揚。這就是他對於復古運動的回擊。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對於根深蒂固的舊文明，施行襲擊。」（兩地書。）

從一九二四年以後，國內民主革命與反革命的對壘是日益明顯了。反映在文化思想界，也展開了火烈的鬥爭。在反革命營壘，不僅擠滿了復古的封建餘孽，張起了國粹主義的古老旗幟，並且收容了「歐化」的官場學者，掛起了東方文明的金字招牌。拿民命來賭博的軍閥現在是有了各色各樣的賭具：新的、舊的、國貨的、舶來的，真是五光十色，紛然雜陳。在這時期，革命的小資產階級（進步的文化人）對於反動勢力的進攻，是用堅決的攻勢防禦戰來回答，語絲以及後來的莽原就成了當時進步智識份子打擊「官場學者」、「御用文人」和他們的主子的重要堡壘。不用說，在主將魯迅的領導之下，「語絲派」和受它影響的戰鬥羣衆是爭取了主動的地位。魯迅當時對準了「幫助軍閥的文人學士」（野草英文譯本序，二心集），「舉起投槍」，和他們作「報」的戰鬥。

「要有這樣的一種戰士！」

他走進無物之陣……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繡出各樣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原有虛點）頭上有各樣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原有虛點）

但他舉起了槍。」（野草：這樣的戰士。）

魯迅最痛恨的，就是那些「比牠主人更嚴厲的狗」，「媚態的貓」，「未叮人之前還要呼哧地發一篇大議論的蚊子」（華蓋集：夏三蟲），以及「頸子上掛着一個小鈴鐺的山羊」。（華蓋集：一點小比喻）。這些東西雖然掛起各色各樣好看的徽章，實際上是「無物之物」。（這樣的戰士。）但正因爲他們戴着學者、文人、雅士、君子、慈善家之類的假面，穿起道德、學問、國粹、民意、公理、東方文明之類的外套，對革新運動的進攻，比他們的主子還要來得兇狠，所以魯迅決不寬容他們，放過他們。「偏要在莊嚴高尚的假面上撥牠一撥。」（華蓋集續編小引。）拮擊反動統治的戲班子，——「做戲的虛無黨」（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實際上其是攻打反動統治的本身。

在和現代評論派作鬥爭的時候，魯迅很明顯的是站在人民革命的聯合陣線，這時期他的政治思想的鋒刃磨鍊得比以前更銳利，更雲亮，他要拆除那「由舊有的古磚和添補的新磚構成的長城」（華蓋集：長城），對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表示了強烈的痛憤。當五卅事件起來的時候，許多人在那裏「辯誣」，洗刷「赤化」「暴徒」的罪名，他却沈痛地提出抗議：「我不解爲什麼中國人如果真使中國赤化，真在中國發動，就得聽英捕來處死刑？」（華蓋集：忽然想到之十。）他告訴大眾要辨清誰是真的敵人，誰是真的友人，並舉出了蕭伯納、巴比塞等做同情中國的代表，來說明反帝與排外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他更鼓勵青年「……共同抗拒，改革，奮鬥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同上。）「設法增長國民的實力，永遠這樣的幹下去」（同上）。後來「詩哲」徐志摩在羅曼羅蘭的誕辰寫紀念文，說「……如有其人拿一些時新的口號，什麼打倒帝國主義等等去報告羅蘭先生，說這是新中國，我再也不能預料他的感想了。」（晨報副刊一二九九號。）魯迅駁道：

「羅蘭先生的意思，是以爲新中國應該歡迎帝國主義的麼？」（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從他的纏感裏裏，噴出了反帝國主義的猛烈火燄。

北京的反動政府當時已成了壓迫人民抗拒革命的血腥營壘，什麼「整頓學風」，「剿辦學匪」，「格殺暴徒」之類的戲法是層出不窮了。魯迅見了黑暗勢力的繼續增大和革命勢力的繼續興起，他曾寫信給景宋說：「由我想來，目下的壓迫和黑暗還要增加，但因此也許可以發生較激烈的反抗與不平的新份子，爲將來的新的變動的萌芽。」（兩地書。）就在一年以後，三一八血案在文化城發生了，作了「新的變動的萌芽。」（中華民國十五年（原作十六年，恐係誤排或誤書）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用步槍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二。）魯迅稱這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稱這次虐殺爲「誘殺」（全書：空談。）然而他決不止於悲憤一下就了事，他由此更加堅定了如下的革命信念：「世上如果還有要活下去的人們，就應該……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華蓋集：忽然想到之五。）當時除了人民起來實行「激烈的反抗」外，還有什麼別的道路可走呢？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大出於屠殺者意料之外。——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說談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二。）

這一段預言不久就由「血寫的事實」證實了。三一八慘案發生不久之後，「出乎屠殺者意料之外」的大革命降臨中國了。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使中國思想界添了新的活氣。革命開始搖動了一切，主宰了一切。魯迅所期望的「叛逆的猛士」（野草：淡淡的血痕中），「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的真的猛士」（華蓋集續編：紀念劉和珍君）已經大批地出現，轉戰於全國了。一九二七年來到了廣州之後的魯迅，對於革命表示了極大的欣慰。他謳歌革命道：「其實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因為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凡是至今還未滅亡的民族，還都天天在努力革命。」他相信：「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花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以上二段均見而已集黃花節的雜感。）他認為：「革命無止境，所謂『革命成功』是指暫時的事而言；其實『革命尚未成功』的。」（同上。）「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鬥爭，非先行變換現代社會底狀態不可。」（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這種對於革命的見解豈是一般機會主義的「革命理論家」所說得出的？

第三節 魯迅晚年的思想

大革命暴風雨的息止，並沒有中斷中國人民爭取解放的戰鬥。資產階級對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高豎白旗的結果，使革命與反革命兩大營壘之間發生慘酷的內戰，一方面是大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依靠國際資本寡頭的援助，竭力維持附庸國與半殖民地的舊社會秩序，對新階段的革命施展血的鎮壓，另一方面是工農大眾和革命小資產階級堅持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革命，其目的在顛覆舊社會秩序，把中國民族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奴隸

狀態中解放出來；壁壘是非常森嚴的，鑿戰是非常劇烈的。從革命轉入新階段以後，在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幾個最尖銳的問題：第一是中國革命運動的性質和任務如何？第二是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如何？第三是那一個階級是中國革命運動的領導者？第四是怎樣爭取中國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

偉大的民主主義戰士魯迅用作品和行動切實回答了這些問題。他最熱情地為繼續執行反封建、反帝的神聖任務而戰，最英勇地對一切壓迫民主革命摧殘人民自由的奴役制度猛擲投槍。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大革命雖然接二連三失敗了，但是，魯迅仍然堅決相信，中國人民大衆一定能夠戰勝自己敵人，奔赴革命的勝利前途。他比以前更加明確認識了階級矛盾乃是革命的核心問題。先前他從進化論出發，認為青年人總比老年人好；因此對青年人寄與熱烈的希望，主張讓後代的人超越老人；從民主主義的角度看來，這不失為比較進步的看法。因為事實上，青年是推動中國進步的生力軍，是反抗舊社會腐敗傳統的革命成分；當腐敗的反動集團在用誣蔑、欺騙和迫害對付青年的時候，魯迅挺身而出為青年辯護和鏖戰，這正是對凶暴卑劣的守舊勢力最嚴重的打擊，同時也是對光明革新勢力最有力的護持。但是，隨着革命的發展和階級分化的劇烈，他從血的教訓中，深刻領悟了，革命與反革命的營壘之劃分，本質上應當從階級關係的分析出發，他曾沉痛地配述這個教訓道：

「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緣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年人，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我在廣東就目覩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

大陣營，或者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三閑集序言。）

「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爲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爲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以比較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已集。）

自然，魯迅並沒有對青年絕望，他至死沒有停止幫助和指導青年的活動，他始終在「爲初上陣的青年們吶喊。」（三閒集。）然而，他的思想和工作是日益深入於被壓迫的勞苦大眾中，他敏銳地看清了，在歷史的戰場上誰是腐敗的沒落的角色，誰是有希望的進步的力量。他曾坦白地自敘自己思想的發展：

「只是原先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地牠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爲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二心集序言。）

假如說，魯迅的戰鬥工作最初是以暴露剝削階級的罪惡與腐敗爲主，是同情和贊助一般的革新力量，是作爲一個堅決的民主主義者號召羣衆對舊社會的反抗，那末，在大革命以後，他的思想和戰績就與最進步的生產階級的戰鬥活動聯繫得不可分開，他熱烈地同情和贊助勞工集團所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和社會解放鬥爭，作爲一個社會主義者而活躍在艱困的革命事業中。從此，他不僅憑藉那枝潑刺的光輝的筆表達革命大眾的戰鬥，而且參加到爭自由、爭解放的正義戰鬥中，和勞動大眾一同呼息，一同行進。他先後組織自由運動大同盟，參加人權保障大同盟，爲的是要反抗摧殘人民自由的暴虐勢力，保衛力爭光明的前衛戰線。緊張而艱險的實踐使他更加深刻地認識中國革命的遠景，更加英勇地傾注歌頌勞動集團進軍的熱情。青年並沒有使他失望，雖然有不少墮落青年在他眼面前沉淪變節，變成爲時代的污渣，但是大多數青年仍然在爭自由的戰場上喋血苦鬥。他的

追求真理保衛正義的精神和他的愛護青年英雄後進的熱忱結合起來，贊助了廣大前進青年的革命勇氣，增厚了左翼陣線的作戰實力。他憑藉組織力量反抗黑暗的現實，說明了他已由孤軍轉戰跨入集團戰鬥，同時說明了他對中國勞動大眾的革命前途表示樂觀的信心。

自然，魯迅並沒有放棄自己原有的戰鬥崗位，他終身努力從事的，是為人生為社會的文藝工作，他深信在革命退潮時期，文藝可以成為武裝大眾打擊敵人的鋒銳武器。他說：

「當從廣東開始北伐的時候，一般積極的青年都跑到實際工作去了，那時還沒有什麼顯著的革命文學運動。到了政治環境突然改變，革命遭了挫折，階級的分化非常顯明，……所剩的青年們再入於被壓迫的境遇，於是革命文學在上海這樣有了強烈的活動。所以這革命文學的旺盛起來，在表面上和別國不同，並非由於革命的高揚，而是因為革命的挫折。」（二心集。）

革命文學運動的蓬勃，是由于革命遭受挫折，許多被壓迫的前進智識份子把精力轉移到革命文化運動中來，而文藝運動正是整個革命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支流，當時上海乃是革命文化運動的心臟。魯迅挺身而出領導左翼作家聯盟，運用他的筆尖和喉舌教育廣大青年，同時也讓羣衆教育了他自己。假如說，在和創造社等論爭的時期，他主要是對左翼文化界諍友的責任，反對革命文學運動中的浪漫主義偏向，那麼，到了左翼作家聯盟時期，他就是正式站在主將的九位，領導革命的文藝運動以至整個的革命文化運動。但是革命的文化運動並非一帆風順的，它不斷遭受壓迫和打擊。魯迅領導全國的革命文化工作者對抗文化的「圍剿」。他向左翼文化陣線提出了嚴重警告，為的是要整飭革命文化隊伍，加強工農大眾的精神作戰力量。

「因此革命的文學者，就不但應當留心迎面的敵人，還必須防備自己一面的三翻四覆的暗探了。」（二）
心集。）

但他同時反對「非革命的革命急進論。」戒備敵人破壞革命文化營壘，固然是萬分必要的，然而必須清楚認識，「在帝國主義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訓練大衆個個有了「人類之愛」然後拱手變爲「大同世界」一樣，在革命者們所反抗的勢力之下，也決不容用言論或行動，使大多數統得正確的意識。所以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戰士大概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終極目的是極爲歧易的。或者爲社會，或者爲小集團，或者爲一個愛人，或者爲自己，或者簡直爲了自殺。然而革命軍仍然能夠前進。因爲在進軍的途中，對於敵人，個人主義所發的子彈，和集團主義所發的子彈一樣地能夠制其死命；任何戰士死傷之際，便要減少些軍中的戰鬥力，也是兩者相等的。但自然，因爲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于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爲純粹的精銳了。」（二）心集：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他並不像某些執拗的空想家一樣，以爲一定要先把革命隊伍鍛鍊得百分之百純粹，然後才可以進軍，才可以作戰。他極正確地認識到，革命隊伍，要發展自己，爭取革命勝利，就必須一面對外打擊黑暗主力，一面對內克服自身弱點。他說過：

「自從有了左翼文壇以來，理論家曾經犯過錯誤，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蘇汶先生所說，有「左而不作」的，並且還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爲民族主義文學的小卒，書坊的老板，敵黨的探子的，然而這些討厭了左翼文壇的文學家所遺下的文壇，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還在發展，克服自己的壞處，向文藝這神聖之

地進軍。蘇汶先生問過：克服了三年，還沒有克服好麼？回答是：是的，還要克服下去的，三十年也說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進軍着，不會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後行進那樣的傻事的。」（南腔北調集；論第三種人。）

從這種清晰的戰鬥現實主義出發，魯迅告誡一般左翼文化人千萬不要沾染浪漫蒂克的革命空想，而要切實地在戰鬥實踐中嚴肅工作，洗鍊自己。他不只是和「非革命的革命急進論者」鬥爭，同時也對一切同路人的頹廢傾向與形式主義迎戰。

在魯迅的哺養之下，左翼文化運動一天一天壯大起來了。革命文化浪潮的湧流，反映着整個工農大眾的革命戰鬥的脈搏。正因為如此，「黑暗的主力」就對進步的文化運動日益加緊殘酷的迫害。魯迅並不計較他個人的安危，可是他異常痛心文化戰士的受難，他有時甚至用一種傷感的心情表示他的強烈的抗議。在柔石等十多位文化戰士被難以後，他寫下了下面一首洋溢着悲憤的律詩：

「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髮有絲。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繡衣。」

接着他悲涼而又憤激地寫下了他的紀念辭：

「不是年青的爲年老的寫紀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擊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

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却，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

再說他們的時候的……」——南聲北調集：「爲了忘却的紀念。」

但是，魯迅不甘以悲憤來結束他的復仇鬥爭，他號召青年戰士用堅韌的戰鬥精神來衝出黑暗的重圍。力爭光明的未來。他堅信着未來是屬於進步的勢力的，因此對革命前途始終抱着樂觀，一九三一年他在寫給韋素園的信內這樣說：

「中國的做人雖然很難，我的敵人（鬼鬼祟祟的）也太多，但我若存在一日，總當爲文藝盡力，試看新的文藝和在壓制者保護之下的狗屁文藝，誰先成爲烟埃。……無論如何，將來總歸是我們。」（李霽野：《憶魯迅先主》。）

帶着鐵一般的確信，魯迅比誰都堅決地指示革命的勞苦大眾及其文化運動在任何橫暴之下，是可以發聲滋長的：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發生，在涇嶺和壓迫之中滋長，終於在最黑暗里，用我們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

我們的勞苦大眾歷來只被最劇烈的壓迫和榨取，連識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滅亡。繁雜的象形文字，又使他們不能有自修的機會。智識的青年們意識到自己的前驅的使命，便首先發出戰叫。這戰叫和勞苦大眾自己的反叛的叫聲一樣使治者羣恐怖，走狗的文人即羣起進攻，或者製造謠言，或者親作偵探。

然而我們的這幾個同志已被暗殺了，這自然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若干的損失，我們的很大的悲痛。

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卻仍然滋長，因為這是屬於革命的廣大勞苦羣衆的；大衆存在一日，壯大一日，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也就滋長一日。我們的同志的血，已經證明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革命的勞苦大衆是在受一樣的壓迫，一樣的殘殺，作一樣的戰鬥，有一樣的運命，是革命的勞苦大衆的文學。」（二心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是的，革命文學，不，整個革命文化運動和勞苦大衆的命運是一脈相連的，勞苦大衆「剿滅」不了，革命文化也就消滅不了。革命文化的滋長，不但證明了「大衆的壯大」，而且證明了「惟有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革命前驅的戰鬥和勞苦大衆的抗爭結合起來，使黑暗的主宰者不得不祭養與驅使「走狗的文人」追逐革命文化運動的戰士，以濟恐怖手段之窮。他們特別起勁地對魯迅狂吠，爲的是「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與媚骨。」（毛潤之語。）他不顧昧着良心幫助那些「對弱者革命」（魯迅語）的屠伯說話，相反地，他對這血腥的一羣大殺其「回馬槍。」正因爲如此，黑暗陣營就集中火力攻擊他，對他表示徹骨的憤恨。奴婢式的文人譏笑他對革命文學「投降」了，稱他爲「文壇貳臣」，這明明反映一般壓制者由衷的遺憾。因爲假如魯迅願意效忠他們，對革命文學採取敵視的態度，他的那枝諷刺的筆是打擊革命文化多麼有力的步器。濃霧般的階級利害翳障了他們充血的眼睛，使他們低能到看不清偉大的中華民族也存在着實愛真理的正氣。（記得魯迅曾經很憤慨地論及滿清政府刪改漢族書籍，說他的目的是要使天下讀書人永遠不會覺到在中國的著書人裏面，也會經有過極有骨氣的人（大意如此），這話其實是借古諷今。）他們根本不懂，真理之筆和正義之劍是不可分開的。和魯迅同時代的文人學者不是有許多投奔在軍閥官僚的幕下用軟刀來幫助劊子手對「弱者實行革

命」的嗎？然而當他們一經淪為黑暗營壘的獵狗，他們的文章和理論就變成「人皆掩鼻而過之」的狗屎了。當魯迅和創造社筆戰的時候，一切「幫忙」與「幫閒」的「文壇英雄」連同他們的主子看得陶醉了，他們抱着可憐的幸災樂禍想頭，希望魯迅掄起板斧，砍倒革命文學，加入他們的「幫忙隊」，也希望論戰的雙方殺得兩敗俱傷。然而出乎他們的意外的，魯迅對那些傾向於工農革命而又帶有浪漫蒂克味道的文士盡了諍友的責任之後，他的回馬槍是對準黑暗的主力猛擄過去了，他正式參加了勞苦大眾的解放隊伍。乘興而來的看客，一下子變成了敗興而散的鬼魅，于是一切卑劣的造謠誣蔑就成了屠刀鞭棒的補充，魯迅的名字被他們列入了文壇貳臣傳。其實魯迅以舊社會秩序的「反抗者」的姿態出現，並不是從他參加左翼革命運動開始。魯迅很早就說過：

「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填：「寫在填的後面。」）

是的，從清末一直到死，魯迅無時不在對舊社會大殺「回馬槍。」被主子牽住了籠頭的無恥文人最初用着蠅之心度戰士之腹，以為魯迅是革命文學的大敵，待到魯迅一躍而為革命文學的主將，便用「精神勝利法」給他戴上「貳臣」的荊冠。他們忘記了在魯迅馳騁於左翼文壇之前，他的那枝投槍似的筆便濺滿了他們同類的血。

但卑劣文人及其主子們之所以特別痛恨魯迅，主要是由於魯迅用他的武器和韜略加強了革命戰線，喚起了廣大被壓迫羣衆的覺醒；他們認為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危險，這危險不消滅，就不能壓服握緊拳頭進行反抗的奴隸，就不能穩定他們的吃人的庖廚。

魯迅領導一大羣戰士跟「圍剿」新文化的敵人戰鬥，他的武器比以前愈加鋒利了，戰法比以前愈加老練了，

他善于攻擊對手的弱點，同時又善于在戰鬥中教育羣衆。

和魯迅領導的左翼文學陣線交鋒的，主要的是新月派，民族主義文學者，「第三種人」等。這些論爭實際上不是單純的文學派別的爭鬥，而是大革命以後國內各種社會勢力——基本上是資產階級、地主，紳士一羣和勞動大衆與革命智識份子之間的衝突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

新月派和先前的現代評論派本來是有血統關係的，是歷來反對民衆革命的買辦階級與溫和資產階級的文藝集團，他們自命爲維持現狀的「正人君子」的代表，充任着歌頌帝國主義文明的「高等華人」的歌手。當勞苦大衆的戰叫通過前進智識份子的筆尖和喉舌，衝破黑夜的沉寂時，新月派的「正人君子」便發出了輕蔑的噓噓之聲，他們在紳士文壇的四周佈置了防範粗野大衆文藝的警戒線，但常常也越過這警戒線向勞苦大衆的文化思想陣線衝鋒。魯迅對這些「正人君子」作了勇猛的迎擊。他剷除了新月派的偽善的外套，說道：

「新月社中的批評家，是很憎惡嘲罵的，但只嘲罵一種人，是做嘲罵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評家，是很不以不滿意於現狀的人爲然的，但只不滿於一種現狀，是現在竟有不滿意於現狀者。

這大約就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揮淚以維持治安的意思。

譬如，殺人，是不行的。但殺掉「殺人犯」的人，雖則同是殺人，又誰能說他錯？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爺要打鬥犯人的屁股時，皂隸來一五一十的打，難道也算犯罪麼？新月派批評家雖然也有嘲罵，也有不滿，而獨能超然於嘲罵和不滿的罪惡之外者，我以爲就是這一個道理。

但老例：劊子手和皂隸既然做了這樣維持治安的任務，在社會上自然要得到幾分的敬畏，甚至於還不

妨隨意說幾句話，在小百姓面前顯顯威風，只要不大妨害治安，長官向來也就裝作不知道了。

現在新月的批評家這樣盡力地維持了治安，所要的却不是「思想自由」，想想而已，決不實現的思想，而不料遇到了別一種維持治安法，竟連想也不准想了。從此以後，恐怕要不滿於兩種現狀了罷。」

新月派提倡「好政府主義」，實際不過是胡適等的好政府說的老調重彈。他們企圖在維持現狀之下對政治作一點一滴的自上而下的改良，但絕不能讓革命的浪花濺着了「高等華人」的政壇，正如不能讓革命文學的火舌紙着了「正人君子」的文壇一樣。梁實秋說：

「現在有知識的人（尤其是風來有「前驅者」，「權威」，「先進」的徽號的人），他們的責任不僅是冷譏熱嘲地發表一點「不滿意現狀」的雜感而已，他們應該更進一步的誠誠懇懇地追求一個積極醫治「現狀」的藥方。」（『心集』：「好政府主義」。）

梁實秋接着就宣傳他的「好政府主義」，魯迅很銳利地刺了他一下。

「不過我以為梁先生所謙遜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義」，却還得更謙遜地放在例外的，因為自三民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無論他性質的寒溫如何，所開的究竟還是藥名，如石膏、肉桂之類，——至於服後的利弊，那是另一個問題。獨有「好政府主義」這一副藥，他在藥方上所開的卻不是藥名，而是「好藥料」三個大字，以及一些嘮嘮叨叨的一些名醫架子的「主張」。不錯，誰也不能說醫病應該用壞藥的，但這張藥方，是不必醫生親配搗頭，誰也會將他「褒貶得一文不值」（「褒」是「稱讚」之意，用在這里，不但「不通」，也證明了不識「褒」字，但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舊）的。

倘這醫生羞惱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藥料主義，就開出你的藥方來！」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現狀」之一，即使並不根據什麼主義，也會生出雜感來的。感慨之無窮無盡，正因為這樣的「現狀」太多的緣故。」（同上書。）

在這裏，魯迅充分表現了他是一個代表勞動大眾的卓越政論家，短短的幾百字的論評，把民族改良主義的貧血而浮腫的尊容浮腫似的刻畫出來了。

新月派所謳歌的，是少數人圈子裏的典雅和天才，他們鄙視大眾，戒備大眾的粗手粗腳弄翻「正人君子」高談闊論的殿堂，但是魯迅偏要在他們的紙糊的殿堂面前戳一個老大窟窿：

「梁實秋先生們雖然很討厭多數，但多數的力量是偉大，要緊的，有志於改革者倘不深知民衆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干，備止于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款賞，得些自己滿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們拉回舊道路上去。」（同上書。）

魯迅的筆鋒使新月派露出了惱羞成怒的窘態，他們唯有求助於造謠誣蔑的鬼魅伎倆，一面用以遮羞，一面用以迎敵。但他們造謠的本領也實在不高明，不過是在背誦着祖傳的家法，例如「領虛布津貼」就是梁實秋等從造謠百科全書抄出來，用以誣栽進步文化人的罵人老公式。這不能擊傷魯迅及其職友的毫末，是顯而易見的。魯迅是善於畫鬼臉的，但也工於畫狗臉，試看他的工筆：

「這正是「資本家的走狗」的活寫真。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他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牠的主子，正是他遇見所有闊人

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餵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關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牠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同上書。）

新月派代表着「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自從資產階級和地主集團抱頭痛哭表示「和衷共濟」以後，封建營壘的人物在政治上高視闊步，使傾向於歐美化（實際是殖民地化）的改良派資產階級也不「滿於現狀」起來，他們談人權，講約法，甚至於發一點「憂國」的牢騷，然而這不過是魯迅所說的焦大罵賈府的悲喜劇演出；大觀園的焦大被塞了一口的馬糞，上海灘的新月也終於遭到了意外的「壓迫」（受停刊處分），魯迅以諷刺語氣論及這事說道：

「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論」遭了壓迫，照老辦法，是必須對於壓迫者，也加以壓迫的，但新月上所顯現的反應，却是一篇告壓迫言論自由者，先引對方的黨義，次引外國的法律，終引東西史例，以見凡壓迫自由者，往往臻於滅亡：是一番替對方設想的警告。

所以，新月社的「嚴正態度」，「以眼還眼」法，歸根結蒂，是專施之力量相類，或力量較小的人，倘給有力者打腫了眼，就要破例，只舉手掩住自己的臉，叫一股「小心你自己的眼睛。」」（同上書。）
新月派的遭受「壓迫」，就可證明民族改良主義的前途的悲哀。魯迅曾經說過：

「滿洲人自己，就嚴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却稱「臣」就好。這並非因為「黃之曾」特地優待，錫以嘉名的，其實所以別於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於「奴才」數等。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說：主子，你這袍角有

些兒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爛，還是補一補好。進言者方自以為在盡忠，而其實却犯了罪，因為另有准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倘自以為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胡塗。」（同上書。）

這段借古諷今的文字雖然是後來針對着第三種人寫的，但很可以說明當時新月派大吃「馬糞」的原由。尋的，當時「進言者方自以為在盡忠，而其實却犯了罪，因為另有准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自然，歷史告訴我們，新月派的「正人君子」後來漸漸高昇起來了，他們已取得了「言議」的資格了，但這是後話。）正在此時，出現了民族主義的文學。所謂民族主義文豪們雖還沒有直接言議之權，但他們究竟是「圍剿」革命文化的合法的「文裝同志」，與搗毀書店，綁走作家的「武裝同志」一樣，是奉旨「發揚民族精神」，「保衛本位文化」的。他們撐起了打倒無產階級文學的民族主義文學大纛。這股法倒也乾淨，和新月派躲躲閃閃嘲罵無產階級文學的態度不大相同。魯迅用的的是反掃蕩戰術，他的刀口劈在民族主義文學的天靈蓋上。他揭露了民族主義文學的原形，所謂「民族主義」文學不過是效忠帝國主義反對人民反帝運動的殖民地獄吏的文學：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從帝國主義的眼睛看來，惟有他們是最要緊的奴才，有用的鷹犬，能盡殖民地人民非盡不可的義務；一面靠着帝國主義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羣之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寵兒；——不，寵犬，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治者之上的。」

上海雖然也不會不在這例子裏。巡警不進幫，小販雖自有小資本，但倘不另尋一個流氓來做債主，付

以重利，就很難立足。在文藝界上，竟也出現了「拜老頭」的文學家。

但這不過是一個最露骨的事實。其實是，即使並非幫友，他們所謂「文藝家」的許多人，是一向在盡「寵犬」的職分的，雖然所標的口號，種種不同，藝術至上主義呀，國粹主義呀，民族主義呀，爲人類的藝術呀，但這僅如巡警手裏拿着前膛槍或後膛槍，來福槍，毛瑟槍的不同，那終極的目的却只一個：就是打死反帝國主義的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寵犬派文學之中，鑼鼓敲得最起勁的，是所謂「民族主義文學」。但比起偵探，巡捕，劊子手們的顯著的勤勞來，却還有很多的遜色。這緣故，就因爲他們還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沒有流氓的剽悍，不過是飄飄蕩蕩的流氓。然而這又是「民族文學」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寵」的。

翻一本他們的刊物來看吧，先前標榜過各種主義的各種人，居然湊合在一起了。這是「民族主義」的巨人的手，將他們抓過來的麼？並不，這些原是上海灘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氓，本來散見於各處的，但經風浪一吹，就漂集一處，形成一個堆積，又因爲各個本身的腐爛，就發出較濃厚的惡臭來了。

這「叫」和「惡臭」有能够較爲遠聞的特色，於帝國主義是有益的，這叫做「爲王前驅」，所以流氓文學仍將與流氓政治同在。

但上文所說的風浪是什麼呢？這是因無產階級的勃興而捲起的小風浪。先前的有些所謂文藝家，本未嘗沒有半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覺得自身的潰敗，於是於自欺欺人的用種種美名來掩飾，曰高逸，曰放達（用新式話來說就是「頹廢」）；畫的是裸女、靜物、死、寫的花月、叢地、失眠、酒、女人。一到舊社會的

崩潰愈加分明，階級的鬥爭愈加鋒利的時候，他們也就看見了自己的死敵，將創造新的文化，一掃舊來的污穢的無產階級，並且覺到了自己就是污穢，將與在上的統治者同其運命，於是就必然漂集於為帝國主義所制的民族中的順民所豎起的「民族主義文學」的旗幟之下。」（二心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魯迅極明快地暴露了所謂民族主義文學的本質。他還生動地從民族主義文學作品中舉了兩個例證，證明所謂民族主義文學是如何傳播帝國主義意識，宣揚民族奴隸主義，第一個例子是：

「在前鋒月刊第五號上，却給了我們一篇明白的作品，據編輯者說，這是「參加討伐閩馮軍事的實際描寫」。描寫軍事的小說並不足奇，奇特的是這位「青年軍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戰場上的心緒，這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的自畫像，極有鄭重引用的價值的。

「每天晚上站在那閃爍的羣星之下，手裏執着馬槍，耳中聽着蟲鳴。四週飛動着無數的蚊子，那樣都使人想到法國「客軍」在非洲沙漠裏與阿刺伯人爭鬥流血的生活。」（黃震遐嘯海錄上。）

原來中國軍閥的混戰，從「青年軍人」與「民族主義文學者」看來，並非如同國民互相殘殺，却是外國人在打別一外國人，兩個國度，兩個民族，在戰地上一到夜裏，自己就覺得皮色變白，鼻樑加高，成為拉丁民族的戰士，站在野蠻的非洲了。那就無怪乎看得周圍的老百姓都是敵人，要一個一個的打死。法國人對於非洲的阿刺伯人，就民族主義而論，原是不必憐惜的。僅僅這一節，大一點，則就明了中國軍閥為什麼做了帝國主義的爪牙，來毒害屠殺中國的人民，那是因為他們自己以為是「法國的客軍」的緣故；小一點，就說明中國的「民族主義文學家」基本上只同外國主子休戚相關，為什麼倒稱「民族主義」，

來譏混讀者，那是因為他們自己覺得有時好像拉了民族，條頓民族了的緣故。

第二個例子是：

作者……考據中外史傳之後，接着又寫了一篇較切「民族主義」這個題目的劇詩，這回不用法蘭西人了，是黃人之血。（前鋒月刊七號。）

這劇詩的事蹟，是黃色人種的西征；主將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元帥，真正的黃色種。所征的是歐洲，其實專在俄羅斯（俄羅斯）——這是作者的目標；聯軍的構成是漢，韃靼，女貞、契丹人——這是作者的計劃，一路勝下去，可惜後來四種人不知「友誼」的要緊和「團結力量」，自相殘殺，竟為白種武士所乘了——這是作者的諷喻，也是作者的悲哀。

但我們且看這黃色軍的威猛和惡毒罷——

恐怖呀，煎着屍體的沸油；

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凶惡；

死神捉着白姑娘拼命地撲；

美人螻首變成莽猛的犛體；

野蠻般的生番在故宮裏鬩爭惡鬥；

千年的棺材洩出牠凶穢的惡臭；

十字軍戰士的臉上充滿了哀愁；

鐵蹄踐着斷骨，駱駝的鳴聲變成怒吼；

上帝已逃，魔鬼揚起了火鞭復仇；

黃禍來了，黃禍來了！

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

這德皇威廉因為要鼓吹「德國」，高於一切而叫的「黃禍」，這一張「亞細亞勇士們張大」的模範——這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目標；但究竟因為是殖民地順民的「民族主義文學」，所以我們的詩人所奉為首領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華人趙構，張開「喫人的血口」的是「亞細亞勇士們」，不是中國勇士們，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統馭之下的「友誼」，不是各民族間的平等的友愛——這就是露骨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但也是青年軍人的作者悲哀。」（同上書。）

所謂民族主義文學經魯迅的如火之筆一照耀，就成了這樣一副尊容。這尊容偏要對革命文學表示輕蔑和憤怒，在大眾眼中是何等可憐，何等可笑！

無產階級文學和民族主義文學的論戰，正是當時國內社會鬥爭與政治敵對的反映。正在此時，落後的小資產階級對無產大眾表示極大的恐懼與懷疑（進步的小資產階級則已和無產大眾攜手），他們固然有時表示不滿於現狀，但極不願看見徹底的民主革命威脅現存的社會秩序。他們的戀舊情緒淹沒了他們的「革新」願望。他

們畏懼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的鋒芒，甚於畏懼地主與資產階級的聯合軋轢。當革命的浪花一沾濕了自己的衣冠，他們就立刻顯示歇斯說理的狼狽，表演「幾乎無事的悲劇。」這種順民式的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反映在文藝上，就出現了「第三種人」的文學。所謂第三種人，就是畏忌無產階級文學的勃興，而故意以超然於政治之外的喬裝的「公正」態度傲視一切文人，他們的「超然」面幕實際上掩蓋不了其袒護舊社會秩序，進攻工農革命的本來面貌，他們以為自己所從事的，是純正的永久的文藝，而無產階級文學不過是「沒有藝術價值的叫囂」或者是「口號標語文學」，左翼作家全是「左而不作」。這些「第三種人」明明繼承了過去純文藝派（「為文藝而文藝」派）的衣鉢，不過是把過去住在「藝術之宮」里的紳士文學用改頭換面的方式加以複述罷了。魯迅曾經反對過「費厄潑賴」，現在他又發揚此種精神，打擊「第三種人」文學。「第三種人」是否認文學和階級與政治有關的，魯迅就依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予以無情的批判。

「其實，這「第三種人」的「擱筆」，原因並不在左翼批評的嚴酷。真實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這樣的「第三種人」，做不成這樣的人，也就沒有了第三種筆，擱與不擱，還談不到。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而要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像哈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着，然而並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

所以雖是「第三種人」，却還是一定超不出階級的，蘇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階級的批評了，作品裏又覺

能擺脫階級的利害；也一定離不開戰鬥的，蘇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種人」之名提出抗爭了，雖然「抗爭」之名又為作者所不願受，而且也跳不過現在的，他在創作超階級的，為將來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於左翼的批判了。

這確是一種苦境。但這苦境，是因為幻影不能成為實有而來的。即使沒有左翼文壇作梗，也不會有這「第三種人」，何況作品。但蘇汶先生却又心造了一個橫暴的左翼文壇的幻影，將「第三種人」的幻影不能出現，以至將來的文藝不能發生的罪孽，都推給他了。」（論第三種人。）

「第三種人」抱着歇斯說理的錯覺與偏見，以為左翼作家是把一切罵倒，不需要同路人，他們把文壇的荒蕪歸罪於左翼文學家的排外，甚至長吁短嘆；說他們之所以不敢寫作，是深恐一寫出來，就有被左翼作家大罵的危險。魯迅正告他們：

「左翼作家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或國外殺進來的仇敵，他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同上）

「第三種人」一向自命為無所偏倚的超然派，然而實際上，他們是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阻撓革命運動，不管他們的主觀願望是怎樣，他們在客觀上是幫忙了當時開倒車的力量，作了圍剿革命文化的外衛。魯迅戳破了他們的「超然」，寫道：

所謂「第三種人」，原意只是說：站在甲乙對立或相鬥之外人。但在實際上，是不能有的。人體有胖和瘦，在理論上，是該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種人的，然而事實上却並沒有，一加比較，非近於胖，就近於

瘦。文藝上的「第三種人」也一樣，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罷，其實是總有些偏向的，平時有意的或無意遮掩起來，而一遇切要的事故，牠便會分明的顯現。」

反映着落後小資產階級的苦悶情緒的，除第三種人而外，還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以「革命小販」的姿態跳躍在文壇上，對革命文學放放暗箭，竭力要化為「第三種人」，的文藝小丑，他們或者對左翼作家這些無聊的謠言，或者「揚起小資產階級的文學之旗」招搖過市。但是他們引為痛苦的是雖是「中立」於左右之間，却遭到「左右夾攻」。魯迅在答楊邨人的公開信中曾經描繪了這一類型的革命小販的嘴臉。

「既從革命陣線上退回來，爲辯護自己，做穩「第三種人」起見，總得有一點零星的懺悔，對於統治者，其實是頗有些益處的，但竟還至於遇到「左右夾攻的當兒」者，恐怕那一方面，還嫌先生門面太小的緣故罷，這和銀行僱員的看不起小錢店伙計一樣的。先生雖然覺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種人」的存在不獨是左翼，却因先生的經驗而益明了，這也是一種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論，先生是不算失敗的，雖然自己覺得被「夾攻」，但現在只要沒有馬上殺人之權的人，有誰不遭人攻擊。生活當然是辛苦的罷，不過比起被殺戮，被囚禁的人們來，真有天淵之別；文章也隨處能夠發表，較之被封鎖，壓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遠了。和闊人驕將比，那當然還差得遠，這就因爲先生並不是奸商的緣故。這是先生的苦處，也是先生的好處。」

另外一種類型，就是自命風雅提倡幽默「寄沈痛於閑適」的「雅人」，他們不但厭惡勞苦大眾的文化思想，連白話文也加以反對。他們用「幽默」、「性靈」、「語錄體」之類的清玩，來慰藉苦悶得發慌的小市民，蔑

視一切有「方巾氣」的「俗人」。他們甚至不屑自命爲超然於左右之外的文人，而祇是一味把殘酷的現實化作輕盈的一笑。魯迅揭穿了「幽默」大師及其門牆李所提倡的幽默的本質，他說：

「但要明白，首先就要辨別，「幽默處僧皮與正經之間。」（語堂語。）不知僧皮與正經之辨，怎麼會知道這「之間」？我們雖掛孔子的門徒招牌，却是莊子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非不想辨；「不知周之夢爲蝴蝶歟，蝴蝶之夢爲周歟？」夢與覺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鑿起七竅來呢？莊子曰：「七日而混沌死。」

這如何容得感歎號？

而且也容不得笑。私塾的先生，一向就不許孩子憤怒，悲哀，也不許高興。皇帝不肯笑，奴隸是不准笑的。他們會笑，就怕他們也會哭，會怒，會鬧起來。更何況坐着有版稅可抽，而一年之中，竟「祇聞其羅晉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呢？

這可見「幽默」在中國是不會有的。

這也可見我對於「論語」的悲觀，並非神經過敏。有版稅的尚且如此，還希望那些炸彈滿空，河水漫野之處的人們來說「幽默」麼？

高調性靈的幽默派一面加工製造「處正經與僧皮之間」的「幽默」，一面提倡與「方巾氣」爲敵的小品文，他們讚歎袁中郎、王季重諸人的小品文，並且刻意模仿。魯迅斥責了這種逆流的傾向，但他並不抹煞明袁中郎等的作品的文學價值，他指出袁中郎等也曾寫過大有「方巾氣」的文章。提倡語錄體者實際上是畫歪了他們

的面龐：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學史上，是自有他們的價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羣學者們捧了出來，頌揚，標點，印刷，「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鑿借，鐘鼓借，枯竹窠借……」借得他一場胡塗，正如在中郎臉上，畫上花臉，却指給大家看，嘻嘻讚歎道：「看哪，這多麼「性靈」呀！」對於中郎的本質，自然是並無關係的，但在未經別人將花臉洗清之前，這「中郎」總不免招人好笑，大觸其霉頭。」

魯迅以「論時事不留面子，貶鋼筆常取類型」的戰鬥姿態轉戰於文壇上，他一面對「黑暗的主力」作大聲抗議，為力爭自由與保障文化而吶喊，一面對社會上與文化界的醜惡與病態作頑強的鬥爭，為造成健康的民族風氣而工作。他用無產大眾的堅實的進步的意識形態對抗地主紳士，資產階級和小市民的朽腐的頹廢的意識形態，在文壇上經過他的鐵筆掃蕩的，有創子主義與僵屍主義的論客，有「幫閑」與「幫兇」的文士，有鄙視大眾自以為公正的「正人君子」，有自命超然於左右之外而實際在幫忙文化圍剿的「中間文人」，有「寄沉痛於閑適」、「潔身自好」的雅人，有提倡誦讀古書的遺老遺少，有買空賣空的文化市儈，有東倒西歪的革命小販，……這一切鬥爭決不能看作他對於某些人的個人攻擊，他是在對中國沒落的腐敗的社會勢力猛擲投槍。收集在二心集、偽自由書、南腔北調集、准風雨談、花邊文學且介乎雜文（共三集）等書內的雜感文，大都是這一時期暴露和攻擊社會、政治、文化的黑暗與時弊的。

魯迅信任大眾的正確與力量，他與大眾一同呼吸，一同歌唱。大眾的苦戰和受難使他毅然拿起保衛工農革

命的戰旗，攻擊一切摧殘大眾破壞革命的暴虐與助虐。他堅決相信，未來是一定屬於中國人民大眾的。然而他同時指出了，革命乃是長期的艱苦的事業，因此他大聲警告同一隊伍中的戰士：「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二心集。）並且從各方面來推動和充實革命事業，「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他不斷教育文化運動的青年幹部，培養勞苦大眾的戰鬥實力。在大革命後，他爲哺育大眾文化，一方面提出積極的建設方法，一面攻擊毒害大眾的愚民勢力。語文拉丁化（新文字），連環圖畫，木刻，通俗文學等……在他都不是當作純學術性的運動，而是當作大眾的精神食糧而起來號召的。這裏我要特別介紹魯迅對於新文字運動的勞績，從這勞績中，不難窺見他對於整個大眾文化的見解與態度。

對於語文革命運動的推進，從五四以來，沒有別人再比魯迅更爲堅決，更爲徹底的。在五四時代提倡文學革命的學者文士，反映着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荏弱性，一到了五四的文化革命的暴風雨過去之後，便停止前進的步伐，甚至向後大開倒車；有的以整理國故爲職志，有的以國語文學爲極境，有的回返到古文的懷抱，有的在提倡公安、竟陵的語錄體。魯迅呵斥了這一切妥協的後退的傾向。他高舉語文革命的戰旗，團結一切文化戰士和有爲青年，繼續進軍。他並不以白話文的勝利爲滿足，他始終着眼於大眾的文化利益，反對少數人對於語文知識的壟斷。他痛憤語文復古運動，堅定主張文字口語化。一九二六年他就明確表示了對於語文大眾化的思想：

「記得初提倡白話的時候，是得到各方面劇烈的攻擊的。後來白話漸漸通行，勢不可遏，有些人便

一轉而引爲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運動」。又有些人便主張白話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話要做得好，仍須看古書。前一類早已二次轉舵，又反過來嘲罵「新文化」了；後二類是不得已的調和派，只希圖多留幾天僵屍，到現在還不少。我曾在雜感上拊擊過的。

新近看見一種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說起要做好白話須讀好古文，而舉例爲證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這實在使我打了一個寒噤。別人我不論，若是自己，則曾經看過許多舊書，是的確的，爲了教書，至今也還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響到所做的白話上，當不免流露出牠的字句，體格來。但自己却正苦於背了這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復隨便，時而很峻急。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為懶惰罷，往往自己寬解，以爲一切事務，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只是這樣，也需要這樣。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反因爲從舊學中來，情形看得較爲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致命。但仍應該和光陰惜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範本。跟着起來便該不同了，倘非天縱之聖，積習當然也不能頓然蕩除。但總得更有新氣象。以文字論，就不必更在舊書裏討生活，却將活人的唇舌作爲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更加有生氣。至於對於現在人民的語言的窮乏欠缺，如何救濟，使他豐富起來，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或者也須在舊文中，取得若干資料，以供使役，但這並不在我現在所要說的範圍以內，姑

且不論。」

後來，魯迅對於語文改革有了更進步的見解，他放棄了「在舊文中取得若干資料，以供役使」的不肯定的思想。（他反對從莊子，文選中尋求語彙就是一個明證。）他看清了大衆有自己豐富的語彙，更加堅定了他的「不必更在舊書裏討生活，却將活人的唇舌作爲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更加有生氣」的主張。在香港的一篇演講中，他重新號召了反對文言的鬥爭：

「我們不必再去費盡心機，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然而單是文學革新是不够的，因爲腐敗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話做。所以後來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三閑集：無聲的中國。）

魯迅重振白話文學反對古文的號召自然是針對當時的時弊來說的。第一，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並沒有獲得決定的勝利，古文依然猖獗地在反攻，在復辟；第二，五四時代的許多文學革命健將已經放棄了自己的陣地，鄙視白話文的邪風仍在吹拂中國的文化生活。第三，當時華南特別是香港是保存古文的最反動的堡壘，洋大人的鼻孔復古助長了一般高等的華人進攻語文革新運動的氣燄。然而魯迅的重振白話文是有條件的，他不是單純地提倡白話文，而主張用思想革新來補語文革新之不足，使語文的內容和形式一同革新，一同進步。同時他並不認爲白話文是中國語文革命的止境。就在同一年中，他說過這樣的話：

「古文已經死掉了，白話文還是改革道上的橋梁，因爲人類還在進化。便是文章也未必有萬古不磨的典則。」（華蓋集續編：古書與白話。）

正因為白話文是「改革道上的橋梁」，所以完成白話文對於文言的徹底勝利是非常必要的。（注意：魯迅說「古文已經死掉了」，並非指古文已經消滅了，而是說，古文已經成了不適合現代需要的陳屍。）但也因為白話文不過是過渡的「橋梁」，所以它並非「萬古不磨」的語文形態；代替白話文而興的，還有更高級，更完善的語文；這就是魯迅應用在語文問題上的不自覺的辯證法。

什麼是比白話文更高級的語文形態呢？這問題的答案在一九三四年由他明白提出來了，那就是中國語文拉丁化——新文字：

「倘要中國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須提倡大眾語，大眾文，而且書法必須拉了化」。（且介亭雜文集：門外文談。）

新文字是掃除文盲把知識交給大眾最銳利的工具，只有用它來代替漢字，才能解除鎖禁大眾的精神鐵鏈；比較，是最好的事情。當沒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會想到象形字的難；當沒有看見拉丁化的新文字之前，就很難明確地斷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羅馬字拼法，也還是麻煩的，不合實用，也沒有前途的文字。

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勞苦大眾沒有學習和與會的可能，就是有錢有勢的特權階級，費時一二十年，終於學不會的也很多。最近，宣傳古文的好處的教授，竟將古文的句子也點錯了，就是一隻證據——他自己也沒有懂，不過他們裝作懂得的樣子，胡說八道，欺騙不明真相的人。

所以，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裏面，倘不肯先除去牠，結果只有自己死。先前也曾有過學者，想出拼音字來，要大家容易學，也就是更容易教訓，並且延長他們服役的生命，

但那些字都還很繁瑣，因為學者總忘不了官話，四聲，以及這是學者創造出來的字，必需有學者的氣息。這回的新文字都簡易得遠了，又是根據於實生活的，容易學，可以用這對大家說話，聽大家說話，明白道理，學得技藝，這是勞苦大眾自己的東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

魯迅認為「中國現在等於並沒有文字」（且介亭雜文集：中國語文的新生），所以提倡新文字，乃是救治「無聲的中國」的唯一途徑。把新文字詞漢字以及別的拼音文字——注音字母與國語羅馬字一比較之後，他斷定了新文字是真正的大眾的文字：

「新文字却沒有這空談的弊病，說得出，就寫得來，它和民衆是有聯繫的，不是研究室或書齋裏的消玩，是街頭巷尾的東西；它和舊文字的關係輕，但和人民的聯繫密，倘要大家都能發表自己的意見，收穫切要的知識，除它以外，確沒有更簡易的文字了。」（論新文字。）

魯迅對於語文有最正確最深刻的見解，他認為語文革命離開了大眾的實際生活，完全是空談，因此他指出「幾個讀書人在書房裏商量出來的方案，大抵是行不通的。」國語羅馬字之所以沒有前途，就因為不是着眼於大眾的實際需要，而只是少數學者構想出來的東西；它並沒有替大眾澈底解除煩難，而依然割棄不了舊的不合理的漢字傳統。

反對新文字的人，指出語文拉丁化妨害了中國的統一，魯迅對於這種駁難作了透徹的答覆：

「現在的中國，本來還不是一種語言所能統一，所以必須另照各地方的官語來拼，待將來再圖溝通。反對拉丁化文字的人，往往將這當作一個大缺點，以為反而使中國的文字不統一了，但他卻抹煞了方塊漢

字本來爲大多數中國人所不識，有些智識階級也並不真識的事實。」

他處處念念不忘的，是大衆的生活和利益，他從大多數人的實際需要出發，所以堅決反對少數人「爲語文而語文」的傳統偏見。繁雜的漢字幫助封建集團與地主資產階級的智識獨占制度，剝奪了大衆「互通聲氣」的權利。說漢字是統一中國的唯一工具的人，明明無視了中國絕大多數民衆和漢字絕緣的事實。至於新文字，雖然不能一下子促進中國語文的統一，但它在發展過程中，是可以逐漸打破大衆的生活隔離狀態，終於引導到民族統一的境界的：

「我的意思是：在開首的啓蒙時期，各地方各寫牠的土話，用不着顧到和別地方意思不相通。當未用拉丁寫法之前，我們的不識字的人們，原沒有用漢字互通着聲氣，所以新添的壞處是一點也沒有的。倒有新的益處，至少是在同一語言的區域裏，可以彼此交換意見，吸收智識了。」

但魯迅並不主張用「聽其自然」的態度來對付語文運動，他以爲要達到中國語文統一的最後目的，也須加上人工的促進力量。

「幾個讀書人在書房裏商量出來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聽其自然，卻也不是好辦法。現在在碼頭上，公共機關中，大學校裏，確已有着一種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大家說話，既非「國語」，又不是京話，各各帶着鄉音，鄉調，卻又不是方言，即使說的喫力，聽的也喫力，然而總歸說得出，聽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幫助發達，也是大衆語中的一支，說不定將來還簡直是主力。我說要在方言裏「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來源就在這地方。待到這一種出於自然，又加人工的話一普遍，我們大家語文就

算大致統一了。」

魯迅是最堅決主張大眾文化的戰士，但他並不低估大眾接受新文化的能力。他反對無條件的「迎合大眾」，使大眾永遠停滯於低級文化水準的辦法，他說：

「讀書人常常看輕別人，以為較新，較難的字句，自己能懂，大眾卻不能懂，所以為大眾計，是必須澈底掃蕩的；說話作文，越俗，就越好。這意見發展開來，他就要不自覺的成為新國粹派。或則希圖大眾語文在大眾中推行得快，主張什麼都要配大眾的胃口，甚至於說要「迎合大眾」，故意多罵幾句，以博大眾的歡心。這當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詣，但這樣下去，可要成為大眾的新幫閒的。說起大眾來，界限寬泛得很，其中包括各式各樣的人，但即使「目不識丁」的文盲，由我看來，其實也並不如讀書人所推想的那麼愚蠢。他們是要智識，要新的智識，要學習，能攝取的。」

在別一處，他也表示過同樣的意思，他以為要豐富中國文學的語彙，即使在寫給（或譯給）大眾看的文字裏，也不妨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語法。他說：

「我還以為即使為乙類讀者（按即略識字的大眾）而譯的書，也應該時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語法在裏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爾遇見，而想問或問一問，就能懂得為度，必須這樣，大眾的言語技能豐富起來。」（二心集：關於翻譯的通信。）

魯迅用大眾本位的觀點宣揚和推進一切文化啓蒙運動，在論及連環圖畫的時候，他表示過這樣的意見：

「但要啓蒙，即必須能懂。橫的標準當然不能俯就低能兒或白痴，但應該着眼於一般的大眾。」（且

他主張採取舊形式來提倡使大眾易懂的藝術與文學。他深刻地了解舊形式的合理採取乃是新形式的發端，也就是舊形式的蛻變。但此種採取，「並非斷片的古董的雜陳，必須溶化于新作品中。……恰如吃用牛羊，棄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決不因此就會「類乎」牛羊的」。〔見介亭雜文集：論舊形式的採用。〕「舊形式是採取，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同上。）他在這裏道出了他接受中國文化遺產的正確方法。他之所以能夠成爲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的最合式的繼承者，就在于他能夠對於舊的文化能夠有所刪除，也有所增益。他善于運用新與舊的歷史甄別法來處理生動的文化史。

魯迅所號召的大眾文化運動，是他整個的思想活動和政治戰鬥的一個組成部分，他並不是爲大眾文化而提倡大眾文化。在力爭自由與解放的苦戰環境中，大眾的文化生活是附屬於大眾的政治利益的。大眾要戰取勝利，在消極方面，必須解除妨礙他們前進的精神鎖鏈，在積極方面，更要獲得對於現實的正確認識。而這除了展開大眾的啓蒙運動，幫助大眾武裝他們的頭腦而外，沒有別的法子。在最後六七年中，魯迅比以前更發覺更堅韌地獻身于大眾的自覺運動中，是應當拿當時整個革命的緊迫需要來說明的。

九一八的砲聲對於中國民族是一個殘暴的打擊，但也是對於中國人民一個沉痛的教訓。侵略者的兇殘橫暴，不抵抗者的奴顏婢膝，剝削者的荒唐無恥，人民大眾的呻吟痛楚，革命隊伍的沉着苦鬥，正義之士的嚴肅工作……這一切可悲可憤可歌可泣的圖景，把衰朽與新生、正義與野蠻、高潔與卑污、進步與倒退表顯得格

外分明了。中國人民或者是團結起來，戰取勝利的生存，或者是低頭退縮，選擇奴隸的前途，其間沒有徘徊的餘地。魯迅大聲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接受決定中國民族生死存亡的正義戰鬥。然而，當時瀰漫在中國大部的土地上的，是卑屈的不抵抗主義，它與中國傳統的奴隸主義結合起來，毒化了中國的民族生活，遏阻了中國的民族戰鬥。魯迅對這種亡國主義的危險傾向予以銳利的打擊。他頌揚青年的救國運動，斥責壓迫愛國青年的無恥罪行。

「只要略有知識的人就都知道，這回學生的請願，是因爲日本佔據了遼、吉，南京政府束手無策，單會去哀求國聯，而國聯卻正和日本是一伙。讀書呀，讀書呀，不錯，學生是應該讀書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爺們不至於葬送土地，這才能够安心讀書。報上不是說過，東北大學逃散，馮庸大學逃散，日本兵看見學生模樣的就槍斃嗎？放下書包來請願，真是已經可憐之至。不道國民黨政府卻在十二月十八日通電各地軍政當局文裏，又加上他們「搗毀機關，阻斷交通，毆傷中委，擄劫汽車，攔擊路人及公務人員，私逮刑訊，社會秩序，悉被破壞」的罪名，而且指出結果，說是「友邦人士，莫名驚詫，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

好個「友邦人士」！日本帝國主義的兵隊強佔了遼、吉，砲轟機關，他們不驚詫，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詫。中國國民黨治下的連年內戰，空前水災，寶兒救窮，砍頭示衆，秘密殺戮，重刑逼供，他們也不驚詫。在學生的請願中有一點紛擾，他們就驚詫了！

好個國民黨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麼東西！

即使所舉的罪狀是真的罷，但這些事情，是無論那一個「友邦」也都有的，他們的維持他們的「秩序」的監獄，就撕掉了他們的「文明」的面具。擺什麼「驚訝」的臭臉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驚訝，我們的國府就怕了「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好像失去了東三省，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誰也不響，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只有幾個學生上幾篇「星文」，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誇獎，永遠「國」下去一樣。」

他對屠殺學生的事實表示了正義的抗議：

「我們還記得，自前年冬天以來，學生是怎麼鬧的，有的要南來，有的要北上，南來北上，都不給開車。待到得首都，頓首請願，卻不料「爲反動派所利用」，許多頭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槍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驗屍之後，報告書上說道「身上五色」。我實在不懂。誰發一句質問，誰提一句抗議呢？有些人還笑罵他們，還要開除，還要告訴家長，還要勸進研究室。一年以來，總算安靜了。但不料榆關失了守，上海還遠，北平卻不行了，因爲連研究室也有了危險。住在上海的人們想必記得的，去年二月的暨南大學，勞動大學，同濟大學……，研究室裏還坐得住麼？」

據外必先安內論者同時是「對於外敵非愛和平不可」的敦睦邦交論者（偽自由書：觀門），他們的「新花樣的文章」，到後來只剩了「安內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內」，「外就是內，本無可攘」這三種（同書，文意與題目），因此他們對於外敵是用講信修睦的笑臉相迎，而對於「內敵」則用偃文尚武的拳脚相向，所謂「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不過是「狗年惡戰」之餘的頭兒「忽而誤會消釋了，忽而杯酒言歡了，忽而共同樂

悔了，忽而立誓報國了」（觀門），他們何嘗願意停止對內的「血的遊戲」？魯迅對內戰表示了極大的憎惡：「還有更要緊的一層，是我們正由「不抵抗」以至「長期抵抗」而入于「心理抵抗」的時候，實際上恐怕一時未必和外國打仗，那時戰士技癢了，而又苦于英雄無用武之地，不知道會不會炸彈倒落在手無寸鐵的人民頭上來的？」

所以還得戰戰兢兢的陳明一種願望，是——
莫殺人民：

對外的戰略是「誘敵深入」，而對內的戰略是「流血不辭」。有一家題名「救國」的報紙就曾吐露了這內戰的眞諦。該報公然主張「浸使爲戰略關係，須暫時放棄北平，以便引敵深入……應嚴厲責成張學良，以武力制止反對運動，雖流血亦所不辭」，神聖的領土是可以在「誘敵深入」的戰略之下拱手讓與「友邦」的。但是人民如果敢于起來反對這種「戰略」呢，就得準備練習在血海中游泳。魯迅用蘸着悲憤的筆寫出了愛國人民的心聲：

「雖流血亦所不辭，勇敢哉戰略大家也。」

血的確流過不少，正在流的更不少，將要流的還不知道有多少。這都是反對運動者的血。爲着什麼？爲着戰略關係。」（爲自由書：戰略關係。）

反對屠殺愛國人民的抗議正是反對延長內戰的抗議的一翼，魯迅就這樣對刀口向民笑口迎敵的老爺揮動了他的筆斧。但當時不僅有對外「誘敵深入」對內「不辭流血」的「安內不必攘外」者，而且有所求敵人「征服

中國民族的心」的「以夷制華者」。胡適就發出了這樣的一套妙論。他說：「日本軍閥在中國所造成的仇恨，到今日已頗難消除……日本決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國；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澈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這就是勸告日本侵略者用糖果來代替刀棒，用「王道」來代替「霸道」。胡適博士的獻策實在落了空，因為事實上，以侵略中國為唯一出路的「友邦」除了日夜夢想征服中華民國的全土以外，也在不斷地打算「征服中華民族的心」，要不然，他向中國人民宣揚王道樂土提倡尊孔讀經之類的特務工作就沒有絲毫意義。魯迅聽不慣沒有骨頭的士大夫的乞憐哀音，他用中國民族的自信火光照徹了胡適們所散佈的毒菌：

「這據說是『征服中國的唯一方法』。不錯，古代的儒教軍師，總說『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誠服也』。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面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中國小百姓實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們一向會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發慈悲，居然採用胡博士的條陳，那麼，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中國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復：——因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歌功的王道，中國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為沒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國的肉體固然買到了，中國的靈魂也被征服了。」

魯迅以「第一個中國人民」的雄姿猛攻卑躬屈膝的奴才事大主義，他毫不動搖地確信着，中國人民並不像亡國士大夫所想像的那樣沒有出息，相反地，最有堅決的自信，最能代表中華民族的真實氣概的，乃是咬緊牙關苦鬥不息的大衆；他們的心是絕對不能征服的，他們也決不讓民族敵人來「征服中華民族的心」。魯迅堅持

戰鬥的民族自信力來反對卑劣的民族「自欺力」，堅持頑強的民族自尊心來反對可恥的民族自卑心。他深信苦戰着的中國人民大眾並未失掉自信力，就因為他們不但要生存，而且要合理地生存：

「中國人現在是在發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並非現在的新東西，現在只不過日見其明顯，籠罩了一切罷了。然而，在這籠罩之下，我們有並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于黑暗中，不能為大眾所知罷了。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則可，倘若加于全體，那簡直是誣蔑」。

然而，儘管在中國存在着富有堅強的自信力嚴肅工作的人民大眾，在另一面是橫溢着荒淫與無恥的濁流。
魯迅在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文中就曾沉痛地寫道：

「愛倫堡論法國的上流社會文學家之後，他說，此外也還有一些不同的人們：『教授們無聲無息地在他們的書房裏工作着。實驗X光線療法的醫生死在他們的職務上，奮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漁夫悄然沉沒在大洋裏面。——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面卻是荒淫無恥。

這末兩句，真也好像說着現在的中國。然而中國是還有更其甚的呢？手頭沒有書，記不清見于那裏的

了。也許是已經漢譯了的日本箭內互氏的著作罷，他曾經一一記述了宋代的人民怎樣爲蒙古人所淫殺，俘獲，踐踏和奴使。然而南宋的小朝廷卻仍舊向錢山賊水開的黎民施威，在錢山賊水開行樂；逃到那裏，氣餒和奢華就跟到那裏，頹廢和貪婪也跟到那裏。「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行在賣酒醅」。這是當時的百姓提取了朝廷的精華的結語。

人民在欺騙和壓制之下，失了力量，啞了聲音，至多也不過有幾句民謠。「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就是秦始皇，隋煬帝他會自承無道麼？百姓就只好永遠箝口結舌，相率被殺，被奴。這情形一直纏綿下來，誰也忘記了開口，但誰也不能開口。即以前清末年而論，大事件不可謂不多了；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政變，義和拳變，八國聯軍，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們沒有一部像樣的歷史的著作，更不必說文學作品了。「莫談國事」，是我們做小民的本分。」（且介亭雜文二集：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

魯迅的這段序文不是在背誦歷史，而是明明描寫當時中國的真情實景。「一面是莊嚴的工作，另一面却是荒淫與無恥」，這是時無分古今，地無分中外的歷史黑白畫。他把這黑白畫明白地指給大眾看，爲的是鼓起大眾生存的敵愾和勇氣。他相信大眾是可由事實的教訓得到覺悟的。因此在憤慨于中國內治的黑暗之餘，魯迅似堅定地宣佈了他對於大眾力量的確信：

「事實既然教訓了這些，備存的路，就當然使他們想到了自己的力量。」（南楚北調集：談金聖歎。）但是，當時最嚴重的「事實」，乃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節節進逼。特殊人物在竭力隱瞞和沖淡這種血淋淋的

事實，不但自己在用康黨代替學頭，而且要急中國的人都在「逆來順受」中養成綿羊般的性格。可是，在血腥的暴風雨中，為特殊人物所栽植的順民主義究竟不能生根。魯迅大聲警告國人，民族敵人的屠刀在跟隨不抵抗主義的腳跡而不斷深入。當北平當局在「維持治安」的名目下壓迫民衆的時候，魯迅提出了這樣的一個使人駭怪的問題：「看吧，妨礙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軍呢還是人民」？這在一九三三年三月間寫出的預言很快就由血的事實得到了確證。（見南腔北調；守常全集題記。）

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使魯迅的筆鋒成為號召民族革命戰爭最響亮的號角，他傾吐了人民大眾蘊結在心頭的真實意見，繼續痛擊安內急于攘外論與逆來順受論之類的亡國主義，揭破「以華制華」和「共同防共」的陰謀（見天上與地下，我要驅人等），並且高舉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旗：

「目前的革命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並關於民族統一戰線。）

他對於民族統一戰線與抗日鬥爭有極正確極深刻的見解：

「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有個作者又引例了法國的人民陣綫，然而我以為這更是作者忘記了國度，因為我們抗日人民統一戰線比法國的人民陣綫還要廣泛得多。」

（同上書。）

「新的口號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學運動的停止，或者說「此路不通」了。所以，決非停止了歷來的反法西斯主義，反對一切反動者的血的鬥爭，而是將這鬥爭更深入，更擴大，更實際，更細微曲折，將鬥爭具體化到抗日反漢奸的鬥爭，將一切鬥爭匯合到抗日反漢奸鬥爭這總流裏去。」（論且介亭雜文附集）

論現在他們的文學運動。）

魯迅認為「中國抗日人民統一戰綫是比法國的人民陣綫還要廣泛得多」，認為統一戰綫的口號是將「鬥爭具體化到抗日反漢奸的鬥爭」。這不但回答了那些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安內急于攘外論者，而且糾正了那些誤解民族統一戰綫的左傾幼稚病者與右傾機會主義者。就因為他堅信民族統一戰綫是挽救中國危亡的唯一出路，所以他憤怒斥責了托洛斯基派破壞民族統一戰綫的理論與行爲：

「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高超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服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爲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干淨的地方去。因爲你們高超的理論爲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爲你們捏一把汗，在大衆面前，倘若有人做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言，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够洗刷得很清楚麼？這決不是因爲從前你們中曾有人跟着別人認識我拿盧布，現在就來還一手以報復。不是的，我還不至於這樣下流，因爲我不相信你們會下作到拿日本人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我們決不會的。我只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衆所歡迎，你們的所爲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爲人的道德。」

魯迅不僅號召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而且給予抗日愛國的羣衆以熱情的鼓勵和睿智的指導，在幾個重要問題一文（此文未列入魯迅全集，以下是轉引自漢夫作：魯迅與民族解放運動）中，他指出「學生運動（指一二九運動）比較以前進步得多」，因為青年學生「能够很清楚的認識橫梗在民族解放鬥爭前程一切明明暗暗的敵人，他們也知道深入下層，體驗他們所需要體驗的生活，組織農民、工人，加緊推動這些民族解放鬥爭的主力軍。」他直到臨死，還不忘記民族解放運動和一切現實問題的關係。

魯迅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然而這却不妨礙他同時是一個卓越的民族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因為他是半殖民地的被壓迫大眾的英明代言人，因為他保持了和中國無產大眾及其政治代表最密切的接觸。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在魯迅及其戰友的思想的照耀之下，無疑要成爲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中最燦爛的一面旗幟。

從魯迅的三十年的思想發展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位巨人的戰鬥不屈和前進不息的不朽精神使他不斷反映着和代表着中華民族的奮鬥與進步。他的思想有流變，有增益，然而在其中却貫串着一根堅韌的赤線，這就是戰鬥的現實主義。